目录

[1.三灯书斋 3](#_Toc29201851)

[2.表音文字 4](#_Toc29201852)

[3.人名 6](#_Toc29201853)

[4.同名同姓 7](#_Toc29201854)

[5. 正确发音 8](#_Toc29201855)

[6.伊之首 10](#_Toc29201856)

[7.天与地 12](#_Toc29201857)

[8.窗之雪 14](#_Toc29201858)

[9.风雷 16](#_Toc29201859)

[10.乐享山中 18](#_Toc29201860)

[11.灵宿之山 20](#_Toc29201861)

[12.少林寺 22](#_Toc29201862)

[13.腊日 24](#_Toc29201863)

[14.新年应从何时起？ 25](#_Toc29201864)

[15.一行禅师 27](#_Toc29201865)

[16.加上说 29](#_Toc29201866)

[17.干支 31](#_Toc29201867)

[18.年号之还历 32](#_Toc29201868)

[19.同开高健先生之赌 33](#_Toc29201869)

[20.同开高健先生之旅 35](#_Toc29201870)

[21.雪日 37](#_Toc29201871)

[22.春字 38](#_Toc29201872)

[23.闭校仪式 39](#_Toc29201873)

[24.新学年 41](#_Toc29201874)

[25.眼镜纪念日 42](#_Toc29201875)

[26.又是眼镜纪念日 43](#_Toc29201876)

[27.横纲品格 44](#_Toc29201877)

[28.规则 46](#_Toc29201878)

[29.板球与马球 47](#_Toc29201879)

[30.爱马 48](#_Toc29201880)

[31.束袖带 49](#_Toc29201881)

[32.马之画 51](#_Toc29201882)

[33.国际花 52](#_Toc29201883)

[34.爱莲说 54](#_Toc29201884)

[35.梧桐树 56](#_Toc29201885)

[36.义务劳动 58](#_Toc29201886)

[37.方位 59](#_Toc29201887)

[38.阿拉穆特 60](#_Toc29201888)

[39.未来记 61](#_Toc29201889)

[40.鲇鱼 62](#_Toc29201890)

[41.“妇”字 63](#_Toc29201891)

[42.重箱和汤桶 65](#_Toc29201892)

[43.干杯和敬酒辞 67](#_Toc29201893)

[44.杯子和茶碗 69](#_Toc29201894)

[45.幻杂记 71](#_Toc29201895)

[46.泡沫和阳炎 72](#_Toc29201896)

[47.西亚 74](#_Toc29201897)

[48.虚虚实实 75](#_Toc29201898)

[49.落选也万岁 76](#_Toc29201899)

[50.正仓院有感 78](#_Toc29201900)

[51.五弦琵琶 79](#_Toc29201901)

[52.月琴 81](#_Toc29201902)

[53.围棋传入日本 83](#_Toc29201903)

[54.博弈 85](#_Toc29201904)

[55.棋友 87](#_Toc29201905)

[56.将棋、象棋 89](#_Toc29201906)

[57.醉象 91](#_Toc29201907)

[58.特价促销 93](#_Toc29201908)

[59.灶王爷 95](#_Toc29201909)

[60.松竹梅 96](#_Toc29201910)

[后记 98](#_Toc29201911)

# 1.三灯书斋

我们人体的某些地方，针灸特别见效，这些地方称为“穴位”。日本汉方称为“经穴”，其实经穴甚多，且都已分别命名。据传《黄帝内经·素问》这一汉代医书里记载了360余个经穴。没有记载的经外奇穴，经后世加工，补充了五六百个，总计达到千余个。

那些穴位名称，想要全部记住，对普通人而言是绝对不现实的。最有名的穴位当属足三里，位于外膝眼下三寸，据说此处针灸，可治百病。松尾芭蕉在《奥州小路》里写到，出行前“……乃补缀紧腿裤，新换斗笠带，针灸足三里……”即在长途旅行之前，首先要针灸，这似乎是江户人的常识。

众所周知，头顶有百会穴，足底有涌泉穴。

东洋医学如今在西欧也备受关注，但穴位名称是一个瓶颈。记穴位名称对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人来说还好，但对于欧美人来说肯定非常有难度。

在芬兰，我遇到一位研究东洋医学的年轻医生。他叫马蒂，是一位身高近两米的高个子青年。聊天中发现，他连专业术语都会说。比如术语“经络”，他的汉语发音非常标准。一位中国的针灸教授，在欧美各大学做集中讲座，据说当时马蒂去听了讲座，不过是通过翻译才理解了讲座内容。他完全不懂汉语，汉字也完全不认识，但穴位名称的汉语发音却相当完美。

据说美国人在研究东洋医学时，为了方便记忆而给穴位编号。例如“灸三里”，他们说“灸108号穴位”。虽然说法不同，但无疑指的是相同穴位。

如果说名称只是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一种符号，那么“百会”也好，“一号”（穴位）也罢，其实是一样的。在酒店，普通客房都是用数字编号，而用于聚会的房间，则起个优雅的名字，例如“菊”“富士”等。用来举办婚宴等的房间如果叫“第十八号房间”，就显得不太得体了。

最近地址名称都在由传统名称逐渐向便于行政管理的名称过渡。居民对此似乎也有反感。如果把“百会”改称为“一号穴位”，应该会有人觉得缺了些味道。但是，以“第十五条街”这个名称为例，习惯了这个叫法后，语感上会逐渐含有一种特殊的韵味。

中国文人常常给自己的书斋命名。例如，清末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号饮冰室主人，还著书《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

我也想给无名书斋起个名字。仰望天棚，发现上有荧光灯三组。书斋整体呈长方形，内有书架几组。故暂命名为“三灯书斋”，此连载也据此命名为“三灯随笔”。

看似随随便便起了个名字，其实“灯”这个字与我缘分着实不浅。

在中国，同一个家族各代名字中通常含一个辈字。例如孔子后裔应有数十万人之多，他们的辈字排序是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现在孔子在台湾的第七十七代嫡系子孙是孔德成先生。他父亲叫孔令贻，祖父叫孔祥珂，曾祖父叫孔繁源。娶著名宋氏三姐妹中长姐宋霭龄为妻的国民党政府要员孔祥熙属于“祥”字辈，即他是第七十五代后人。

我家也有辈字，其顺序是炳、培、钩、河、杨、灯、地、银、汉。谁规定的不清楚，除了听说跟“火、土、金、水、木”五行相关之外，文字排列上似乎也没有其他含义。从家谱上来看，按上述辈字命名的，“培”字辈是最后一代，之后再无人用辈字命名了。

可能是因为一字固定后，剩下就只有一字可自由选择，大家对此心有微词吧。另外在同一地区居住一二百年后，一个家族的白发老人在刚出生的婴儿辈分之下，还要称其为叔叔，这种让人尴尬的事情会时有发生。所以我觉得这才是大家取消辈字的最大理由。心里明白自己属于哪一辈分即可。

我是“灯”字辈，所以本来我应取名为“陈灯某”。户籍上我是三子，所以“三灯”并不是仅根据电灯数量而来的。

看似随意起的名字，如果赋予它一定寓意的话，我这个“三灯书斋”听起来也蛮有感觉的。

（1989年10月2日）

# 2.表音文字

外语音译成汉语，最精确的当属“簿记”和“画廊”，这两个译词可谓翻译史上的双璧。时下将汉字翻译成片假名比较流行，因此用片假名命名的大企业也在逐渐增多。

据说即将成立的“太阳神户三井银行”，其名字不仅冗长，而且透着傻气。而像“トマト銀行”（番茄银行）这种独特的命名方式才是时下最为流行的。

确实汉字笔画多时，非常不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经有人主张过全用罗马字书写，也有人主张过全用片假名书写，可能是因为不适应，全用罗马字或片假名的话不方便阅读理解。到了文字处理机时代，汉字的不便之处略有改观。

在日本或中国学过并能熟练运用汉字的洋人，回国开车时听说会感到些许不便。因为每到一个陌生地方，为了找高速出口，必须注意标识，此时自然需要减速。而在日本就无需这样。

“啊？原来在我国需要读完整个句子才能理解全文意思呀！……”那个洋人恍然大悟。而日本的标识不用读完整个句子，而是“看一眼就能理解”，所以不用减速。这是汉字的一个优势。

汉字造词功能强大，表述简练。相比“アメリカ”，“米国”一词感觉更简练。日本用“米国”二字，中国用“美国”二字表示美国。在汉语里，“美”读“měi”，“米”读“mǐ”，两词皆为“アメリカ”一词非常成功的音译汉字。同样发“mei”音的还有很多，诸如枚、梅、没、霉、眉、媒、每、魅等。之所以从诸多汉字中选“美”字，不是要把美国比喻成优雅的国家，而是出于礼仪，作为国名当选佳字。如果译成“没国”，就有失礼数了。

米字虽然也是佳字，但古代西域康国（撒马尔罕）附近有“Maymurgh”国，中国史书称之为“米国”，怕与之混淆而避之吧。另外出身于西域米国的艺术家颇多，诸如北宋书法家米芾、明代画家米万钟等。

16世纪，葡萄牙人来到中国和日本。因为他们经由果阿、马六甲而来，日本称他们为“南蛮”，这是非常失礼的称谓。而中国称他们为“佛郎机”。

当年，葡萄牙人好像大多是与东南亚的穆斯林一起来的中国南方。中国当局问那些同行的穆斯林：“他们（葡萄牙人）是什么人？”他们回答说：“佛郎机”。其实穆斯林当时统称欧洲人为佛郎机，因此欧洲人称“十字军东征”为“十字军战争”，而穆斯林称之为“佛郎机进攻”。

称呼由“佛郎机”改成“葡萄牙”，着实经历了漫长岁月。

法国在日本用“佛”字，在中国用“法”字表示。在中国如用“佛”表示法国，恐与佛郎机混淆，所以才选用“法兰西”吧。其实，当年法国人来到中国时，据说就被错当成佛郎机了。

葡萄牙人在中国南方惹下祸端时，地方官员在向北京递交的公函里称其为“佛狼机”。“郎”是官名，据字典，“郎”指纯情男子，男子美称。毫无疑问，“郎”是佳字。可能是觉得恶人不配用此佳字，故换成与其同音的“狼”字吧！骑在狼身上的佛祖，应该很不舒服吧！

日本是根据火枪的发源地“种子岛”将火枪命名为“种子岛”。与此同理，中国称葡萄牙人带来的火枪为“佛郎机”。不过称呼火枪时，多用“狼”字代替“郎”字。

话说回来，鸦片战争时期的部分公函里，提到英国时不用“英”字，而是用《康熙字典》中都不存在的汉字“00014.jpeg”。或是因为“英”字本属佳字，可一旦加个口字旁，就会让人联想到动物的“呕”“吐”本能，这样才符合敌人的身份吧。

日本称俄国为“露”，中国称之为“俄”。露水瞬间即干，生命短暂，故“露”字不算佳字。

“俄”字给人感觉缺乏稳定性。就像日本以前也将俄国称之为“オロシヤ”那样，在发“R”音时，有时会略带“O”音。那似有似无的音后来就读成“俄”了。这个汉字又跟“露”字相似，短暂而无常，绝非佳字。不过，好在不是口字旁，而是单立人旁，还算含有一定程度的敬意。

清朝时代，中国与俄国之间屡屡发生国际纷争。那时暂时称俄国为“罗刹”。罗刹是梵语Rākşasī的音译。据说Rākşasī原指恶鬼，专食人之血肉，可于空际疾飞。清代《皇朝通典》一书中，有“俄罗斯部落的罗刹……”这样的记载。即使仅仅是音译，按照当时的心境来选字也是不妥的。

（1989年10月9日）

# 3.人名

在写小说时，包括我在内，所有的作家都首先要考虑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在写历史小说、传记、实录时，因为很多名字都是现成的，所以只需考虑虚构情节部分的虚构人物的名字即可。其实，即使不是虚构人物，有时也需要考虑其名字。那是因为在日本和中国都有个原则，就是古代文献里不写女性名字。女性一般都用何某之女、何某之妻、何某之妹来描述，即以男性为中心的一种记录方式。

写小说，无论如何都是需要名字的。比如我现在正在写诸葛亮，他是《三国志》中的英雄，蜀汉丞相。可是他妻子的名字却无从知晓。他还有一个姐姐，嫁与庞氏，其名字也无人知晓。

孔明之妻是襄阳名门望族黄承彦之女，是个超级贤内助，如果仅用“孔明之妻……”这种描述方式，未免有些太冷漠，缺乏气势。我还是决定给孔明妻子命名为“绶”，给他姐姐命名为“铃”。

如果说名字只不过是符号而已，按照这个理论来讲，随便起个A、K、T这种足矣。但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大部分小说中的重要人物都是有名字的。

对于作家来讲，小说最重要的是主题和剧情，与其相比，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就是次要的。在构思阶段，用A、K、T这些名字没问题，等整体构思完毕，再给A、K、T分别按个青木太郎、小山二郎、田中昭子就行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问了几个作家朋友，他们都不是构思后，而是在构思前就起好名字。与其开始用A这个符号式名字来构思，不如用青木太郎这个名字构思，主题更震撼，剧情也可在大脑中迅速展开。虽说名字仅是符号而已，但名字和名字首写字母绝对不同。因为如果在人物都无名字的状态下就开始构思剧情，那相当于构思压根儿没开始。

如果是我的话，有时会在大脑中列出自己喜欢的汉字，不过大多是靠电话本那种零散的、世俗的大厚本来解决。随意翻开一页，从中选取比较中意的汉字。中意，不同于好恶。因为小说中的人物里也有坏人。姓和名必须分别选取。如果选的名字是与现实中的人物重名的话，且还是用于小说中的犯人身上，那现实中这个人会因此遭到很多误会，就太对不起他了。

对于字的喜好，因人而异。十年、二十年前的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配角，他们的名字连作家自己都忘了。所以可能出现名字重复使用的情况。没有规定说同一个名字不可以在不同作品中出现。即使这样，作为一个作家，如果在不同作品里重复使用一个名字，就相当于向众人暴露了他记忆力衰弱，所以本人会感觉很不舒服。

除了个人喜好之外，我为了省事，一般回避那种笔画特别多的汉字。尤其是长篇小说主人公级别的名字，得反复书写，所以尽可能对笔画多的汉字敬而远之。不过文字处理机时代，不需要这种回避吧。恐怕我们是最后一代手写小说作家，尽量避免难字是大家的共识。不过总是有倔强人士，所以应该还是有例外吧。

读者印象深刻的名字我都尽量敬而远之。像“松下幸之助”这个名字的确很普通，但是不想把这个名字安在小说中一个在横町开酒吧的老板身上。而如果要讲那个老板因为这个名字而吃不少苦头的故事，或者有意识地效仿松下幸之助真人真事的话就另当别论了。中里介山执笔的《大菩萨岭》里好像就有个叫菊池宽[[1]](#_1_77)的吝啬鬼。

明智家绝对不会给新生儿起名叫“光秀”，而且连“小五郎”这个名字也会敬而远之吧。在中国，姓曹的人虽然非常多，但是他们给孩子起名时绝对是要避开“操”这个字眼。那是因为在戏剧、评书里，曹操已经被定格为一个恶人，明智光秀也是一样。

世上永远不缺怪人，所以也不能百分之百说就没人起这样的名字。另外，假设一个叫山本光秀的人与明智家的独生女经过轰轰烈烈的恋爱之后，成了上门女婿，名字就得改成明智光秀了。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

（1989年10月16日）

注解：

[[1]](#_1_76)　中里介山、菊池宽均为日本说家。

# 4.同名同姓

去韩国旅行时，每当跟人家交换名片、自报家门时，我的名字都会让对方有所反应。他们肯定会面带微笑地问：“啊呀，您叫舜臣呀？”丰臣秀吉攻打朝鲜时，时任朝鲜水军提督的叫李舜臣。姓氏跟我不同，但名字相同。

李舜臣是韩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救国大英雄。当时朝鲜一方手握制海权，丰臣秀吉带领的日本军，没能动得了李舜臣指挥的“龟甲船”一分一毫。

无论是哪个时代，都有忌妒他人成功之徒，因为奸臣元均向朝鲜国王进谗言，所以李舜臣被解除职务，并被投入大牢。朝鲜水军因为没有他的指挥，连战连败，将军元均也战死。朝鲜国王于是释放了李舜臣，并再次启用。名将就是名将，战争局势随即发生逆转，连战连胜。

在日本军撤退之际，前来支援的五百余只战船击破朝鲜水军。在这次战役中，李舜臣壮烈牺牲。对手是岛津义弘。这种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尤其深受人们尊敬。

现在在首尔国会大楼前面，有一尊高大的李舜臣铜像。该铜像右手持军刀，像拄着拐杖的姿势。有人说这个姿势，一旦遇到危险，无法马上拔刀。有说是因为雕刻家马虎了，有说是因为李舜臣惯用左手。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说不是非常时刻，将军都不拔刀，身为将军必须时刻谨慎，故意弄出无法拔刀的造型。我记得导游当时把这几种说法都介绍给我听了。

“舜”是中国古代明君的名字。因为能成为明君的臣民是一种幸福，所以经常有人起名叫“舜臣”“舜民”。听说我的名字是祖父起的，祖父应该不知道朝鲜名将李舜臣的事。

诸桥辙次编写的《大汉和辞典》中，“李舜臣”这个词条里记录了三个人。能记录在辞典里的都不是一般人物。历朝历代中没有名气的“李舜臣”加在一起估计也得是三的几千倍吧。三个人当中一位自不必说，当然是朝鲜著名提督，另外两位都是中国明代人士，一位易学大家，一位是太仆寺卿，古代主管马政的高官。虽然普及度不及日本的“一郎”“正夫”，但是“舜臣”也可列入常用名。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台湾报纸上曾经刊登一则来自伤心父亲的公告。内容是“因为犬子舜臣作恶多端，所以与其断绝父子关系。以后一切与我无关”。当然这里的舜臣不是我。

曾经有个报社记者跟我说，他在京都读中学时，有个同学叫陈舜臣。我中学在神户读的，所以这个人是跟我重名的。

有个警察系统的人跟我说“尼崎料理店的股东名册里有你的名字”，我担心他们擅自借用我的名字，于是匆忙调查，结果发现确有其人。据说他平时用日本名字。总觉得是我给人家添麻烦了。

与日本不同，中国姓氏较少，因此同名同姓的情况也较多。特别是到唐朝前后，像杜甫、李白一样，名字一般都是单字。《三国志》中的英雄，像刘备、曹操、孙权，他们的名字也都是单字，所以同名同姓的概率更高。因此当时除了本名之外，大家还有字。字都是后起的，所以多是自己起的。而名字是呱呱落地时父亲、祖父等给起的，所以与本人喜好无关，但是字可以自己选。

孔子名丘，字仲尼。他出生时头顶凹凸不平，故起名为“丘”。本人肯定不喜欢这种名字。他是父母在尼丘山上祈愿所生，遂字仲尼。

《三国志》里有两个刘岱。一个是同曹操等人讨伐董卓的兖州刺史（地方长官），另一个是曹操部将，攻打过刘备。比较伤脑筋的是两人的字也皆为“公山”。其实“岱”原指中国五岳之首泰山，是天下之公山，因此两人字公山是由此而得。名同字也同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容易造成混淆，所以此时可以通过出生地来区分。前者刘岱是东莱人，后者是沛国人。如果出生地也一致，就要以“何某之子”这种明确父亲名字的方式来区分。如果父亲名字也一样该怎么办？不能麻烦到那种程度吧。

顺便提一下，中日甲午战争时，清朝战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军队在在基隆登陆之后，各地处于无政府状态。此时台北绅士们请求日本军队镇压乱民。请求书上多名绅士的签字中，有一位是陈舜臣。那虽然是我出生前三十年的事情，但后代史家可能将我二人混淆，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我在此强调一下——彼陈舜臣非此陈舜臣。

（1989年10月23日）

# 5. 正确发音

一次在东京出租车里，从无线基地传来语音“有客人在‘ダイヨン’银行前叫车，能在五分钟内赶到的出租车，请速往”。司机听后直咂嘴，说：“不能读‘ダイヨン’，应该读成‘ダイシ’。”[[1]](#_1_79)看似说给我这个乘客听，又似乎在自言自语。随后他又加了一句“因为我是新潟人。”据说第四银行的总行在新潟。在关西地区很少听说这个银行名字。说起“四”的读音，旧制第四高中在金泽，这里面的“第四”的正确读音据说也是“ダイシ”，而不是“ダイヨン”。至少四高是“シコウ”，如果谁要说成“ヨンコウ”，四高的学生会摆出一副慨叹“闻名全国的四高，你竟然不知道？”的表情，很是不乐意。

希望他人能够正确说出自己的名字，这是人之常情。比如“河野”这个姓氏，有时读“コウノ”，有时读“カワノ”。总理大臣海部先生的姓氏读音是“カイフ”，但是我小时候有个邻居，是个优秀少年，也姓海部，却读“ウミベ”。

某在日本的韩国人曾经因为别人没能正确称呼他，就起诉了。他应该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些被人忽视的问题而提起的诉讼吧。准确的数字忘了，要求的赔偿额微乎其微，由此可推测其诉讼的真正目的。那个事件结束后，某报纸让我写评论，我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这个问题如果仅用一个短小的评论，我怕表达不清楚，再招致误会就不好了。说来事情要追溯到殖民时代的“创氏改名”这一强行要求。我想一并学习下台湾皇民化运动和改姓名，所以我没有心情在电话里啪啦啪啦讲。

姑且考察下表面现象吧。首先要知道韩国是使用韩文字母的国家。在李氏朝鲜，汉字是正规文字，其辅助文字字母叫谚文。但是，甲午改革（1894年）以后，谚文开始正式用于公文。“字母”意为“伟大的文字”，是新造的词语，光复后字母就名副其实地成了主要文字，汉字反而成了辅助文字。

走在首尔的街上，你会发现到处都是写满韩文字母的招牌，汉字招牌几乎看不到。偶尔看到一个汉字招牌，不是中华料理店就是面向日本游客的餐饮店。

因为韩文字母是表音文字，所以“노태우”写在前面，“卢泰愚”是辅助文字，写在后面。如果读成“ロ·タイ·グ”，那可是不对的。正确说出对方的名字，这是礼貌。但是日本人无法知道每个汉字的韩语发音，所以如果希望日本人能正确说出自己的名字，那只要把接近于韩语读音的假名印刷到名片上即可。

接到一个崔姓之人的名片，如果问他“您是‘さい’（崔姓的惯用读音）先生吗？”他会突然生气地回应“请您叫我‘チェ’（崔姓的韩国读法）”，真是愁人。

想来，那时报社找我写评论，其实他们是想知道“中国人也希望别人能正确称呼自己吗？如果称呼错了，会生气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谁都不会生气。中国是唯一一个汉字国家，有类似于罗马字的拼音，但是在普通文章里不会同汉字并用。

汉字的发音会因地区而异。“陈”在在北京话里读“チェン”，在广东话里读“チャン”，在福建话里读“タン”。在日语里读“チン”，与福建话相比，更接近于北京话。方言之间差异如此之大，所以中国人已经习惯各种发音。要追求发音的准确性，这根本就不可能。

本来不同语种之间固有名词的准确译音就不太可能。

改宗到伊斯兰教的伊朗，采用了阿拉伯文字的拉丁字母，但是那28个字母不足以表达其国语言波斯语，所以后来又造了四个字母。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乌尔都语里追加了七个字母，这是由于阿拉伯字母无法正确表述波斯语和乌尔都语的原因。

日语中没有能完美表示V音的假名，没办法只能选用“ウ”加浊音的方式来表示。曾经有《惊天研究》这样一本浩瀚的书。那么说到底“惊天”是什么？有这样一个川柳[[2]](#_2_49)：

“歌德说：‘惊天竟是指我吗？’。”

（1989年10月30日）

注解：

[[1]](#_1_78)　日语“四”有两个读音，分别为“ヨン”和“シ”。

[[2]](#_2_48)　川柳是一种诗歌形式，内容大多是调侃社会现象。

# 6.伊之首

伊吕波歌中的“い”是“假名之首”，也有“いの一番”（意为首先、最初）这种表达方式。日本在明治时期之前，都是按照伊吕波来排序的。伊吕波顺序相当于西方的拉丁字母顺序。明治以后，它才被具有合理性排序的五十音图所替代，但是当今剧场中的座位号等，仍然是按照伊吕波来排序的。

——色はにほへど散りぬるを……（花虽芬芳终需落）伊吕波歌是《涅槃经》教义的吟诵，无一字重复，总共使用了47个假名，是一首出色的今样歌。另外像“あめつち”（天地）“たいに”（大为尔）等歌谣，虽然也无文字重复，比伊吕波歌创作得早，但是成就无法与之相比。

比如像“あめつち”（天地）等歌谣，就仅仅是天空、土地、星星、宇宙、山川、河流等名词的简单罗列而已。

因为人们坚信伊吕波歌的作者必是天才，所以一直认为是弘法大师空海之作。但是，这不可能是空海的作品。因为他生活在9世纪前期，当时日语中有48个音节。而“ヤ”行中的“エ”（ye）和“ア”行中的“エ”（e）被等同化而变成了47个音节，是在10世纪末期。所以如果是空海所作，则必是48个假名。

顺便说一下，比伊吕波歌历史悠久的“あめつち”（天地）是由48个假名构成。越往上古时代追溯，日语的音节越多。奈良时代更是超过了50个。万叶假名将其都区别书写。江户时期伪造的几种“神话时代文字”，从47字到50字的都有，别说上古时代了，就连奈良时期的日语都无法写出。

据《古事记》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来自百济的和迩吉师（《日本书纪》版本写的是王仁）带来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从而将文字传入日本。据“皇纪”的纪年方式计算，那是在公元285年左右。如今用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使者到达魏国（239）的46年后来计算，可能更容易理解吧。因为《论语》是公元前400年完成的，逻辑上倒是没有矛盾。但是我们现在用的《千字文》，是梁朝周兴嗣（470—521）所作。按照上面说法，在作者出生的二百年前，该著作就已被进献日本，这也太奇怪了。

《千字文》是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为开头，四字一句，250句，无一字重复，全文共千字。

但是，就像日本除了伊吕波歌之外，还有“あめつち”（天地）和“たいに”（大为尔）等歌谣，也可能当时存在另一版本的《千字文》，是这个版本流传过来了。本居宣长认为《千字文》在当时已与《论语》同样广为普及，都是王仁进献的。

敦煌莫高窟中有一室被一面墙封堵了千年，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包括同一版本的《千字文》30多部。《论语》原本是部10卷20篇的巨著，最初的“学而”篇可能即使是没长性的人也都做了抄写，在敦煌就发现了9部。第13篇“子路”和第17篇“阳货”只各发现了一部。第18篇、第19篇、第20篇是一部都没有发现。

由此可以看出《千字文》普及程度之高了。敦煌文物是唐朝末期（10世纪以前）文物的封装版，但里面不存在其他版本的《千字文》。

北京图书馆馆藏的敦煌文书一览表中，《千字文》中的每一个字都能整理出上百部作品。首字“天”是空档，从“地”开始，到第90个字“位”，共79字，其相关作品已整理完毕。

再说日本，以“は”的第32部为《万叶集》这种整理方法来考虑的话，“黄”的第47部就是《妙法莲华经》。按照这个方法，那就可以整理十万部书籍。

古代中国选拔官吏的考试叫“科举”，考生要一个人在房间待数日完成作答。考场称为“贡院”。京城设有贡院，各省省会也会设有贡院，科举考试三年一次，大约有数千人前来赶考。一栋房子中有数十间独居室，相似的建筑鳞次栉比，很容易迷路。为了不让大家迷路，每栋建筑都用《千字文》中的一个字来命名。

按照“我是在‘成’字楼12号房间”这种方式记忆自己的房间位置。

“成”是《千字文》中第27个汉字。

那么，为什么不是标序号呢？

现代人都会有这种单纯的疑问吧？27号楼的12号房间岂不更加清晰明了？

马上就会有人告诉你——这是传统。

而且可能会反问你：“为什么贵公司地址不是第4区第12号街8号，而是北区野崎街8号呢？”没错，如果日本的城市以人口多少为序来编号，则大阪市就叫“第三市”了。这未免也太过于简单了。

“伊之首、波之五、天之首、玄之六”——不知为何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

（1989年11月6日）

# 7.天与地

秋夜澄明皓月，月明星稀。前几日，在月圆之夜，我和几位朋友一同外出郊游。但见那云层飞走、皓月隐现，也别有万千风情。仰视着万里苍穹，大家异口同声地赞道：“真美啊！”

途中巧遇了两位来自芬兰的女子，于是大家一起结伴而行。我们一行人虽认为她二人也在享受着赏月之趣，但又总觉得，这或许是我们强加给她俩的想法。

倘若我们接连赞叹：“哇，月色好美啊！真漂亮啊！”总有一种把这种情绪强加给她们的感觉。突然想到，由拉丁语月亮（luna）派生的英语单词“lunatic”是精神异常的意思。

虽然我们认为这月夜很美，但是说不准她们还认为很恐怖呢。说到恐怖，传说吸血鬼德拉库拉就会在月圆之夜出现，他龇着獠牙专门猎杀活人吸食人血。

在西亚的伊斯兰诸国中，有很多国家像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那样，将新月的图案绘制在国旗上。东南亚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马来西亚，其国旗也是如此。所以与其说月亮是美丽的象征，不如说是神圣的象征。

在日本，每当满月之时，俳句诗人和和歌诗人就像是尽义务一样进行俳句和诗歌创作。日本著名俳句诗人松尾芭蕉曾作有名句：“名月や池をめぐりて夜もすがら”（月明堪久赏、终夜绕清池）。也有人臆测芭蕉不是终夜绕池赏月，而是因为创作不出佳句，所以才彻夜苦思创作。

总觉得赏月习俗比较重要，或许某天就能派上用场，于是我对赏月做了一番调查，但其在中国的历史也并不十分久远。我查阅了6世纪的《荆楚岁时记》，尽管是内容非常详尽的一部岁时记，却没有任何关于中秋赏月的记载。总觉得赏月习俗是始于8世纪。

《唐诗选》共收录诗篇465首，其中仅有一首唐诗歌咏中秋，那就是王建的《十五夜望月》。据吉川幸次郎说，孔子整合诗篇305首著成《诗经》，其中吟咏皓月之美的仅有一篇，题为《月出》。这篇《月出》可谓是整本书中的一个特例。屈原貌似对月亮也不甚关注。偏爱杜甫诗作的吉川先生说：“最初借诗咏月的就是八世纪中期的杜甫。”

日本的伊吕波歌以“い”开头，中国与伊吕波歌相当的有《千字文》，其打头汉字是“天”。人站立成为一个“大”字，在“大”字头顶加一横就成了“天”。在三千年前的甲骨文中，“天”字是在“人”字上画一个圆圈。总之“天”就是在人头顶之上，并且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增添了宗教、哲学、审美意义的一种概念。

我们现生活的大地，在被统称为“天下”之前，还有另一种叫法——“四方”。我们将想要统治世界的抱负称为“四方之志”。“四方”的命名依据，是以自己所处之地为中心，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扩张辐射的所有大地，即全世界。这种命名可谓是非常形象、非常现实了。

人们仰望天空，开始发觉自己所住的辽阔“四方”，无论何地均处于天空之下，因此“天下”这一概念应运而生。原本对于古代人来说，看不见的东西就等同于不存在，但是“天下”这一概念的出现，说明古人也开始意识到那些目所不及的地域的存在，这可谓是人类认知史上的一大飞跃。

从“四方”到“天下”，将四方加倍细分，便衍生出了“八方”或“八纮”（即八荒）的概念。《日本书纪》中记载了“八紘を掩いて宇と為す”（掩八纮而为宇），意为天下一家。这句话在“二战”时听得我耳朵都起老茧了。[[1]](#_1_81)

武则天（624—705）发明了近20个“则天文字”。她首先将自己名字的“照”改成了“曌”，代表着她如同天上的日、月一般，悬挂在空中，普照万物。武则天死后，这些文字便被立即废弃。但是，由“國”字改造的“圀”，不知何故却在日本得以延续，水户黄门德川光圀就使用了此字作为名字。

要说武则天为什么讨厌这个“國”字，是因为“國”字的口中是个“或”字，“或”通“惑”，且与“域”相似，给人以有限之感。而“则天文字”中的“圀”字，口中是人人憧憬向往的“八方”，且“八方”是将早先表“天下”之意的“四方”翻倍的一种更为郑重的说法，所以改“國”为“圀”。

武则天一时兴起，随意改字。且她执政期间，强制要求使用则天文字，她死后，这些文字被立即废除，所以凡是文章中出现了则天文字，哪怕仅有一字，也能立刻断定出该文章的写作年代。

另外，武则天的“天”字也被改成了奇怪的“00015.jpeg”。“儿”意为身体，代表人（例如“兄”“兒”），“宀”则意为房舍。或许是因为武则天认为“人之上为天，但因我住在宫殿里，所以是人上先有宫殿再有天”，故而采用了这样的字形。则天文字中，将“地”写为“埊”。确实，大地之上有土、有山也有水，“埊”字生动又有趣，但是有趣归有趣，这些字没能被黄门侍郎他们使用，所以没能残存下来。

（1989年11月13日）

注解：

[[1]](#_1_80)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以“天下一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口号，宣扬东亚战争“正当性”，此口号在日本社会家喻户晓。

# 8.窗之雪

“萤之光，窗之雪……”

多么令人怀念的一句歌词。五年级小学生在六年级毕业生欢送会上唱的就是这首《萤之光》，六年级学生唱的是《仰げば尊し》（敬仰您的尊贵）。我五年级学唱这首《萤之光》时，听说了雪窗萤几的故事。大致是说有一名穷学生，穷到连灯油都买不起，借萤火虫和积雪的光亮，拼命学习的故事。我记得当时听到这个故事时，就想那个学生肯定视力不好，而且有萤火虫和积雪的时节都非常短暂，所以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晚上一定都没有学习。

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这是四世纪东晋的车胤和孙康的逸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停电时代”里，经常可以见到把灯芯浸在油盘里照明的场景。现代人一定会纳闷，既然停电了，为什么不点蜡烛？在此有必要说明一下，蜡烛在当时是奢侈品，在千百年前更是如此。

10世纪末，极尽奢靡的南唐被北宋灭国。进驻皇城金陵（南京）的北宋大将军把南唐的一个宫女叫到自己房内。进入房中的宫女皱着眉说：“烟好呛人啊。”因为将军的房内是在用油灯照明。于是将军把灯芯换成了当时十分奢侈的蜡烛，但宫女还是说：“好呛，真受不了。”于是将军便问，那么南唐的宫殿是用什么来照明的？得到的回答是：“将大颗珠宝悬挂起来照亮宫殿。”

或许有人试验过借萤火虫或积雪的光亮来读书。我希望也能有人实验一下，究竟要多少珍珠宝石才能照亮整个房间。

《千字文》的首字是“天”，《太平御览》中的开卷首页也是“天部”。倘若没有“天”，万物便不能开始。

《太平御览》始著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即南唐灭亡（975）的第三年，历时五年，是作为国家重大项目来编撰的大百科全书。初名为《太平总类》，书成之后，宋太宗日览三卷，一岁而读周。为了纪念天子查阅，以元号“太平”加“御览”二字来为命名此书。

全书共一千卷，分五十五部，最开始的“天部”就有十五卷。以日月星辰为主，汇集收录了大量有关于天的记述。

当然“雪”也在“天部”之中，收录在第十二卷中。书中收录了《诗经》中关于雪的四句诗句，还有汉代苏武被匈奴幽禁卧雪吞毡的故事，也有太康七年（286）在河阴一带天降赤雪的记载，更有孙康因家贫而常映雪读书的事迹。

有说法称，因北宋收缴了十几万卷的南唐书籍，才使编撰《太平御览》成为了可能。虽然此书引用的文献多达1690种，但是关于唐代的部分，由于当时《新唐书》还尚未编撰，所以唐代诗人的文集之类并未包含在引用文献之列。

在唐代，关于雪的诗篇不胜枚举，逐一收录的话怕是没个尽头。在《太平御览》的“天部”中，关于雪的诗句，只引用了六朝时期谢灵运的一句诗作：

明月照积雪，

朔风劲且哀。

对于宋初时代的人来说，唐代旧景近在眼前，唐代文献更是唾手可得，根本没有想过要专门收录。

唐诗中描写雪的，最让人惊叹的当属李白《北风行》中的这一句：

燕山雪花大如席。

这首诗描写一个妇女对丈夫战死的悲愤心情。燕山指北方边境，那里的雪花其大如席。李白曾用“白发三千丈”来形容白发之长，所以在此用“大如席”来形容雪花之大也不足为奇。

这句诗以“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结尾。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雪，是一场雪花大如席的雪，我们一点都不觉得这是夸张手法。

雪也有很多种。“雪窗萤几”是勤俭力行的象征，而“雪花大如席”却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悲愤。

在那间礼堂中歌唱“窗之雪”的学生们当中，后来有好几个人死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们正处于21岁到23岁之间；当年唱歌的女学生当中，有人后来可能成了战殁者的妻子。斩不断的生离死别之恨，不是这大如席的雪就能表达的。

（1989年11月20日）

# 9.风雷

京都建仁寺的国宝“风神雷神图二曲屏风”，是江户初期琳派创始人俵屋宗达的代表作。

敦煌莫高窟第249窟营建于西魏时期（6世纪前期），窟顶的壁画上，画着四目六臂（官网介绍的是四目、两足四臂）的阿修罗王，风神、雷神居其左右。不过在敦煌称风神雷神为“风伯与雷公”。我仰头观看这幅壁画的时候，不由得联想到了宗达所画的风神与雷神。

回到家后，拿出图鉴对比细看。敦煌的风伯雷公与宗达所画的风神雷神十分相似，风神都拿着细长的风口袋，雷神的周身都环绕着一个大圆环，圆环上镶嵌着好几个小太鼓。而且风神和雷神都被绘成鬼怪之态，张着大嘴，跳着跑的姿势也是如出一辙。敦煌的风神雷神画像要比宗达的早一千年，所以应该说宗达的风神雷神跟敦煌莫高窟的相似才对。

环绕雷神四周的太鼓，宗达所画的稍小，敦煌壁画上的更大。宗达画的太鼓差不多只有雷神的耳朵那么大，而敦煌壁画上环绕雷公的太鼓，有雷公的整张脸那么大，太鼓大了鼓之间的间隔就小了，看上去比较紧凑。宗达所画的小太鼓零零散散地分布着，看上去比较简洁。

在佛教中，风神和雷神属于千手观音的二十八部众，但也有持不同观点的。本来风神和雷神的原型就是印度古代神话里的Vāyu（风）和Indra（雷），而且佛教起源于印度，所以印度的自然之神成为佛教的善神、守护神也是顺理成章的。

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不止印度人有，世界人民都有。在中国“风”是传达神意的使者神，所以认为风神的体貌似鸟。据说古代甲骨文中的“风”与“鳯”字形相同。

人们认为阴阳合为雷。雷雨有滋生万物之功，所以雷神本应为善神，但雷声巨大，人们将其理解为那是来自上天的警告。

古代文字中的雷字就是在“雨”字下写三个“田”，偶尔还会写四个。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对呀，雷声就是隆、隆、隆的呀，这不与“田”的日语发音一样吗。”可我觉得它不是“田”字，更像是圆圈里画个“十”字，用来表示雷电的速度。

看着敦煌的雷公图，仿佛可以听见那硕大的太鼓发出的惊人声响。看着宗达所画的雷神图，感受到的不是声响，而是那闪电雷鸣时，电光石火般的惊人速度。但并不能根据敦煌的雷公图表达的意境就说在中国，“雷”字内涵只含“声音”，不含“速度”。其实，经常用“迅雷”一词来重点形容雷电速度。而“迅雷”一词之所以得到普及，是因为《论语》中有“迅雷风烈”这个表达。毕竟中国的《论语》，就像基督徒都会熟读的《圣经》一样，中国人都会反复吟诵《论语》，并达到熟记程度。

“迅雷”一词，出自《论语·乡党》。该篇主要描述了孔子的日常生活起居。

单口相声《马厩失火》中的小故事也收录于该篇。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与马相比，人命更为重要。在这一小节之后，讲孔子在什么情况下神色会变。

他遇到穿孝服的，不管平常关系多么亲密，脸上都会露出庄敬悲戚之色；遇到穿戴礼服之人和失明之人，孔子也会变色礼敬。

遇见穿礼服的人，想对方应是出席重大场合，便问候一声“您辛苦了！”面对盲人便面露同情之意。

有盛馔，必变色而作。

做客时，主人用盛宴招待，孔子定会容色庄重并站起来向主人致谢。下一句是：

迅雷风烈必变。

巨雷、大风是上天在发怒，为表敬畏之心必须改变神色。

此处容易让人误解为是因为雷电狂风可怕而改变神色，其实是为“正襟危坐”，洗耳恭听上天的教诲而改变颜色。

最后希望从政者在面对选举时能“改变神色”，心怀敬畏。

（1989年11月27日）

# 10.乐享山中

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

知者乐，仁者寿。

这是《论语》中的名句。吉川幸次郎也含蓄地评论：“该小节非常有名，且富有深意。我不能随便解读。”

连大师都不轻易解读，我等才疏学浅之辈就更不能妄言了。

日本著名儒学大师荻生徂徕认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是古代流传下来的谚语，孔子是直接引用的。‘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段是孔子用来评注上文的。”

要说智者（理性与智慧并存之人）为何乐享于水，那是因为水流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智者能明水之万化，亦与之万化，并乐享其中。仁者（重感情之人）喜爱平静、稳固的大山，纵使周遭变化万千，如山那般不役于物，也不伤于物，不忧不惧，其心不乱，故能长寿。——这一评说可谓是世间通解了。

《孙子》的兵法中也有“不动如山”的描述，但是不是有些过分强调了大山的庄严沉稳与恒久不变呢。

奈良时代以来，日本的读书人在读《论语》的时候，肯定会参照三世纪何晏写的《论语集解》。在该著作该节当中也有提出大山“安固、自然、不动”，但是又补加一句“而万物生焉”。

山载万物，草木繁盛，野生动物和昆虫栖息于此，鸟儿在山间翱翔，充满生机。据说世间万物皆同根同源。仁者乐享于山，那是因为他们享受着与山中万物同生的喜悦。生命与生命产生共鸣，感受大自然的法则，心态平和，自然会长寿。这是我粗浅的理解。

估计是因为“神仙”都住在深山之中，所以“仙”字是由单人旁和山字构成的吧。但其正体字写作“僊”。

东汉初期，即公元1世纪以前，“仙”一直被写成“僊”。当然《史记》中也同样写成“僊”。

秦始皇统治时期，具体说来是公元前219年，徐福向秦始皇上书，奏明海中的三座仙山中有神仙居住，且拥有长生不老药，奏请始皇前去求药。

迁居、移动可以称“遷”（迁）。遷都（迁都）、左遷（左迁）都是其用例。我们竖向书写的时候是从右向左书写。官职列表当然也是从右至左、由高到低的顺序，即右为上，左为下。因此如将其名字从官职列表的右边移至左边，称为“左迁”。由此可见，仙的正体字“僊”也含有移动之意，指迁居之人。

从这个世界搬到另一个世界的人，也就是过世之人，就是“僊”（仙）。

在古代，人们坚信即使人去世了，脱离于肉体的灵魂仍会继续存活。古代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中有种说法，就是人死之后，灵魂会在肉体周边停留三天，然后随风来到一座桥前，在那里接受三名判官的审判。

因为大山是充满生机的地方，所以认为灵魂去往大山的这种想法也顺理成章。人离世，就好似离世之人搬去山中，因此创造出了“仙”字，代替了正体字的“僊”。

综上所述，仙人就是指在山中得到永生的离世之人。贪婪之人世世存在，为了永生不死，自私自利只顾自己。说着容易，但真要成为仙人，需要经受与死同等程度的修行。修行地点当然就是大山之中了。

“山”也有坟墓的意思。即使墓地在平地，也要称为山陵。在台湾，举办葬礼叫“出山”，即使埋葬在平地之中也叫“出山”。这可能是因为对于古人来说，死后魂归山中是一种常识。

把葬礼称为“出山”是俗语用法，原本“出山”是指隐士回归世俗，或指一介布衣百姓（无官之人）走上仕途。

杜甫有诗云：

在山泉水清，

出山泉水浊。

因为隐居，远离世俗，所以清正廉明，若野心勃勃走入官场的话，泉水就会染上污浊。

虽《论语》中说“仁者乐山”，但这里的“仁者”其实是指那些不想进入俗世的人吧。

（1989年12月4日）

# 11.灵宿之山

说起“こだま”（木霊），想必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想到新干线吧。它其实还有山神、回声这层意思。现在的小孩子们都体验过回声吗？学校郊游或徒步旅行的地方，能够让孩子们体验到回声的机会恐怕很少吧。其实“こだま”对应的日文汉字是“谺”或者“木霊”。“谺”这个字象征着尖尖的、凹凸不平的山谷，所以该字在中国完全没有回声这个含义。“谺”不像“辻”“峠”这种日本创造的汉字，而是日本在原有的中国汉字基础上，增加了其他含义的汉字。

“木霊”二字，单从字面意思而言，意为树木的灵魂，这在中国同样适用，但是“回音”这层意思是日本特有的用法。用中文表达日语“山彦”一词，会用“回声”或者是“回响”这样极富散文特征的词藻。

在中国也有灵魂寄生于山川草木的说法，且这种说法多到不胜枚举。从“山灵”“地灵”“川灵”“风灵”到“造化之灵”，这些用例在中国诗歌当中随处可见。

不过人们不认为回声现象是由树灵等自然界的精灵产生的。

进入深山，我们就会感知到灵性之物。即便是唯物主义者，对大自然也要怀有敬畏之心。看到惊人的参天大树也会倒吸一口凉气，因为一旦有人告诉我们说这树已有千年树龄，我们就会惊叹：哇！这棵树见证了藤原道长的荣华富贵吧，也知晓平将门之乱的事吧。

左边高大的银杏树

询问方知它是时代的印记

这支小学生曲目《镰仓》，也唱出了对八幡宫石阶左边大银杏树的景仰之情。

“山彦”（意为山神、回声）中的“彦”，意为“日子”，是对男子的美称。就像海彦、山彦和猿田彦一样，后来也用于神明的名字。回声可能是山神的杰作吧，但是返回相同的声音，也总有种戏弄人类的感觉。据柳田国男调查，有地方将回声称为“山中小鬼”，也有的地方称之为“天邪鬼”。

说到天邪鬼，相传是四大天王和哼哈二将踩在脚下的小鬼，但词典中是这样解释的：故意与别人唱反调的性格乖僻之人。性情乖僻之人总是与别人反着来，而回声是重复别人的话，不是跟人反着来的，所以感觉用天邪鬼来形容回声不太恰当。但是，固执地重复别人的话也可以看作性格乖僻的一种表现吧。

性格乖僻之人和普通人相比就会很显眼。想在充满生机的山中生活，就必须要有顽强的生命力。

信仰山岳就是信仰它的生命力。把大山视为神圣，并加以供奉，日本的三轮山就是典型的例子。三轮山上的神社没有正殿，人们把大山视为身体来祭拜。

在中国，天子也要祭拜名山大川。镇国之宝是五岳。五岳是位于中国东南西北中五座名山的统称。这五座山分别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和中岳嵩山。但是也有用霍山代替南岳衡山的说法。

五岳之中，最为知名的当属东岳泰山了。

泰山脚下的泰安建有泰庙（或者叫岱庙），是祭拜东岳大帝，也就是泰山神的。

只有平定了天下的真命天子才能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汉文帝是家喻户晓的一代名君，太平盛世之时，大臣们建议汉文帝举行封禅大典，但汉文帝以“时机尚未成熟”为由婉拒了。

封禅大典的详细流程已经不得而知了。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称封；辟场祭地，报地之功，称禅。

人们认为山上是最靠近天的地方，在山顶筑土，就可以更接近天了。在泰山脚下筑土是为了离土地神更近。祭天拜地时，他们一定心想这是为了更加接近神明。

秦始皇即位二十八年（前219）进行了封禅。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在山顶祭祀结束下山时，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如注，他便在一棵松树下避雨。后来秦始皇授予那棵松树“五大夫”的官位。朝代更迭，世事变迁，那棵五大夫松树还依然挺立在老地方，它是在向山中树木顽强的生命力致敬。

（1989年12月11日）

# 12.少林寺

三轮山被视为神道灵山，以泰山为首的中国五岳则被视为道教灵山。而中岳嵩山因山脚下建有寺庙所以略带佛教色彩。

嵩山由太室山和少室山两个山群组成。据说，中国古代传说中成功治理黄河之水、建立夏王朝的帝王——禹有两位妻子，年轻的妻子住在少室山，年长的妻子住在太室山。禹便往返于两座山之间，十分辛劳。若让两位妻子住在一起的话，禹倒是会轻松不少，但一山不容二虎，两个女人相处起来想必并不容易。

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在少室山周边建造了少林寺。因坐落于少室山茂密丛林之中，故名“少林寺”，它是北魏孝文帝为了安置他所敬仰的印度高僧跋陀三藏而建，之后因达摩大师在此面壁修行九年而闻名于世。

达摩大师是禅宗始祖，所以少林寺堪称是禅宗的发祥地。

可是当今的少林寺，拳脚功夫过于出名，因此菩提达摩大师与少林寺的渊源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最初只是为了强身健体和自我保护，到后来演变成了使用刀枪棍棒的武术。从幸免于大火的白衣殿壁画中可看到弟子们使用刀枪棍棒习武的样子。

说起那场大火，是指军阀石友三在1928年火烧少林寺一事。在那场大火中幸免于难保留下来的只有千佛殿、地藏殿和白衣殿的一部分，现在看到的少林寺几乎都是灾后重建的。也许是烧毁寺庙遭到了天谴吧，抗日战争时期，石友三因投靠日本军方被国民党逮捕处决了。

关于少林寺，有一件事情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少林寺中有一片塔林，是历代和尚的墓地，里面石塔林立，均有四五米高。

元代时期少林寺曾有一位菊庵住持，于元朝至元五年（1339）圆寂[[1]](#_1_83)。住持去世后由其首席弟子为其书写墓志铭。

为菊庵住持的灵塔书写墓志铭的是来自日本的和尚邵元。在墓志铭的末尾落款：

当山首座日本国沙门邵元撰并書（少林寺首席日本国和尚邵元撰并书丹）

“首座”，即菊庵住持门下的首席大弟子。少林寺中有的弟子很擅长写文章，但并不擅长书法。写文章被称作“撰”，对自己的书法没有信心的人就会让别人帮忙代写。因此，“撰并书丹”就足以说明邵元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写书法都相当自信。在当时的少林寺中，他无疑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才。

日本和尚邵元是因何种机缘来到中国，又是如何进的少林寺目前尚未明确，但我对于他为菊庵住持书写墓志铭，是在弘安之役58年后这一事实饶有兴趣。他对元军的仇恨一定不会轻易释怀的，但信仰的力量战胜了仇恨。

建立少林寺之前，这片土地数百年间一直都是道教圣地。或许当时还没有明确称之为道教，但那里确实是古代民间信仰的繁荣之地。那么究竟为何佛教可以扎根于这片土地呢？

是因为它们都是与人类灵魂的信仰息息相关。道教也好，佛教也罢，同根同源，所以选择相同的土地作为传教圣地也就理所当然了。

以下是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

五台山（山西省）文殊菩萨道场

普陀山（浙江省）观音菩萨道场

九华山（安徽省）地藏菩萨道场

峨眉山（四川省）普贤菩萨道场

我只去过其中的普陀山和峨眉山，这两座山在佛教传入之前好像都是道教的道场。

在9世纪，日本僧人慧萼在五台山请得一尊观音菩萨像，准备带回日本。结果未能成行，遂在舟山群岛的普陀山上供奉。普陀山在此之前原是道人们的修炼之宝地。相传汉代仙人梅福就曾在此处炼过仙丹。

峨眉山上佛家寺院颇多，且其中大部分寺院都是从曾经的道观演变而来的。无论信仰什么宗教，灵宿之地对于信仰者来说都能够公平地释放灵气。

（1989年12月18日）

注解：

[[1]](#_1_82)　也有1323年去世一说。

# 13.腊日

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称为“腊”，是祭祀先祖和众神的日子。因为是在农历十二月，故称十二月为“腊月”，曾经是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如今也常会在贺卡中写到：“去年腊月承蒙您多方关照了。”

在字典中“腊”有两种含义：

①向神明祖先祭祀猎物的传统节日

②年末，年底

②的解释好像更有说服力。象征传统节日的腊，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了。

古人大多都吃粗茶淡饭。普通人只有在春、秋的社日（祭祀土地神）和“腊日”这三个节日里才可以吃到肉。

“社”是由“示”字旁和“土”构成，如字面意思所示，社日是祭祀土地神的日子。春社是在开始农耕之时，所以是为了祈求土地神保佑五谷丰登。秋社是在收割之后，所以是为了感谢土地神的保佑。

春、秋的社日分别是立春、立秋后的第五个戌日。根据周制，每二十五家设立一社。因此，即使说是社日，也只是内部庆祝。与社日相比，腊日则隆重得多，大家可以尽情地吃吃喝喝，唱歌跳舞，十分热闹。

孔子的弟子子贡观赏过腊日的祭典。“腊”在周朝称为“蜡”。《礼记》中记载了腊日弟子与孔子的对话：

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子贡的字）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

子贡是孔子门下子弟中最为富有之人，具有经商之才。比孔子小三十一岁，孔子待他视若己出，因而也会毫不留情地严厉批评。因其很会赚钱，所以在《史记》列传中的《仲尼弟子列传》和《货殖列传》中也有记载。

孔子去世后，子贡悲痛万分，服丧六年。虽然他是位名副其实的实业家，但也是个死脑筋的人，因为腊日祭典的喧闹而怒上心头，就发泄了一句“这种胡闹，有什么好开心的！”针对他的反应，孔子教导他说：“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可以说春秋社日和腊日便是农民的解放日，一年中每一百天才可以奢侈这一次。农民在百日劳苦之后，才有一天的休整与欢乐，那种喜悦与满足你这种有钱人是体会不到的。——这是一种严厉的批评。

一味紧张，有张无弛，无论是对政治还是对军事均无益处。同样，有弛无张，也不合适。只有适度地一张一弛才是最理想的状态。

子贡在鲁国当差，当齐国要攻打鲁国之时，他便各国游说，成功地牵制了齐国的行动。他作为政治家，具有非凡的外交才能，同时在军事方面也出类拔萃。至少本人是一直以此为傲的。孔子注意到了这一点，教育子贡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对轻重缓急的驾驭能力非常重要。

把腊日规定为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不利于老百姓记忆。6世纪的《岁时记》中，将每年的十二月初八定为腊日。这种做法同于端午节和上巳节。端午节原本在五月第一个午日，后来固定为五月初五，上巳节原本是第一个巳日，后来固定为三月初三。

随着时代的推移，传统节日的增加，百姓们得到款待的机会也随之增加。因此，人们对腊日的重视程度也大不如从前，腊日在传统节日中所占地位也日趋下降。也可能因为与其他的年末传统节日活动相比，腊日在辞旧岁意义上略有重复吧。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腊月初八就成了释迦牟尼成道日。明明没有确凿的依据，不知怎么就成释迦牟尼成道日了。而且那天要在佛前供奉素斋，素斋逐渐固化成了粥，并称之为“腊八粥”。腊八粥由豆类、核桃、枣、松子等食材熬制而成，也由此产生了向友人们赠送腊八粥的习俗。在清朝，有在腊月初八向文武百官赏赐腊八粥的传统。

不可思议的是，曾经明明只有腊月初八那天可以随心所欲地吃肉，如今却演变成只能喝腊八粥了。

（1989年12月25日）

# 14.新年应从何时起？

新年应从何时算起？

有人会告诉我，当然是新年钟声响起的时刻。如果身在神户，那么定是神户港内船只汽笛一并响起的深夜零时。

但，且慢……

所谓的新年时刻，是人们将一年分为365天，大致标记的时刻吧？但一年不是正正好好365天。世界现行的标准历法为“格里高利历”（使用伊斯兰历法的国家官方同时使用该历法），该历法规定一年为365.24219878……天。这是地球围绕太阳一周的周期。

所以，深夜零时的新年钟声、汽笛轰鸣声都不能称为真正的新年起始。只是一个权宜之计而已。

我们用闰年调整小数点后面的零头，这也只是人类自行方便的做法。

真正的新年起始超越了权宜之计的约定俗成，是十分庄严的存在，新年起始每年都不同。我们可以通过计算得出新年起始的真正时刻，但是麻烦费事，大家索性不去理它。

大家都忘记了“真正的新年起始时刻”，去酣饮，去食荞麦面条。即使忘记真正的新年起始时刻也不影响生活，所以我们也就习惯了忘却。

但是不知何时起，有人开始在意那“真正的新年时刻”，认为只有在这“真正时刻”燃放鞭炮，接下来的一年才能家人平安、财源滚滚。既然话里提到了鞭炮，那提出这个问题的当然是中国人。但讽刺的是，他竟然是为了追求迷信而想要知道通过科学计算出的新年起始时刻。

不知现在的中国是否还有这样人，我所居住的神户的华侨中，十几年前确有在意新年起始时刻的人。能够算出那个精准时刻的大师仅有一人，每到年末，四面八方电话不断，大师会将计算结果告诉他们。比如：“今年是在凌晨2点18分30秒。”

在神户的街上，新年前后各处经常有突如其来的鞭炮齐鸣，现在大家可以理解了。

人们几乎都忘却了那是新年的起始时刻，把它当成了“点鞭放炮的吉利时刻”。人们向那位大师询问时也是“大师，今年应该几点放鞭炮？”确是本末倒置。

那位大师与我父亲同岁，十几年前即已仙逝。是否有人继承了大师计算新年时刻的衣钵，我已不得而知。可能迷信之人日渐稀少，这种计算也就自然作罢。

古人就已知晓太阳年并非正好365天，带有零头。早在中国殷商时期（公元前1050年左右灭亡）就有相关记载，当时是刻在甲骨之上，已经将太阳年精确到了365.25天。古人还掌握了插入闰年的方法，但当时并非定期闰年，而是人们如感到这一年不合理，就插入闰年，处理得非常粗线条。

在现行的格里高利历之前，欧洲普遍使用儒略历，这种历法也将太阳年精确到365.25天。这个数值比太阳年实际天数多出0.0078天，所以即使四年一闰，128年后仍会出现一天的偏差。

积少成多。

即使如此，人们还是不在意这微小的差异，悠闲地生活了千余年。

不论多么悠闲之人，如果误差到了10天，也会产生疑问。

在基督教范围中，复活节是最为重要的节日，在公元325年的尼西亚宗教会议中，复活节的时间被固定为“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当时春分是3月21日，但1200余年后，春分变为了3月11日。如果不补足十天，复活节就回不到3月21日。

教会中改革历法的专门委员会为了将春分固定在3月21日，曾经荒唐地将1582年10月4日的第二天定为10月15日。为了减少误差，更是在400年内省略了3次闰年。

日本在明治六年（1873）导入格里高利历，至今延用。中国从辛亥革命的第二年（1912）开始导入格里高利历。这39年的时间差，仿佛就是当时日本同中国进步程度的差异。

即便使用格里高利历，一万年后也会出现6天的误差。

不过，现世中没有为万年以后的事情而担心的人吧？

（1990年1月1日）

# 15.一行禅师

在巴黎拉丁角圣日内维耶图书馆墙壁上刻满了世界知名学者的名字。

明治末期，一位从日本远赴法国留学的梵文学者曾多次瞻仰这堵墙壁，他就是京都大学教授榊亮三郎。多年后，榊亮教授在一次题为“大师时代”的讲演中如是说道：

“……古往今来，这座墙壁上为推进学术进步做出贡献的全世界大师的姓名星罗棋布，我曾试着找寻日本学者的名字，结果未见一人。我从正面逐渐转到侧面，忽然看到了‘i-hing’这个名字。“i-hing”是“一行”的标准读音。能够与拉普拉斯、牛顿等人平起平坐的“一行禅师”的名字显得格外炫目。看到这里，一种万里他乡遇故知的心情油然而生……”

“一行”在日本一般读“Ichigyo”，偶尔也读“Ikko”。他是中国唐朝的密宗僧侣，他的名字能被镌刻在巴黎的图书馆墙壁上，正是因为他创造“大衍历”这一功绩为世人所认可。

欧洲更改历法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能像格里高利历那样，使类似复活节等重大节日的季节感不至于有太大出入。可以说更改历法是出于宗教原因。

在中国，正如“天子”二字所表现的含义，皇帝为天之子，奉天命治国。天命通过天文表现，知天文最为关键。

一行禅师受唐玄宗更改历法之命。在此之前人们使用的“麟德历”中记载的日食和月食预报经常与实际不符。一行禅师为了观测天体，制造了“黄道游仪”和“浑天仪”，实地测定了子午线，其成果即为“大衍历”。

遗憾的是，一行禅师45岁离世。“大衍历”是在其逝后的公元727年首次投入使用。

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将“大衍历”带回日本，从天平宝字8年（764）到天安二年（858）日本使用了“大衍历”94年。“大衍历”惠及全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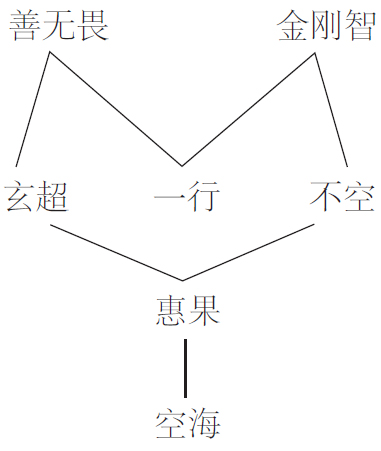
不过，一行禅师的历法计算方式是师从印度人。一行禅师从金刚智和善无畏这两位印度密宗僧侣处学习，金刚智是南印度的秣罗矩吒国人，原名Vajrabodhi。善无畏是中印度摩伽陀国人，原名Śubhakara-simha。

密宗僧侣从某一层面来讲是自然科学者，其实空海也是。金刚智是年过半百之后入唐，而善无畏则是耄耋之年入唐。两人都有着成熟的学识，而一行禅师定是如饥似渴般地从两位师傅那里吸收知识。

发现“0”数的是印度人。正因发现了“0”，高等数学才得到发展。从数学王国入唐的两位大师，定会让一行禅师的才能突飞猛进。学问无国界。如果人与人之间突破了国界去研究学问，那么学问定会长足发展。

一般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行禅师也超越了师父。查看其著作我们会发现一行禅师批判师父善无畏的言论，但那并非因为一行禅师不逊，而是出于对学问的忠诚而为。

密宗中分金刚界密法和胎藏界密法，金刚智将前者、善无畏将后者教于一行禅师，而一行禅师也因此精通金刚、胎藏两界。金刚智门下有知名的“不空”（印度名：阿目佉跋折罗），善无畏门下有“玄超”。长安青龙寺的“惠果”从不空、玄超授得金刚、胎藏两界密教，并将其传给日本的“空海”，上述法脉图示如下：



虽然一行超越了师父，但他却早于两位师父离世。善无畏在一行禅师逝后8年示寂。金刚智在一行禅师逝后活了14 年。

空海是一行禅师同门师兄弟的徒孙。虽然空海是在一行禅师逝世70余年后来到大唐的，但二者并非毫无关联。刚才我针对真言宗学生引用了榊博士的讲演，其中提到：“大师应以异世之师（不同时代的大师）之一行禅师为荣。”

在学问文化国际化浪潮高涨的今天，我们仍常想起一行禅师的故事。

（1990年1月22日）

# 16.加上说

不论何世，人一旦拥有金钱便渴望获得名誉。即使在外人眼里他已功成名就，但本人依然不愿隐退幕后。公司里除了社长，还有会长这种方便的职位。精明强干的某经营者某天突然成为业界大佬，开始为大家东奔西走。我感觉莫名其妙，于是询问了消息灵通人士方得知，原来此人是为了获得一等功勋而为之。我虽不愿相信，但他们为了获得某些头衔，确实需要一些经历，起码能够达到一定的年限标准。

听说艺术家到了一定年纪为了能够得到文化勋章，都会明显变得保守，失去艺术冒险精神，我真不愿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听说在没有一等功勋、文化勋章的时代，东方和西方的人们会为家世门第增光而制作虚假宗谱。于是在16世纪的欧洲，为了辨别宗谱真伪而发展起一门新学问——“宗谱学”（genealogy）。

大阪伟大的町人[[1]](#_1_85)学者富永仲基（1715—1746），在研究佛教思想成立的过程中，提出了“加上”一说。意思是有些人为了让自己的意见具有权威性，特意美化鼻祖。“释迦曾如是说”“按日莲上人之说……”“其实亲鸾圣人……”如此等等，都是“加上”。

现世亦如此。“康德云……”“马克思《资本论》中……”“爱因斯坦……”，“加上”无处不在。

几年前去世的中国历史学家顾颉刚曾用“越古越新”来形容历史文献研究。富永仲基揭露的“加上”并非人物的“加上”，而是一种寄于时代的“加上”。主要是一些当权者，想编造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言辞，穿插到历史长河，可近现代历史已经无处可插，当权者索性就将这些言辞放在古代，再编造些新故事，并在叙述时，在开头处加上“从前”，因此历史学家顾颉刚称这种古代历史式的伪造描述为“新作”。

司马迁（前135—约前98）着实是一位目光敏锐的史学家。中国历史一般按照顺序分为三皇（伏羲、女娲、神农）、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三代（夏、商、周），而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将三皇时代干脆省略，直接从五帝时代入笔。因为他的直觉认为越是古老年代越不可靠。

现在我们再把话题转回虚假宗谱，不论多么假的宗谱，新增内容几乎都正确无误，越往上追溯疑点越多，这跟上文所述的“加上说”逻辑完全一致。

如果有人提出看似来历清晰的古事，那你一定要提高警惕。

例如，女性不能进入“土俵”[[2]](#_2_51)也是被“加上”的荒唐规矩，同虚假宗谱如出一辙。

土俵原本是出于“商业行为”所设，完全拥有自身的历史。

历史上相扑是没有土俵的。力士们在相扑场围坐在一起，大家就在这个围坐的圈内比赛。身材魁硕的相扑被对手撞飞，有时会伤及围坐的其他力士，甚至因此发生肢体冲突，身体受伤。所以德川幕府对此项活动令行禁止，从庆安元年（1648）开始，相扑商演被禁。

商演被禁，也就意味着相扑运动员们没有了收入来源。当时虽然仍有非职业相扑的表演，但都是避开监管的地下表演。

相扑商演被禁的理由是此项运动过于危险，那么人们开始寻求安全的表演方式。从此相扑表演废除了人墙，有的立起四根柱子扯上绳子作为边界，有的用草袋子在地上围成界限。据井原西鹤[[3]](#_3_31)的插图显示，我们可以知道土俵当时是四方形，后来人们感觉圆形更方便，所以圆形土俵成为主流。

努力没有白费，相扑商演被禁36年后，于贞享元年（1684）解禁。确实可喜可贺，但是土俵历史区区300年，并且是商业演出，有必要如此绞尽脑汁赋予它那么高的权威性吗？女性禁止入内即为其一。

根据柳田国男[[4]](#_4_19)的调查，日本相扑的古代传说中，有关狐狸、河童与相扑较量的故事占比很大。据此看来，现在的人们是要将女性地位置于狐狸、河童之下吗？千叶县内某稻荷神社，为了祈祷丰收，保留着插秧女表演的“泥浆相扑”，由此可见女性也参与到了祭神仪式中。

说到祭神仪式，日本艺术商演性质的祭神仪式起源是在天岩户[[5]](#_5_15)前，是天钿女命的神舞与天手力男神的神力的美妙结合。说明从前男女紧密协作，在同一地点进行祭神仪式。如果非要排斥女性，那么我们需要从天岩户传说的远古时代开始重新“加上”、捏造史话。

（1990年1月29日）

注解：

[[1]](#_1_84)　町人：日本近世居住在都市的工商业者，狭义上指有房子的城镇居民。身份低于武士、农民。

[[2]](#_2_50)　土俵：日本相扑比赛场地。

[[3]](#_3_30)　日本江户时代小说家。

[[4]](#_4_18)　日本民俗学创立者。

[[5]](#_5_14)　天岩户，在《古事记》里也被称为天岩屋户，是岩石形成的洞窟。传说太阳女神天照大御神躲进天岩户，世界陷入一片黑暗。

# 17.干支

十二支中的“午”为马，但“午”字原本并无“马”之意。十二支中的子、丑、寅等也完全没有鼠、牛、虎的意思。这只是一种表示顺序的数字，用动物名来对应，即使不懂汉字的人也容易记住。但是用动物名一对应，“午年”不知不觉有一种万马奔腾的活跃气氛，“未年”像羊一样沉稳，“巳年”总有一种蛇一样纠缠不休的感觉。“十干”的甲、乙、丙、丁也同样表示顺序。干为树干的“干”、支为树枝的“枝”，所以“十干”更为重要，我们在说干支的时候，保证是将“干”放在前面的。

今年是“庚午年”。庚为“十干”中的第七位，午为“十二支”中的第七位。“十干”与“十二支”有120种组合，但人类很难活到120岁，所以没有人能够经历这一个轮回。我们现在所讲的“干支”是十二支中的某一项只能同“甲、乙”中的一个进行组合，不可同另一个组合。“子”与甲进行组合，为“甲子”，但没有“乙子”年。“丑”与乙组合，为乙丑，但没有“甲丑”年。所以如此一来，轮回减半为60年，很多人都可以迎来“还历”。

“甲”是指植物种子披着厚厚外壳的状态，“乙”是指萌芽无法伸展的样子，等等这些都被冠以万物盛衰加以说明。但是，根据文字学研究，上述的解释说明是存在疑点的。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即已存在“十干”，我们可以科学地追溯文字形成。据此观点，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的人类是成对摆放身边物品的。

甲和乙即为一对。与古人关系最为深远的占卜用的龟甲为“甲”，同样是占卜用的兽骨为“乙”。正如古人的洒脱，其排列顺序也是任意随机的，在排列“十二支”的时候，将与人生活相关的“猫”漏掉了。

中国有“五行说”，认为世界是按“木火土金水”的顺序，由这五要素构成。“十干”在数量上是五要素的二倍，如此一来人们又组成了一对一对的“兄弟”。比如“甲和乙”是“木之兄、木之弟”，“丙和丁”是“火之兄、火之弟”，所以“丙”给人火势猛烈的感觉。究其原因，只不过根据排序而获得属性罢了。

“十二支”还被用于表示时刻。排序第七的“午”为正晌午。12点为“正午”，其之前为“午前”、之后为“午后”，这些说法延续至今。

火之兄“丙”与太阳当头照“午”组合，即有了“丙午”年，迷信的说法称此年份出生的女性会杀害五六名亲夫，所以此年份出生的女性曾饱受歧视。

鲁迅一篇名为《命运》的杂文中提到，他在上海的内山书店通过杂谈第一次听说日本关于“丙午”的迷信，他向内山先生询问“是否有逃脱此命运的办法？”内山先生淡淡地答道“没有”。

鲁迅陷入了思考：如果中国也有那样的迷信，那么中国人可能会想出如下办法，制作6具假人，让丙午年出生的女性分别和这6具假人结婚，然后再把这6具假人分别烧掉。这位女性接下来会同自己第七位丈夫，也就是真正的“人类”结婚，如此一来，这位丈夫就不会被杀害了……

鲁迅想表达的是，即使对于同样的迷信，日本人会别无他念地迷信到底，而中国人会掌握尺度，适可而止。

鲁迅认为中国没有关于丙午的迷信之说。现在的中国确实没有这个迷信，但丙午年为凶年这一思想在很久以前就已存在。12世纪左右的随笔中就有“丙午年与丁未年，不是内忧、就是外患”这种描述。此外，人们十分避忌丙午年生人的女性这一事实，其实中国明朝（14—17世纪）即已存在。如茶道源于中国，消失在中国，后兴盛于日本一般，这个迷信也是在中国销声匿迹而在日本依然得到保留。

可能是因为中国每二三百年就改朝换代（还有频度更高的时期）一次，随着朝代的更迭，上一朝代存在的事物就会被肃清。此时像迷信这种无聊之事被肃清也无所谓，但往往应该流传下来的结果也会遭到推翻。

通过“干支”我们了解到，古代中国并用“十进制”和“十二进制”。还有说法称，如“十、百、千、万”一样，中国原本使用的单位是“十进制”，从西方国家传入的“十二进制”最初是参考“十二支”创造的。如果这种说法确凿，那么说明国际文化交流从远古时代即已开始。

（1990年2月5日）

# 18.年号之还历

我们查阅古文献或书画时会发现，古人用“干支”纪年。

比如，只说“庚午”，那么可能是平成二年（1990）的庚午，也可能是昭和五年（1930）的庚午，还可能是更为久远的元禄三年（1690）的庚午。

如果知道作品作者生卒时间，那么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创作时间。比如有一西乡隆盛署名，纪年为“庚午”的作品，那么我们就可以推算出此“庚午”为明治三年（1870）。因为1870年前60年的庚午，西乡还没出生，其后60年的庚午，西乡已经去世。

打开手头的《故宫博物院图鉴》，其中有一幅董其昌（1555—1636）的山水画，落款为“癸酉夏”。董其昌满81岁时去世，所以他经历过两次癸酉年，即他的18岁和78岁，按常识说，这幅作品应是他78岁时所作，也就是1633年的作品。

有些细心之人在其作品“干支”前加上年号。这样作品的创作年份就不会出错了。比如雪舟的《泼墨山水图》落款为“明应乙卯”。“明应”是从后土御门天皇到后柏原天皇十年间的年号，乙卯即明应四年的1495年。但不论多么细心的人，也没想过同一年号会使用超过60年吧。其实日本和中国分别有一例这样的情况。

在日本，就是众人所知的“昭和”。持续了64年的昭和时代，分别度过了两次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年。所以有人细心地记述“昭和戊辰”，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是昭和三年还是昭和六十三年。

一帝一年号的制度从中国14世纪下半叶明朝的“洪武”开始，日本是从19世纪下半叶的“明治”开始。

明治之前的日本，同一帝王执政期间会多次更改年号。有喜事要改年号，有悲事时为了祛除厄运也要改年号。孝明天皇执政22年，他曾使用先帝（仁孝天皇）的“弘化”年号2年，之后改过6次年号，分别为“嘉永”“安政”“万延”“文久”“元治”“庆应”。但他仍无法企及同样在位22年的后醍醐天皇，后者陆续用了9个年号（文保、元应、元亨、正中、嘉历、元德、元弘、建武、延元）。

明治之前，使用最长的年号是“应永”，后小松天皇与称光天皇两位帝王连续使用35年，这是院政时期的特例。其次是恒武天皇的“延历”使用了25年，然后是“天平”“延喜”等多个年号，只勉强坚持了20年。很少有人能够记住全部年号，但使用了20年的“天文”“宽永”“享保”等为我们所熟知。

干支60年，一个时代的循环，当然前提是时代不可超过60年。人到还历之年，即迎来六十花甲之际，会有人送他红色的儿童棉坎肩等物品，意为他已完成了一个人生轮回，接下来应重新回归婴儿状态，重新面对第二个人生轮回。

在中国，“还历”称为“華甲”。“甲”位列“十干”之首，表示年份。按虚岁算，还历应为61岁。“華”字是由6个“十”和1个“一”组成，所以作为一种文字游戏，“華甲”被用作还历的别名。不过“華”字有辉煌绚丽之意，形容红坎肩最合适不过。

在中国，使用超过60年的年号为“康熙”。从壬寅（1662）开始，到壬寅（1722）结束，正好迎来还历。但在中国，先帝驾崩之年不改年号，而是在次年更改。不会出现日本这种昭和六十四年与平成元年为同一年的情况。

康熙帝的孙子乾隆帝的年号从丙辰（1736）开始，到下一丙辰的前年乙卯（1795）结束。乾隆在位60年后，将皇帝之位禅让给了皇太子。其理由是，乾隆不想超越祖父，不能让自己的年号长过祖父的年号（康熙61年）。乾隆帝退位后活了4年，在满88岁时驾崩。原本乾隆的年号可以与昭和的持续时间相平。乾隆帝退位后以“训政”的形式实际掌控着大权。

日本的明治、昭和以及中国的康熙、乾隆，都是国民无法忘却的年号。

我们也应该知道，有些年号有其时代特点，只要听到这个年号，人们就会浮想起那个“时代”。但抛除这些特殊年号，大部分时代还是以公元纪年比较易懂。

（1990年2月19日）

# 19.同开高健先生之赌

开高健先生逝世，回想与先生的点点滴滴，我发现竟同先生一起5日游3次。其实我一直以为是2次，在回答报社采访时我也是这么说的，但正确答案应是3次。看来人的记忆真是不可靠！

文艺春秋经常组织3位作家巡回演讲，通常是5天行程。1975年秋，我同开高健、井上厦三人，周游了冈山西大寺、府中、德山、下关等地。

巡回演讲的庆功宴在下关市举行，正赶当季，我们品尝了河豚。但当时只有我和开高先生参加，而井上先生截稿日期临近，旅行途中的深夜也笔耕不辍。也可能是因为他不喜欢河豚。总之，记忆里只有开高先生连呼“好吃！好吃！”的场景。

我还记得先生曾说“我们是为了吃鱼白才来的下关哦！”

第二次同开高先生出游是次年秋天，井上先生换成了田边圣子女士。旅行路线是唐津、大川、甘木、对马，好像是在博多集合。在博多见面后，开高先生开口便说：“我们这次就不讲政治了吧！”那一天我计划回神户，但因大雾仙台机场封闭，我是坐东北本线（当时新干线尚未开通）换乘东海道新干线回到家中，两天后前往博多。

那次旅行，我们未谈政治，只聊了食物的话题。开高先生介绍了他在越南时吃到的各种食物，尤其对野鼠肉赞不绝口，我对此印象特别深刻。

在对马住宿时，先生说道：“BAFU特别好吃，汉字是‘肉腐’。”

我说：“不对，不是‘腐’字，是这个字。”并在纸上写出“脯”给他看。

两人争执不下，最终决定赌一赌。BAFU指的是猪肉松，多用于中国南方，是福建、台湾的土语，多用音译汉字表示。中国普通话中的“脯”和“腐”发音完全相同，“脯”有干肉之意。且台湾话中的“豆腐”的腐为一声，但指猪肉松的BAFU的“FU”为四声，并非“腐”的发音。语音知识我略知一二，所以我们之间的“赌博”并非公平（结局注定我获胜），我本想不参加此次赌局，但开高先生兴致盎然，我便随了他意，约赌“1万日元”。

记事本上写的是我于10月29日从对马回到家中。

现在，我是怀着哀惜之意打开高健先生的来信。之所以保存着先生的来信，是因为我已将其当成名作。信封上印着11月2日的邮戳，当时先生的回应十分迅速。

其内容是引用了某作者的《台湾料理物语》，提出该书中有“肉腐”二字。结尾说：“BAFU的FU到底是不是‘腐’字，仁兄不妨自己再思考下，这一赌越来越有趣啦。”我立即回信反驳。虽未留存回信的复印件，但大致内容应该是论述了语音，提出即使同为音译汉字，与“腐”相比“脯”更为贴切。之后开高先生又发来一个快件，邮戳日期为11月15日。我谨以先生的书信全文祈祷亡友冥福：

感谢你的来信。

近两三天诸事繁杂，迟迟未能回信，还请见谅。书信里我就不一一赘述。其实很久以前即应拜读诸桥大先生之辞书，但却因本人懒散至今未果。小生在东南亚诸国闲游之际甚爱此物，在香港店铺被告知此物为“BAFU”，之后我也一直照此发音，偶书写汉字“肉腐”，皆通用。我明知作家应以经验为重，不可沉溺于经验，可我却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呜呼！信中财物请用作令公子之教育费或先生之烟草费。

陈舜臣先生，如您所知[[1]](#_1_87)。

信中财物为一张1万日元。14年前的信纸已经泛黄，但健朗的开高健先生如洪钟般的声音仿佛仍跃然于字里行间。开高先生可算文坛三大嗓门之一，先生说“丸谷才一、井上光晴那高嗓门全属噪声，我的声音可是曼妙的旋律，不要将我同他们混为一谈”。

（1990年2月26日）

注解：

[[1]](#_1_86)　开高先生认为陈舜臣先生看到信函内容，就应该知道他是谁，所以特意没有署名。改用“如您所知”来代替。

# 20.同开高健先生之旅

我不写日记，但经常将访问人员姓名、工作内容记录下来，不过也并非每次都记。手账也有连续几月都是空白的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过于懒散放纵。

说起同开高健先生第一次旅行为何时，我已无从查起。但当时成员中有山冈庄八，所以那次旅行应该是在山冈先生去世（1978年）之前，且我们未办理任何手续即前往冲绳，所以应该是在冲绳回归（1972年）以后。在此期间，我的手账空白页较多。虽尽力回想，但终究无从忆起。这种情况，如向主办方咨询，应该会马上知道答案。于是我电话咨询了文艺春秋，得到的答案是1972年11月5日至9日。

如果所有的记录皆被储存，并且随时可以调取，那么人们就没有必要去记忆了。对人类来说十分重要的记忆能力也会随之退化，人类的大脑最终可能变得同阑尾一般。

闲言少叙，我们还是借助于储存的记录才得知具体时间。旅行路线是从宫崎前往鹿儿岛，然后坐飞机赴种子岛，又从种子岛回到鹿儿岛，再坐飞机飞往那霸。

种子岛的西之表市当时在日本是人口最为稀少的城市。人口不足3万不能称为市。西之表最初是曾拥有3万人口的，但之后人口不断外流，人口数量大幅下降。虽然不能引以为荣，但西之表市确实占了日本人口最少城市之名。

开高先生在西之表市政府中用洪亮的声音如是说道：“我曾想象，如在种子岛打棒球，球一定会经常掉入海中。没想到种子岛挺大的。”说“没想到种子岛挺大的”，他可能本意是想赞美一下，但是我记得市政府的工作人员都是面露不悦之色。

在这座城市里，有两三间酒吧，开高先生邀请我一同前往。但我以演讲有点劳累，想休息为由拒绝了开高先生——其实是为了偷懒。开高先生好奇心极强，过后向我讲述了他在酒吧的探查结果。

“在酒吧工作的女性都不是本地人。这座岛上的外地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县政府派来的公职人员，一种是在酒吧工作的女招待。当地人如果想从事这种酒水生意，都去外地。听说是去鹿儿岛一带。”

旅行中，种子岛的下一站是冲绳。开高先生又邀请我去酒吧。

先生说道：“把提督也叫出来。”提督指的是山冈庄八先生。

当时，每年都会上演“文士剧”。作家、漫画家登台亮相，表演着拙劣的戏剧。我还记得在当时旅行的前一年上演的是司马辽太郎的原作《坂上之云》。主演秋山参谋由柴田炼三郎担任、东乡提督由山冈庄八担任、东乡的副官由我担任。我的戏份只有被长官叫到时回答“是”，没有其他台词。可能是因为演出总负责人川口松太郎担心给我太多台词会被我搞砸。开高先生并未出演，他作为观众观看演出。按先生所言，东乡提督这个角色演得最好。之后开高先生一直称山冈先生为“提督”。

“提督，你今天假扮妇产科医生，我们假扮实习生去酒吧，在那里为人免费看病。”

当然是玩笑，我可没想去免费看病什么的，但可能真有些女性正为自己的身体而烦恼。“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可以建议她去大学的附属医院。”开高先生的脚本十分现实。

我说道：“提督当妇产科医生还说得过去，可我们当实习生有点太别扭了吧？”

“那我们就当他徒弟吧。”

就这样，山冈先生假扮妇产科名医在那霸的酒吧喝了酒，但并没有女性过来寻医。不过山冈博士的演技很高，演出了精英医生的风采。

开高先生歪着头说道：“嗯，有点太沉闷了。”但看起来还是挺开心。开高先生不论何时都能拥有一颗娱乐之心。

开高先生一直用洪亮的声音聊着美食、钓鱼、越南从军的话题，如果先生没有在说话，那就一定是在吃东西。总之嘴一直是在动的。我从开高先生处受益颇多。二人约赌亦是如此，其中学到的一个最宝贵的经验就是对任何事物我们都应以娱乐之心去待之。

读卖新闻社还曾策划一同去蒙古，很遗憾未能成行。

（1990年3月5日）

# 21.雪日

近日下雪时，有人问：“几年前也曾下过如此大雪，是吧？”我立即给与准确回答：“那是6年前的1984年！”

那一年的大雪，是在我六十周岁生日，也就是我还历的前一天下的。那一天，我已定好在神户市内进行讲演。我家位于山脚下的坡上，我还在担心来接我的车是否能开过来的时候，车已经到了。与其说担心车无法过来，其实内心更加期待讲演能因为下大雪暂停。不论参加了多少次讲演活动，我都无法喜欢上它。到了会场，发现房间没有想象的大，但听众满场。我很感激听众在如此大雪中还这么捧场。

等待室内有镜子，我对着镜子认真观摩起了自己的脸。这张脸是60岁前最后的脸庞。明天正式进入60岁。

有一首歌叫《来路历历，归途凄凄》，讲演开始前我已开始担心回家之路。今天来了很多听众，他们的家大部分都应在平地上吧？可能家住高坡上的人们今天都不会出门。

讲演从傍晚开始，归家已是夜晚。雪中坡路，汽车可能无法攀爬。为了应对突发情况，我急忙让人在运动用品店给我买了双登山鞋。我盘算着，汽车能开到哪儿就开到哪儿，余下的路程我就靠着登山鞋努力步行回家吧。

幸运的是，回家路上虽然很堵车，但车总算开到了我家，没有用上登山鞋。

正因有这个经历，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场大雪。并且还值我还历之年，年份我也记得异常清晰。

历史上与雪有关系的重要事件，应属元禄十五年（1702）12月14日的赤穗浪士事件以及昭和十一年（1936） 2月26日的“二二六事件”。未来可能有人会将这两个事件改编为戏剧、电视和电影，但拍摄场面中必须有雪，否则剧情不完整。

说到昭和十一年（1936），我正上小学六年级，那一年四月份我升入初中。“二二六事件”我是知道的，但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升学考试，所以那年的雪让我印象深刻。我记得当时我还很孩子气地担心下了这么大的雪，是否会影响升学考试。当时的心情也颇有可能跟50多年后的我参加这次讲演一样，会想升学考试要是能因下雪而中止该有多好。

下雪会带来诸多不便。这种想法对于雪国地区的居民来说，荒谬可笑。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是没有做好万全之策，所以才会有不便之处。在雪国地区，人们是按照随时做好下雪准备来安排冬季生活的。而在非雪国地区是不常下雪的，所以偶尔下场雪就会感到各种不便。

今年1月直木奖评选日也下雪了。我在神户家中正准备要去东京，主办方来电话称希望我尽早到会场。我一般都是留出充裕时间购买新干线车票，一直没出过问题。这一天，以雪著称的关原地区并未下雪，从箱根地区开始下雪，所以新干线晚到了15分钟左右。

评选委员会是下午6点正式开始。从酒店到会场坐车需要15至20分钟时间。每次来迎接我的车都是5点半左右到达酒店，我每次都会在会议开始前十几分钟进入休息室，观看几场相扑比赛后进入会场。但这次来迎接我的车5点前即已到达，并且我们用了不到10分钟就抵达了会场。公路上车辆很少，所以一路非常顺畅。

所以下雪就会迟到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正因下雪，很多上班族不会自己开车，而是选坐电车。如果遇到堵车，车子进退两难会十分麻烦。所以这一天，不是紧急的事车辆都不会出来行驶，道路反而会很畅通。

其他的评委平常都是1个小时的车程，这次也只用了30分钟左右。这次我有时间慢慢观看电视放映的相扑比赛。直木奖评选委员会仍然从6点开始，但芥川奖评选委员会因全员到齐，开始时间比计划提前了很多。

参谋、昔日军师等人员会尽量多搜集信息，设想活动的各种可能性，对活动进行分析、判断。主办方一般会通知我们：“下雪天路上车辆稀少，在路面未被冻上之前，车程时间会比正常缩短，请您不用着急。”没有习惯下雪的军师或参谋会出现判断错误。其实不仅是对下雪路况的判断，对尚未习惯的事情往往都会这样。

（1990年3月12日）

# 22.春字

贺年片中常有“迎春”二字，但阳历新年正值冬季伊始，阴历春节才算是最为寒冷的时节。今年的阴历春节是大寒节气的一周之后。

根据太阳运行确定的二十四节气作为四季的标尺非常合适。不过此节气是根据2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的气候来制定的，所以我觉得日本的气候与此节气稍有出入，中国江南地区的人们好像也有同感。

让人高兴的是每个节气的命名都非常恰当。首先是“立春”，15天后为“雨水”，然后是“惊蛰”，之后到了“春分”，然后再过15天是“清明”，正值春意盎然。

3月6日（节气因年份不同会有一天差异）“惊蛰”指的是冬季在地下蛰居的虫子悄无声息地从洞穴爬出的意思，十分有趣。

古代人应该是每天都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但意外的是表现季节的词汇却出现得很晚。

我之前曾说过，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片的卜辞中已经发现了“干支”的记载。但目前还未发现表现四季相关的文字。也就是说，人们还没有考证出春夏秋冬这些文字在卜辞中被用作表现季节。

“春”字以前是草字头，意为草木终得萌芽。下面有一“日”字，说明与阳光相关。

《礼记》中解释道“春为蠢”。草木、地下蛰居的虫子都悄无声息地动起来，是蠢动的季节，所以人们将这个字用来表示春天。这样一来，“惊蛰”才能成为“春”的基础。

“夏”字在甲骨文中是身着正装之人翩翩起舞的样子，代表文明人。只穿着一条丁字裤乱跑的样子称为“蛮”，与“夏”相对。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赋予“夏”字“盛大热烈”“伟大”之意，“夏”字还被用作朝代的名称。西周青铜器的铭文中，“夏”字不用来表示夏天之意。到了春秋时期，人们才开始用“夏”表示酷热的季节。

“秋”字曾表示稻谷成熟之意，是收庄稼的重要时期。重要时刻都可称为“秋”。3世纪上半叶，诸葛亮著名的《出师表》中有“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的描述。他是在建兴五年（227）3月写的此文章，3月保证不是秋季。

“冬”字有完结之意。为其加上绞丝旁，为“终”。因是季节的结束，人们借用此字表示冬季。

文字被创造出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感觉没有必要用文字表达四季。不需要文字，也就等于不存在描绘那些事物的词汇。

我想，是不是因为古代人与大自然接触得过于亲密？看到花朵赏心悦目，那是因为我们同花之间保持了一定距离后观赏的感受。但如果我们同花合为一体，让自己与花朵同命运共呼吸般地生活，我们就难以再秉持观赏的角度。

风儿变暖、地下的虫儿爬出地面、草木开始萌芽、花开了——古代人与这些事物紧密相连，相互融合，所以没有必要将这些现象统一称为“春”。

度过漫长难熬的冬天，春天到来，古人应该非常高兴，喜不自禁。他们当时已经知道用干支数月日的方法，又想该用什么词汇来描述这不足百天的季节，估计古人为寻找合适的词汇也商讨良久。

我们可以想象，古人在谈论着“草木萌芽、地下的虫儿爬出、心情激动”，“那么‘春’字是否合适？”

我们脑海中可能会浮现“春只留名”“春意尚浅”这些歌词。我们能感受到春意之时才是最为惬意的。唐代韩愈有一首名为《早春》的绝句，其中一句是“最是一年春好处”。比起春意正浓、晚霞垂柳满皇都的时节，韩愈断言早春才是最好的。

如果说熬过严寒，开始蠢蠢欲动是“春”的原意的话，那么这形容“早春”最为贴切。樱花盛开凋落、柳絮飘飘的景象已是度过了蠢蠢欲动的时期了。

（1990年3月19日）

# 23.闭校仪式

“闭校仪式”[[1]](#_1_89)这个词，很多人听着会很陌生。不过既然有“开校仪式[[2]](#_2_53)”，与之相对固然会有闭校仪式，但该词使用频率较低。举办短期讲座之类的学校，或许还会有闭校仪式，但只要说“闭”，意思就是不会继续下去。有些经营有道的烹饪学校、文化培训中心，学生鱼贯而至，很难到闭校的地步。

但是我的母校给了我一份“闭校仪式”邀请。因为那一天正赶上有其他事，我未能出席，即使没有其他事，我也不想出席。

我的母校神户小学的学区是神户市中心的元町和三宫。这次她为自己106年的历史画上了句号。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正赶上学校建校50周年，我们在学校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正好处于正中间的位置。

查看名单，发现我们那一年级有男生196名、女生192名，拥有近400名学生，当然全校学生超过2000人。而如今有的学校一个年级才二三十人，全校学生都不如我们那一届学生多。这样一来，“闭校”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城市中心居民过于稀少这一现象不只神户有，东京、大阪亦是如此。印象中多次在报纸上看到很多名校被迫关闭的报道。

印象中，曾经有一段时间学校教室内人满为患，有些教室的讲台甚至都被撤掉。个子矮矮的我总是坐在第一排，黑板跟前儿，上课时我总是要昂着头，弄得脖子酸痛。后来不知是因为学校增加了班级，从而问题得到了解决，还是因为当时某一班主任休假，其班级的学生都被分散到其他班级。总之，记忆中的小学总是热闹非凡。

学校内曾设过“移动班级”，就是没有教室的班级。当时好像普通教室和特殊教室各班是交替使用的。小学也有音乐教室、图画教室、手工教室等，并且到了体操时间等，教室会开放。在那期间，教室会不断被借用，所以教室内肯定发生过东西丢失的情况，但是在这个漂泊的班级里，也别无选择吧。

在因学生人数不足而面临关闭学校的今天，小学的经历就像做梦一样。

昭和十年（1935）前后，神户一片欣欣向荣。军工产业、造船业都是满负荷生产，很多人都来神户工作。神户小学的学区内虽然商店街众多，但每家店都十分繁忙。当时的商店大多数结构都是一楼店面，二楼是店主家人居住的地方。如果店里繁忙，妻子或兄长、姐姐也会从二楼下来帮忙。

如今的商店街高楼林立，店主（按现在的话应该称为社长吧）和家人往往在芦屋、御影、须磨等地居住。男主人每天跑通勤。孩子们分别在所属学区的小学上学。所以我的母校学生人数每年都在减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虽然学校遗憾关闭，但仍有救赎的方法。听说学生们都转到山手的诹访山小学，学校更名为“神户诹访山小学”。就像两家银行合并似的。

我在诹访山小学读到小学二年级，三年级时转校到神户小学，对于我来讲，是两座母校合二为一了。

已故的今东光先生是在神户度过的小学时代，有一次在共同旅行中我曾介绍了自己的履历，今东光先生欣喜地说道：“原来你也在诹访山和神户小学读书呀？我也一样，这么说你是我的学弟啦！”

今东光先生在两所小学就读，并非因为转学。先生从诹访山小学毕业后，没有考上初中。套用今东光先生的说法：“初中老师判卷时梦游了，我才落榜的。”

当时周边只有神户小学有高等科，于是今东光先生将学籍转入高等科，第二年就顺利地考入了初中。不过在丰冈初中和关西学院，今东光先生最终都是中途退学。

今东光先生可谓就是英雄不问学历的典型案例。

我收到闭校仪式邀请，很多回忆萦绕脑中。作家岛尾敏雄先生也是我神户小学的学长，四年前去世，听岛尾夫人讲，他家书架上摆放了我写的《中国历史》15卷，而岛尾先生就是倒在了那个书架的正下方。

通过学校，我与很多人结缘。学校关闭，我们感到若有所失，但是一想到是我的两所母校顺利合并，我还是想打起精神来对母校说声“恭喜！”

（1990年3月26日）

注解：

[[1]](#_1_88)　宣布学校关闭不再运营的仪式。

[[2]](#_2_52)　相当于中国的揭牌仪式。

# 24.新学年

4月是新学年开始的月份，从幼儿园的小朋友到大学生，满怀希望地升入新班。樱花是4月的象征，也是新学年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线。

我们那个时候的小学一年级国语教材中有HANA、HATO、MAME、MASU、MINO、KASA、KARAKASA这些单词需要学习，我们在学校最开始学习的HANA这个单词，一定是代表了樱花的意思。多年后，听说教科书中变成了SAITA、SAITA、SAKURA、GA、SAITA，好像还有一副彩色印刷的樱花树插图。我们那个时代都是黑白印刷的，与其说是昭和的感觉，不如说是大正的感觉更贴切。

新学年被定为4月开始，其背景与樱花有关，我们的印象中好像只有日本如此。世界上大多数学校的新学年是9月开始，9月中的很多风景也都同新学年联系到了一起。

4月作为新学年季节着实合适。春意盎然之际跨进校门，被葱葱绿意所围绕，开始新的学习生活。即使到了秋季，9月酷暑仍存，这是收获和落叶的季节，感觉跟新起点不搭调。

但是4月作为新学年的开始也有缺点。因为暑假时间较长，一个学年被分成两大部分。一系列课程需要中断2个月时间，开学后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多会不在状态。9月开学的优点就是可将暑假置于学年之外，一个学年原则上从9月份开始到来年7月份结束。

“国际化”这个词日渐流行，日本学生赴国外留学和外国学生来到日本留学的人数逐年攀升。如果新学年一直定为4月，无论是日本学生走出去还是留学生走进来都无法顺利衔接。在大学间的国际合作或者大学间采用同样教学计划方面都会带来很多不利影响。所以有呼声认为日本部分学校应将新学年开始时间改为9月份。

肯定会有人感性地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入学就应在樱花盛开的春天。还会有人提出应该保持传统。

说到传统，其实明治初期学校是9月开学的。日本是学习欧美制度建立了学校，办学初期学校的老师多是欧美人（雇用的外国人），因为还要考虑雇用的时期，所以将新学年定为9月。

4月入学，是迫于政府人员和军人压力的产物。政府人员为了配合财政年度，认为4月份入学更为合适。军部也因征兵登记时期的关系，认为新学年定为4月更好。

明治六年（1873），东京大学的前身开成学校将学年定为9月至来年7月，但当时人们还在使用“学岁”这个陌生词汇，当然其他的学校纷纷效仿最高学府的做法。

但是培养教学官员的高等师范学校从明治十九年（1886）开始，采用了4月新学年制度。明治二十五年（1892），全国小学改为4月开始新学年。

帝国大学努力坚守9月开始新学年这座孤垒。顺便说一下，东京大学前身的东京帝国大学在明治三十年（1897）京都帝国大学成立之前，是唯一的“帝国大学”。因为京都也成立了帝国大学，所以首座帝国大学才勉强地冠以其所在地的“东京”二字。

东京帝国大学采用4月开始新学年制度是在大正十年（1921），摒弃了建校以来48年的“传统”。当时的日本是政府人员和军人的天下，所有事务都按照他们的意愿安排。

我听说过和服店曾反对9月新学年。因为幼儿园入园、小学入学会举办入学仪式，母亲们都会为自己的孩子购买传统和服，如果是9月份开始新学年的话，因为天气仍然炎热，大家基本不会穿传统服饰。

和服店应该发挥聪明才智，设立“穿和服交好运节”这样的节日。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巧克力店创造了“情人节”，巧克力销量大增。公元3世纪殉教的圣人瓦伦丁与巧克力到底有何等关系？直到16世纪哥伦布将可可豆带到欧洲之前，欧洲应该是没有巧克力的。暂且不论渊源，情人节在商业运作上是十分成功的。

话题有些脱离主题，关于新学年开始时间的修订是非问题，我希望能从教学角度进行论证。即使错了，也不能总拿“传统”当幌子。

（1990年4月2日）

# 25.眼镜纪念日

读卖新闻社策划的“三川源项目”前几天举行了成立仪式，我作为委员应邀出席。江上波夫先生等多人曾到访过蒙古国，我在会中了解了很多关于蒙古的事情。其中，关于在乌兰巴托附近举办赛马大会的话题十分有趣。那里的赛马并非围着赛马跑道比赛，而是在草原上的长距离比赛。江上波先生当时受邀坐在终点附近，所以对比赛途中的情况一无所知。在终点观战的人突然欢呼，一问才知原来是头马出现了。可是被邀请观赛的日本人不论怎么努力寻找都无从发现。有人告诉日本人“在那里，在那里，那里腾起了沙尘”，可大家依然无法看清。周围人们越来越兴奋，日本人被告知“马上到达终点！”此时大家才从草原的尽头隐约看到一团沙尘。

有人说“他们的视力特别好，是我们的三倍！”蒙古人的视力达到3.0这可能吗？据说黄种人近视多，白种人远视多，可我总觉得这种说法不靠谱。

说到视力的话题，我突然意识到今年是我佩戴眼镜的第50个年头。我好像是在16岁那年的春天开始佩戴的眼镜，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因为是新学年伊始，所以应该是4月初。

那是我的眼镜纪念日。

我左眼视力1.0，右眼0.2，两眼度数差很大。左眼可正常看清，即使坐在电影院的最后一排，不戴眼镜我也可以看到字幕。但在桌前稍微学习会儿眼睛就会感到疲劳。因为临近升学考试，想想应该学习了，一学习我才发现自己的这个问题。如果早一些学习，估计我会更早戴上眼镜。真是有些惭愧。

在小学毕业典礼的照片中，我没有佩戴眼镜。这张照片，全班47人中有12人戴着眼镜。我们班是戴眼镜人数较多的班级，当时我还未加入戴眼镜的行列。我是初中四年级开始戴的眼镜。在毕业影集中，有我戴眼镜的形象。但是，我从大阪外语大学毕业时并没有戴眼镜。因为处于战争状态，毕业时并没有华丽的毕业影集，但在我临近毕业时照的照片中并没有发现我戴眼镜。

当时到了大学三年级，我们都到信太山的营舍接受了四天左右的军事训练。在一次军事训练中，我大喊“向前冲啊！”眼镜也飞了出去，可能是因为出汗后脸滑造成的。我本想去捡起眼镜，但教官金田大佐在监督我们。虽说大佐不会亲自殴打学生，但他会命令其他教官执行。比如会说“峰田少尉，给我打那家伙”。在向前突击中，如果我不知趣地去找眼镜，肯定会被痛打的。于是我放弃了。我之后想去寻找时，由于信太山太大，已无迹可寻。

因为我的左眼与常人无异（虽然当时度数已经降到0.8），不影响正常生活，所以直到大学毕业我都一直没有戴眼镜。

毕业后我成为了研究所的助手，因为整天都要面对小小的铅字，所以还是定做了眼镜。后来战争终于结束，我开始帮忙家族的贸易事业，并成家立业。结婚纪念照片中的我并没有戴眼镜，我已经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摘掉眼镜了。

后来我开始从事小说等写作。在获得乱步奖、直木奖时，照片中的我是戴着眼镜的。那我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戴眼镜的，竟然丝毫不记得。

1940年的我确实是戴眼镜的，所以今年是配戴眼镜50周年，但我不是一直戴着眼镜。回想一下，被形势所迫之时我会戴上眼镜，没有那么紧迫时我就马马虎虎。

30年的写作生活，我一直戴着眼镜，但并非一直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在近视之后，又有老花眼，还出现了白内障早期症状，所以离不开眼镜。

回想起来，我也有不好好对待眼镜的时候，但现在眼镜是我的依靠。人们在上了年纪以后，往往对以前不太在意的东西开始倍加珍惜。看到年轻人不珍惜这些（第一是时间，再有眼睛等）时，我就想上前劝说。但是反过来，我对年轻人还有一种忌妒心理，就是想让年轻人饱尝不懂珍惜的苦果，有时这种邪恶的想法让我放弃了劝说。

（1990年4月9日）

# 26.又是眼镜纪念日

据说打棒球击球厉害的人两眼间距比正常人要宽。因为人用两眼定焦，所以眼睛间隔越大越有优势。

听了这番言论，我也释然了。两眼视力基本相同是其前提。像我这般两眼视力相差较大的人，即使我再努力确定目标击球，都是无法打中。

我小时候经常打棒球，虽说是打棒球，但我们用的是网球，算是一种“棒球游戏”。但神户是甲子园近邻，所以棒球在神户十分盛行。小学低年级学生或用拳头或用球棒击球，都需要瞄准目标。我从未击中过。因为击球能力太差，曾经把投手惹怒过。投手因我三击不中最后发怒，说来也是滑稽。

投手怒喊：“你是不是故意放水呢？你当我是白痴吗？”因为大家会认为投手胜得不光彩。可能是因为我挥棒或挥拳时，与球的空档过于悬殊。

视力可以通过眼镜调节，但几乎没有哪位击球厉害的选手戴眼镜。说起戴眼镜，确有一位名叫别当薰的选手，我实在想不起另有他人。我一直认为，近视的人不论怎样用眼镜调节，如果不是别当薰那样的天才，都不会成为厉害的击球手。但有一次我在观看棒球比赛的过程中，看到一位击球手蹲在地上，在击球区触摸土地。我以为选手拥有何种天授神力，最后解说员讲道：“是不是他把隐形眼镜弄掉了，正在慌忙寻找。”那位击球手起身，歪着头似乎在思考什么。隐形眼镜没有找到，他好像要放弃。最后那位击球手因三次击球失败而悲惨出局。

击球厉害的选手并非就没有近视的。那位使用隐形眼镜的选手，单凭外观是无法判断他是否近视的。可能也是因为比赛过程中选手会出汗，配戴边框眼镜确实多有不便，所以现役队员没有戴边框眼镜的。可从现役运动员隐退，成为教练、领队或者解说员之后，经常会有人开始佩戴边框眼镜。我这么说可能会招来不满。因为其中不乏因为老花眼而佩戴老花镜之人。两焦点或多焦点镜片不断优化，我们已经无法通过外观判断其是否近视。

我第一次买老花镜是在49岁，1973年我首次前往丝绸之路旅游，经由香港回国。日本和中国内地间的首条空中航线是次年开通，所以去中国内地旅行往返都必须经由香港。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不是已经老花眼了。跟老花眼的前辈们请教，他们告诉我：“戴上老花镜，眼睛会舒服很多。”因为香港的老花镜镜片、镜框都很便宜，我就在香港订购了一副。在香港眼镜店检查时，眼镜店的人跟我说：“你真后知后觉，老花眼度数已经很高了。”距我前往机场仅有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让眼镜店为我加紧制作。

但回国后，我戴上这个老花镜，会感到头痛、眼睛疲劳。虽然前辈告诉我戴上老花镜会很舒服，但根本不是那回事。确实感觉能看清文字了，但只读一行眼睛就开始有疼痛感。

我就想是不是自己不适合戴老花镜，索性把眼镜放到了一边。

半年后，眼镜上已布满灰尘，虽然不用，但还是要清理一下，在反方向擦拭眼镜的时候，偶然戴了下试试，发现竟然看得非常清晰。

原来是香港的眼镜店，因为制作过于匆忙，将左右镜片安反了。再加上我的左右眼度数相差悬殊，所以佩戴伊始才会感觉眼睛疲劳。

我去了一家在神户常去的眼镜店，让其做了调试。在这里我才明白不是技术越先进人们生活就越便利。以前的眼镜镜片是圆形的，可以左右自由调换，但现在左右镜片形状不同。左镜片只能用在左眼。如果非要强换，就只能将其削小尺寸，用于其他眼镜。我将这个老花镜做成了方便携带的小型老花镜。

我与一位友人讲述了上面的故事，说眼镜镜片还是以前的方便，现在的不方便。这位友人笑话我道：“把左右镜片搞错的概率也只有千分之一吧？”

（1990年4月16日）

# 27.横纲品格

我曾经在电视上看过一个画面，击球手在四球过后上了一垒，然后在那里与对方一垒手谈笑风生，电视解说员评说：这可不太好！——不知在规则手册中是否有这样一条规定，不过据说敌我双方在比赛现场谈笑风生不太合适。毕竟观众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看比赛的，这么说也在情理之中。比赛双方为了获胜剑拔弩张，这样的对决才是观看比赛的乐趣。在这种前提下，一方队员向对手示好，扫了比赛兴致，还是不做为妙。要想交流可以在比赛结束后一起去打高尔夫、喝酒，尽情地把盏言欢，增进双方友谊。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如国际友谊赛、非现役交流赛等），希望选手们还是在比赛中表情严肃。

现在换一个话题，说说相扑。

某位老者说过：“虎视对手的行为有损横纲的品格。”我听后感到很吃惊。

那么应该什么表情才合适呢？难道应该是笑嘻嘻地好像在说，咱们按照事前商量好的来比赛吧？每个人的相貌、表情都不同，细长小眼之人，不论如何瞪视对方，观众都看不出来。目大如球之人，即使没有瞪视对方，也会让观众感觉出瞪视之意。

在决定胜负之时，脸上就应该表现出严肃认真的表情。只要不是假比赛，那么自然会流露出严肃认真的表情。将此等事情说成是没有品格，很对不起相扑之神野见宿祢。

野见宿祢是垂仁天皇的御览相扑，比赛时将对手当麻蹶速的肋骨踩碎致死。有一幅画面描绘的是决一胜负的比赛，此时野见宿祢的眼神就像小锦[[1]](#_1_91)一样瞪着对手。

比赛归比赛，野见宿祢绝非凶恶之人。当时，豪族首脑去世，会有殉葬的习俗，但野见宿祢建议更改这种习俗，改为放置土俑，受到天皇赞赏。他真的是一位心地善良之人。

横纲作为力士等级受到认可是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横纲”，正像字面意思那样，原指缠在腰间的绳子，在地镇祭[[2]](#_2_55)等活动中将其缠于腰间，进行驱除灾厄的踏地活动。届时，大力士们会获得佩戴横纲的资格，不论是大关还是关胁，参加这种仪式踏地除灾的大力士都取得了横纲的资格。

江户时代的相扑等级中没有横纲一说。在东日本和西日本，分别有一位大关，大关就是当时大力士的最高等级。进入明治时代，相扑公演盛行，大关数量增加，在分级栏内已经写不下所有大关的名字，只能写在栏外，即所谓的“张出[[3]](#_3_33)”。在明治二十三年（1890）5月赛季时，大关西之海进入了副榜。东日本和西日本的大关名额分别只有2名。西之海不很高兴。此时，智者出现了。西之海作为首届高砂门下相扑，曾参加过踏地除灾活动，拥有横纲资格，西之海的称号从“张出大关”变为了“张出横纲”，照顾了西之海的面子。

从此，“张出横纲”代表了在上一赛季比赛中成绩低于东、西日本大关的大力士。

江户时代，最初获得横纲资格的是关胁谷风和关胁小野川。此时的横纲还不是相扑的级别象征。

明治三十三年（1900）深川八幡内设立了“横纲力士碑”，推进此事的是12代阵幕久五郎。他也是取得了横纲资格的大关，有人说他是为了沽名钓誉推进此事。16代之前的“横纲力士”之名都刻在了碑上，3代之前据说都是传说中的人物。

此碑于明治二十八年（1895）开始募集资金，中日甲午战争的谈判在下关举办。阵幕久五郎此时已是67岁高龄，同清朝代表李鸿章进行了会见。李鸿章在抵达下关数天后，被暴徒小山氏用手枪枪击。阵幕自诩是“天下之横纲力士”，他可能是以一种代表日本人民的心情探望了李鸿章吧。

据说阵幕和李鸿章二人在那次见面后仍保持书信往来。横纲力士碑完工之年，阵幕久五郎将李鸿章寄给他的书信公布在《读卖新闻》上（11月30日期）。其中有这样一段：“伺中国不幸开兵端（指的是义和团事件），国民何故遭涂炭之苦……”

一国宰相能够如此述怀，应该是十分相信阵幕久五郎的为人。有人说阵幕自我表现欲望强烈云云，但可能这才是横纲的品格。李鸿章在写此信一年后去世，阵幕久五郎于两年后去世。

（1990年4月23日）

注解：

[[1]](#_1_90)　小锦：全名小锦八十吉，是日本历史上的相扑选手。

[[2]](#_2_54)　日本传统的奠基仪式。

[[3]](#_3_32)　意为副榜。

# 28.规则

我发现儿童的游戏之中也有适当的规则。不论是捉迷藏游戏，还是传统的“好了吗？还没好”通过回答的声音判断他人隐藏的地点，此时的规则是捉人者需要数到100个数。

我们在孩童时代，唱十遍“山伏法螺贝”（YA MA BU SHI NO HO RA NO KAI）这个句子，就相当于数数数到了100。山伏法螺贝共10个音节，比双音节的“ICHI NI SAN”要快出许多。之后又出现了“没有山伏啊”（YA MA HA NA A YA DE）这样的规则。

在公园这种空旷的地方，隐藏好需要花费时间，所以用“YA MA HA NA A”这个规则，如果马上可以有隐藏之处时，就用“YA MA BU SHI NO HO RA NO KAI”这个规则。在日式联排房屋这种拥挤的地方，附近的淘气小子可随便钻进某家的灶台下。那时我们还是使用山伏这个段子，但旁边街区的孩子们使用的是“NI SHI MU KU SA MU RAI”，也是10个音节。某次与同岁友人饮酒，他在小的时候说的是“A RA SHI KA N JYU RO U”，也是10个音节。虽然算上了拗音，但没有哪个孩子会清晰完整发出“RO U”两个音，一般到“RO”就结束了。如果偷懒的孩子王当上了捉人者，那么可能会囫囵吞枣地说“A RA KA N”，然后就去收拾大家，还会狡辩道：“A RA KA N和A RA KA N JYU RO U是一样的啊。”

有一种踢罐子游戏，将空的罐头罐踢飞，捉人者在将空罐子取回的过程中大家迅速藏好。捉人者在寻找过程中，如果有人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又将空罐踢飞，那么游戏回到起点。

我们在公园玩踢罐子游戏的时候，用了橡胶皮球。它比空罐子飞得更远，寻找隐藏处的时间更长。虽是儿童，但拥有根据状况变换规则的才智。

相扑被称为国技，但规则会反复修改。最近，有一位相扑选手虽然赢得了比赛，但因拽到了对方的头发而被判输。原来使用禁招会输。

传说相扑之神野见宿祢将对手的肋骨踩碎，这在今天是会被判输的。当麻蹶速名如其人，定是具有神速麻利地将对手淘汰的能力。

外籍大力士日渐活跃，国技相扑也国际化起来。但国外并未普及相扑运动，力气强大的外国人都来到日本学艺，最终成为相扑运动员。虽然同为国技，相扑与柔道稍有不同。世界各地都有柔道场，柔道练习十分普及，最终被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众所周知，荷兰、韩国都曾获得过该项目的金牌。

摔跤正好相反，虽是舶来的格斗运动，但日本人却在该项目中屡获奖牌。

摔跤分古典式摔跤和自由式摔跤两种，前者不许使用腰部以下动作，不可用腰部以下部位攻击。

顾名思义，古典式摔跤延续了古希腊、罗马的传统规则，在伊特鲁里亚地区塔尔奎尼亚古墓壁画中，有即将开始摔跤的画面。参与摔跤的二人赤身裸体，一人有胡须，另一人没有。两人都是迈出左脚，两手抓住对方手腕。这是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的古墓，墓中随处可见刻画的飞鸟，所以人们称之为“占卜鸟墓”。从这幅二人摔跤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猜测，可能二人只用上半身进行较量，比赛也刚刚开始，留有胡须一方向回缩手，没有胡须的一方正占有优势。根据壁画的文字说明，二人正为祭祀死者准备开始摔跤。

虽说相扑是祭神仪式，但摔跤也有其宗教性的一面。我们知道，古代奥林匹克运动所有的项目都是祭神仪式。

剑术也经常作为供奉神灵的表演技艺而出现在评书、小说之中。中国《水浒传》第七十四回中，泰山庙三月二十八祭祀中有相扑表演，梁山泊豪杰中的燕青将号称天下无敌的大力士擎天柱猛摔出去，引起了现场哗然。

除了发髻、兜裆布之外，包括相扑祭神仪式的由来都与世界上其他的格斗运动别无两样。其他的格斗运动用围圈代替了土俵，对于禁招各有不同规则。

柔道能够向世界普及，还是因为嘉纳治五郎于明治十五年（1882）开设了讲道馆，导入了新的规则，将武术体育化的结果。

自由式摔跤，虽说是自由式，但也只是可以使用脚，仍有其相应的规则。职业摔跤也有相应规则，不过精通职业摔跤的人说：“职业摔跤的看点就是看摔跤手们如何骗过裁判的视线进行犯规。”其实它也是一种表演秀。

（1990年5月7日）

# 29.板球与马球

前一篇我写了关于体育规则的事情，但在板球运动中，人们不叫规则（Rule），而叫法律（Law）。它不是单纯的规则，而是法律。板球不愧是绅士之国英国的国技，竟如此重视公平比赛。

在日本，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看过板球比赛，日本也几乎没举办过板球比赛。原本也没有哪所大学里面设有板球俱乐部。

因印度长时间作为英国殖民地，所以板球运动在印度十分盛行。我在印度旅行时，为我做向导的印度政府观光部门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用收音机收听板球实况比赛。我问其原因，才知道他在大学时期曾是板球选手。

板球比赛虽然漫长，但他听着收音机，一直十分兴奋。

同是起源于英国的橄榄球（也有说板球起源于法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运动，但板球仅仅停留在英联邦内，有说是因为比赛过于漫长。总之正式国际比赛历时五天，中间穿插茶歇、午餐等，与其说漫长，不如说是优雅更为合适。

我们几乎可以赋予板球“光明正大”之意。

我用手头研究社发行的“新英和中辞典”查阅后发现，板球（Cricket）这个词使用在了play cricket（光明正大地做事）、It’s not （quite） cricket（有失公正）句子中。选手自己担任裁判的高尔夫也是绅士运动，我本人不打高尔夫，我看高尔夫比赛也感觉十分漫长。但听说一旦打上高尔夫，会痴迷于这项运动，耽误其他事情。我的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之前提到的辞典中，也有golf widow（高尔夫活寡妇）这一词例。15世纪中叶，英国的詹姆斯二世就以高尔夫影响武术、弓术练习为由，禁止12至50岁的男性打高尔夫。从那时起应该就有很多沉迷于高尔夫不能自拔而耽误了自身本职工作的人。

有一种说法称高尔夫起源于苏格兰牧童间的游戏，还有一种说法称起源于荷兰。大多数的球类运动都起源于欧洲，亚洲起源的很少。受季节影响，光照时间较短的地区人们可能是为了在有太阳的时间充分享受光照才发明了户外运动。

在《史记》列传中有关于骠骑将军霍去病“穿域踏鞠”的记载，这里的鞠指代的一定是足球。当时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不得而知，但是“穿域”就代表已经有了球场。

注释为“程武士，知其材力也”。所以此时的蹴鞠[[1]](#_1_93)并非体育运动，而是军事训练。让人踢足球，就可以探明此人的运动神经发达程度以及其体力、胆量。知其材力指的就是这些内容吧。

与板球一样，我们对“马球”这个词汇并不陌生，但在日本基本看不到这项体育运动。马球运动是选手骑在马上，用T字型长棍击打木球，努力将球打进对方球门的竞技运动。英国王储的打马球英姿曾出现在电视上。

马球是十分稀少的起源于亚洲的运动。虽说起源于亚洲，也是从伊朗由西向东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了中国。

唐章怀太子（651—684）坟墓壁画中就有马球比赛的生动情景。仔细观察画中场景，当时人们使用的球棍并非T字型，而是类似冰球球棍的曲线型。

吐鲁番的阿斯塔纳唐墓出土的俑中也有身骑白马的男性形象，男性手拿弯曲的棒子挥舞，这个俑曾在日本展出。

这可能也是骑马民族军事训练的一种手段吧。据说球这个词在藏语里发音为“PULU”，这个词从西藏地区传到了印度时发生了讹化，变成了现在的“POLO”马球。19世纪中叶，在印度驻兵的英国骑兵采用了该词，并不久传回英国国内。因为英国最初的马球运动是从1871年开始的，也就是日本的明治四年，是一项新兴的运动。

马球虽起源于亚洲，但日本却对此项运动态度冷淡，只有POLO衫异常流行。

（1990年5月14日）

注解：

[[1]](#_1_92)　蹴鞠：踢球。

# 30.爱马

美国的棒球、英国的橄榄球，体育运动都有其各自的“原产地”，石器时代的人类也一定从事过类似赛跑、跳跃、投掷的运动。狩猎也是。地球上的所有人类都有过一段依靠狩猎维持生活的阶段。那个阶段的记忆应该已经深深刻在人类遗传基因中。将球踢入球门的体育竞技不在少数，但如果将球看作“猎物”，那么球类运动其实也是狩猎活动的一种变形。标枪、骑马等运动可以说更是与狩猎直接相关。

孔子称自己的弟子中有72人通“六艺”。通六艺，是成为君子，也就是成为绅士的条件。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射”为射箭之术，但在文化之儒教中，人们十分重视精神统一之“射”。所谓“御”即操控马车。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人们是不直接骑马的。人们将车套在马上，通过绳索操纵马。据说在中国，人们是在公元前4世纪引入塞外骑马民族的骑马技术。孔子逝世之后一二百年，绅士的必备素养从“御”变为了“骑”。

骑马成为绅士的运动。获得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马术个人障碍赛冠军的西竹中中尉（当时称谓），是拥有男爵爵位的贵族。

因其爱马，本来最有希望拿冠军的他毅然退赛，被传为美谈，如此绅士。但在其风光的背后，我们不能忘记养马人的辛苦付出。以前，人们称养马人为“马卒”或“马丁”，从字面就可以看到歧视的意思，当时的养马人被人们所蔑视。据说在现在的赛马世界里，人们称其为“厩务员”。

战争以前的赛马，以“马匹改良”为一大看点。因为在战争中军马发挥很大作用，培育优秀的马匹至为关键。所以赛马也成为评选优秀马匹的一种方式。战争结束后，人们就无法以挑选优秀战马为名开展赛马活动了。如今，我们是不是应该从人与动物亲密接触这一角度来评价赛马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马匹仍被用于战斗。可能日本在中国作战时也有征用当地马匹的事情发生，但大部分的军马都是从日本运过去的。百万出征官兵得以生还，但军马一匹未归。

在很久以前，我曾在报纸投稿栏中阅读过关于在中国付出辛劳的爱马的追思文章。但即使战争没有失败，可能这些军马一开始就注定了被用后抛弃的命运。我通过一个例子了解到了这些军马的命运，关于此事我曾在某出版社的宣传杂志写过。在此我直接引用原文。

台湾出身的B氏，在第二高中就读，战争结束后回到台湾，之后赴上海暨南大学学习。国民党想动用骑警冲散学生。B氏在学生时代曾加入马术部，还被誉为当时著名的选手。他非常熟悉御马。当时上海骑警使用的马匹是日军留下的“残留孤马”，对于日式指挥十分适应。B氏操起马辔，让马右转，拍拍马屁股，马匹逐渐后退。游行队伍大声喝彩。B氏曾率领中国马术选手远赴东欧参加比赛。有人还曾怀疑B氏当时在上海的学生游行中是不是与国民党警察串通好了让马匹那么顺利地右转。我在北京同B氏见面时，B氏在结束时说道：“终于可以把它当成笑话来讲了。”

上海骑警所骑马匹可能是日军高级军官使用过的马匹。比如在攻陷南京举行入城仪式时的照片中，司令官、高级幕僚都在骑马。那些马匹肯定是从日本运过来的。

我想向担心军马命运的人说，被留下的马匹保证得到了爱护。爱惜不会说话的动物，是世界共通的人类感情。特别是当时的中国与日本相比，同动物共同生活的机会更多，所以会保证将马当成自己的伙伴。我曾在电视上观看过北方草原的赛马大会，骑手到达终点后会轻盈下马走向别处，人们会聚到马匹旁边，为其戴上花环，抚摸鬃毛，犒劳马匹。因为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获胜的不是骑手，而是马匹。

（1990年5月21日）

# 31.束袖带

对没有见过的事物感到恐惧是人类的本性。因为不知此为何物，会让人产生恐惧心理。

15世纪西班牙人到来之前，拉美人没有见过马。因为当地没有牛、马这种大型家畜。

1521年，西班牙人科尔特斯率领数百士兵消灭了阿兹特克人，据说阿兹特克人战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对方使用了马匹。西班牙人骑着马匹，阿兹特克人将这种人马合一的景象当成了巨大怪物。

1533年，攻陷拥有千万人口的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科的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其兵力仅是“180人及37 骑”。

对手不是怪物就是神灵，所以当时人们不论如何也只想着逃命了吧。

2000年前，中国人也对骑马的战士十分惊讶。与阿兹特克和印加人不同，中原地区（黄河中游地区）的人们知道马这种动物，但当时的马匹是用来拉车的，在战争中，战士们也是站在马车上进行战斗。

奔驰在漠北草原上的骑马战士，可以边骑马边射箭，机动性十分可怕。

在战国列强中，与北方骑马民族接壤的赵国最先引入骑马战。但采用骑马战并非易事，学习骑马之术不难，难的是需要改变服装。

当时中国农耕社会的服装基本与日本的和服相似。用带子系住袍（直筒衣服），当然衣服上还有袖兜，这种装束是无法骑马射箭的，所以必须穿“胡服”。

中国称塞外的骑马民族为“胡”，胡即“未开化之人”“外国人”的意思，带有蔑视之意。胡服即为筒袖、裤子，确实适合骑马射箭。

最大的问题是要更改军队的服装。我们文明人为何要穿野蛮人的服装？不论在什么时代，都有保守之人，特别是贵族们十分反对“胡服”。

如果不组建“胡服骑射”军队，就无法在战国时期生存，赵武灵王竭尽全力说服了贵族和长老。《史记》中赵世家一项中，叙述了其说服工作的历程。

赵武灵王终于说服了顽固不化的老者及保守派，赵国的战斗力得到提升。

读到此节，我想到一件事情，如果袖兜碍事，为何不用束袖带将其绑住，在日本有人就穿着带有袖兜的衣服，用束袖带绑住后干活、进行剑术比赛。

束袖带的日文汉字是“襷”，是日本国字，即和制汉字。而汉字故乡的中国没有此字，说明中国也没有束袖带这一物品。

为了说服保守派采用胡服，耗费了大量时间。与其在说服工作上花费时间，还不如开动脑筋，将碍事的袖兜绑上束袖带，将其变成筒袖功能，效果会更好。

这种局部调整，随机应变性强，曾是日本擅长的。在中国，改穿胡服这种大动干戈的方式，有时会有碍事情进展。

我以为束袖带就是速成胡服或简易胡服，但按民俗学家的话讲，束袖带是一种正装，让人看起来十分精神。穿着束袖带，意为严阵以待。

在出土的土俑中可见束袖带，说明其历史悠久。传说在天之岩户，天钿女命将石松变成了束袖带。

因为有袖兜，所以需要束袖带，可如果真是如此碍事，为何不将袖兜废除全部改为筒袖呢？真是荒唐。但世间应有荒唐之事。按理说人们不需要袖兜，其定会逐渐消失，这种解释会得到认同，但与此相比，本应消失的事物却还存于世间的说法更为有趣。

如是绑住袖口这种小事倒也无妨，但看过振袖之后还是感觉十分奇怪。有句谚语叫“长袖善舞”，在挥手跳舞时，还是长袖飘扬的美观。但是穿着此物之人是不必劳动的上等阶层，所以长袖主要作用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对于此种人，为了便于劳作而产生的束袖带就是多余。

（1990年5月28日）

# 32.马之画

马是与人类有深厚渊源的动物。人类能够直接骑在其背上的动物只有马科中的马属。

虽然有“骑虎之势”这样的修饰语，但没有谁能骑于虎背之上。人猿泰山骑于象背，但这并非普通人类所能及。人们说人马合一，但如果有人骑于象背，那只是人类搭上了大象移动的顺风车，无法称为人象合一。

能够与人类协调一致地行走奔跑的动物，只有马科中的马属。

在人们用马匹弥补军事实力不足的时代，能够获得良马，是整个国家存亡的关键。汉武帝为了找到汗血宝马，曾向大宛国派遣远征军。大宛国即为现在乌兹别克共和国费尔干纳市周边。

传说汗血宝马在奔跑过程中会流出汗血并因此得名，汉武帝找到汗血宝马时，曾高兴地作歌：“天马徕兮从西极，涉流沙兮四夷服。”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兴奋之情。

汉朝与天山以北的乌孙结好，汉朝皇族女性远嫁乌孙国国王，被称为“乌孙公主”。乌孙则向汉朝送来了聘礼名马千匹。汉朝不要他物，可见对马匹的渴望。

在日本的神社中经常供养神马，因为人类自身喜欢马，所以认为神灵也应该喜欢马，即向神灵敬献马匹。无法敬献活马之人，就画马敬献，即为“绘马匾”。人们在向神灵祈祷如愿后，会向神灵敬献“绘马匾”。

因为人们爱马，所以也喜欢有马的画。在唐朝曾出现以画马闻名的韩干、曹霸二人。曹霸的马画作品已无现存，但诗人杜甫曾作诗称赞曹霸所画之马。杜甫的作品中不仅有“绘马匾”诗，还有关于西域都护高仙芝将军所骑之马的壮美诗篇。

从存于现世的韩干的画作来看，画中的马匹都过于肥硕。唐朝不论是人还是马都喜欢丰腴的体态。

宋末元初有位画师名叫龚开，此人目睹南宋灭亡，以遗民身份生活在元朝。他所作的名为“骏骨图”的马画有缘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画作中的马都是瘦骨嶙峋。作者以服侍元朝为耻，乐享清贫，将自己的精神寄托在了瘦马身上。

人一旦得到某件好东西，往往喜欢向人炫耀。16世纪时，南蛮（葡萄牙）船只来到日本，双方交易活动一时盛行。日本的进口商品中曾有阿拉伯马，这是日本人从未见过的精良马匹，获得此马的人十分得意，让画师将马匹画下。

这并非敬献于神佛的绘马匾，而是向人炫耀的画。

在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中收藏了桃山时代名为“马厩图”的六曲屏风。每曲都有一匹精良的马匹，在马厩前面，两位和尚正在下象棋，面向屏风右手边的和尚可能是因为输棋在挠头，十分幽默。

看到这里，总感觉人与马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就像“中马屋”一样。殿位于泥地上，二人在类似外廊的地方下棋，可以边下棋边观赏马。客人可以观赏马，而家臣也可以随时观察马的状态。

空气中一定有马粪的味道，但马非同寻常，这点味道人们还是忍受住了。因为人马同住，所以人与马的关系定是十分和谐。

唐代小说中出现过这样的情景，在客栈里，旁边的妻子通过动作向正在洗马的丈夫发送信号，这部作品即著名的《虬髯客传》。因从床上可以看到殿，所以我们可知唐代的客栈也是“中马屋”式的。人可以看到马，马也可以看着人过着它自己的“生活”。

听闻桃山时代的“马厩图”并非狩野派或土佐派画师所画，而是民间画师的作品。有派别的画师以粉本作画，事先有样本，如果要画马，则只是将其中的马作为样本。得到名马而得意之人，并非想让自己的名马成为样本马之类，而是希望画师创作独一无二的在马厩中之“我的马”。能够满足这种要求的，应该只有民间画师。从古至今，英雄皆无用武之地。

（1990年6月4日）

# 33.国际花

由于日本要举办“花卉博览会”的缘故，最近花卉成了大街小巷的热议话题。有项调查问我：“您喜欢什么花？”而我却不知如何作答。因为所有的花我都喜欢，难分伯仲，所以甚是为难。左思右想只能说：“我没有讨厌的花。”这或许在他人看来并不算答案，但在我看来这问题也不算问题。

花朵是为了装饰地球而生，我们作为地球居民，要是说讨厌花，就太不近情理了。但是，由于人们的审美标准各异，加之受个人经历的影响，对不同花朵的喜好程度自然有高下之分。

神户市的市花是“紫阳花”。大约20年前，在公开征集市花之际，我被任命为评委会委员之一。神户是我的故乡，所以我接受了这一任命，但其实这是一份让人备感煎熬的工作。就同选美大赛一样，落选的人真是太可怜了，所以评委总是不忍淘汰选手。选择市花时，因为要与神户的风格相匹配，所以会觉得要向落选的花朵道个歉比较好：“你是如此美丽动人，但神户只是区区乡下，若当选市花的话，对你而言实属大材小用，所以……”

评委会委员中有一位名叫竹中郁的诗人，他反对把紫阳花作为神户市市花，“紫阳花颜色多变，我认为它并不适合当市花。”而支持紫阳花的委员反驳道：“并不只紫阳花，任何花在枯萎之时都会变色。”

竹中先生甚至用紫阳花不吉利的说法去反对，“在我们小时候，都把紫阳花叫作幽灵花，可见它并不吉利。”

但最终得票最多的依然是紫阳花。虽然事与愿违，竹中先生还是送上了祝福：“这个结果也很好，不管怎么说能在梅雨期绽放，也是相当难得的花了。”

在此次投票中，因为我是“中立派”，所以并没有反对用紫阳花作市花，只是对花语稍微有些介意。因为花语本来是极具主观意识的东西，绝不存在普遍性，所以可以说花语其实是一种偏见。例如翟麦的花语虽然是“大胆”，但在日本“大和翟麦”却象征着“贞淑”。而玫瑰花语，据说竟多达60多种，可见并不可靠。

紫阳花的花语是“自命不凡，虽外表美丽却无香无果”，所以给女性送花不能选紫阳花。虽不知为何人所作，这句花语真的毫无益处，实属多余。实际上，紫阳花是非常可贵的花朵。它在阴雨濛濛的黄梅时节盛开，大朵大朵的花团竞相绽放，仿佛是在这阴郁的天气里为人们加油打气。

如果可以让我写关于紫阳花的花语，我认为它是“国际之花、友善之花”。

据《植物图鉴》介绍，在日本太平洋一侧野生的紫阳花是紫阳花的原种，在很久之前从日本传入了中国。

大概是在唐代，某位遣唐使从日本出发进入中国，或许带着花，也或许是花的种子恰巧沾在了使者的衣服、行囊上，紫阳花随即在大唐扎根生长。

白居易（772—846）在担任杭州刺史时，在西湖以西的葛岭山麓的招贤寺中见到此花，多方询问却无人知晓花的名字。于是白居易就为之命名为“紫阳花”。在他的《白氏文集》中写有以紫阳花为题的七言绝句，并有如下序文：

招贤寺有山花一树，无人知名，色紫气香，芳丽可爱，颇类仙物，因以紫阳花名之。

诗词如下：

何年植向仙坛上，早晚移栽到梵家。

虽在人间人不识，与君名作紫阳花。

关于命名的过程，并不像传言所说的那般含糊不清，在大诗人的作品中有清晰的依据。之所以无人知晓其花名，是因为那是新传入中国的花。在明州（现宁波市）抵岸上陆的遣唐使一定会途经杭州。遣唐使的“遗失物”一说很具有说服力。

18世纪，有位英国人从中国带走了紫阳花，在欧洲栽培。明治时期以后，此花又作为“西洋紫阳花”从欧洲再次传入日本。花的颜色、形状，容易受到地域气候、土壤等的影响发生变化，花朵的授粉过程也容易产生杂交。紫阳花真可谓是国际之花，且日本是此花的原产国也言之有理。

六甲山的紫阳花乃花中极品，据说其中也有一些珍稀品种。西博尔德（1796—1866）用身在长崎的情人的名字其扇（本名楠本泷）为紫阳花命名。Hydrangea Otaksa中的“オタクサ”就是指“泷小姐”。泷小姐和西博尔德所生的女儿楠本稻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医生。关于紫阳花的话题真是充满国际性啊。

（1990年6月11日）

# 34.爱莲说

以前学习古典文学，大多是从背诵开始的。即使在日本的江户时代，提起“诵读”也是指死记硬背四书五经。在中国，经常会看到年长的人喝着小酒，兴起之时随口吟诵儿时背诵过的名作的精彩段落。吟诵多是诸葛亮的《出师表》及杜甫、李白的诗词等名作。当然在酒席上很少有人会选择吟诵四书五经。

但背诵北宋周敦颐（1017—1073）所作的《爱莲说》的人格外多。对此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于是询问中国的朋友。朋友的回答十分简单明了：“那是因为篇幅短啊。”

算上标题也只不过只有122个字。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以如此开篇迎合读者，吸人眼球，也可能是深受喜爱的原因之一。

周敦颐先生说陶渊明偏爱菊花，但是唐朝之后，人们更推崇牡丹。

唐代人对牡丹的喜爱世人皆知。

白居易也有吟诵牡丹的佳句：

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农历三月十五前后的二十天是牡丹盛开之际，在此期间，长安市民如痴如狂地奔赴各处牡丹胜地赏花。当时有西明寺与玄都观两大赏花胜地，市民们基本上是今日赴西明，明日探玄都。慈恩寺大真院中的牡丹因花期晚而闻名。因为其他地方的花期已过，所以市民们就会络绎不绝地前往慈恩寺。三藏法师玄奘从事译经的大雁塔也屹立于此，因此无论在长安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慈恩寺。

走在慈恩寺就如同穿梭于大阪府造币局一般。

即使世人都如此偏爱牡丹，周敦颐先生说他依旧钟爱莲花。

理由之一：出淤泥而不染；理由之二：濯清涟而不妖。

莲花，身处污泥之中，却纤尘不染，不随世俗，洁身自爱、天真自然，不显蛊惑人心之妖冶媚态，这一点难能可贵。

其次，

中通外直

莲茎内部中空，枝干挺直。

不蔓不枝

不向外蔓生侧枝，不攀不附，始终傲然而立。

香远益清

在西洋花语中，莲花代表“雄辩”。用周敦颐先生的话说：莲花的芳香未必浓郁，但却香气远播。这可能也是一种雄辩吧——干净纯洁才是最重要的。

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莲花洁净笔直地立在那里，人们可以在远处静静观赏，但绝不可“亵玩”（过分亲密地玩弄）。如果想去摘花的话，就不得不把手伸到泥巴里。

周先生总结道：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因为菊花是在其他花不再开放之时悄然绽放的，故而堪称花中隐士，绚丽豪华的牡丹则是花中的富贵者，莲花是花中的君子。所谓君子，与隐士不同，是生活在世俗中且举止谨慎之人。

周敦颐虽然是道学家，但与禅僧交往甚密，其学说也受到了《华严经》的影响。

在佛教中，莲花是极乐世界的象征。相传，人死后在极乐世界是伴着莲花重生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多数佛像都是是以莲花为宝座的。

在密宗中，智（金刚界）的象征是一轮明月，与此相对，理（胎藏界）的象征是莲花。

在唐代，比起赏莲的诗句，以采摘莲子为主题的“采莲曲”类的诗句更多。莲子味道“清苦”（清爽、带有苦味），作为夏季清凉食品备受人们珍视。年轻女子们乘着小舟去采摘莲子，因此，《采莲曲》多为娇媚艳丽的风格。李白也曾创作过《采莲曲》，众所周知，古斯塔夫·马勒（1860—1911）读了该诗的德语译文后，产生了创作交响曲《大地之歌》第四乐章的灵感。

总觉得在中国，人们对莲花的印象与其说是高洁无垢，倒不如说是一种浑身是宝、经济实用的植物。因为莲子可食用，荷叶可包裹食物，莲茎又称“荷梗”，可入药，而根部则是可以食用的美味莲藕。且“莲”和“连”同音，有喜结连理、百年好合，象征夫妻和睦的喻意，是富有吉祥之意的文字。

深受佛教熏陶的周敦颐，终于将莲花塑造成了“花之君子”。

（1990年6月18日）

# 35.梧桐树

我家南侧窗外有一棵梧桐树，每当冬日树叶落尽，屋内就铺满了阳光，待到夏日枝繁叶茂，这里又收获了一片凉荫。可以说窗外种植梧桐是最好不过了。

我在帮忙打理家里的生意时，做过桐树木材的进口业务，所以对梧桐树总是有种亲切感。

即使都是生长在中国的梧桐，山东省的和河南省的也不尽相同。山东省的梧桐木材价格稍贵。由于土壤的不同，木材的品质也会千差万别。昭和三十年，我们曾进口了一批中国梧桐树，当用电锯锯树时，“嘭”的一声电锯被折断，瞬间弹飞了出去。那是因为有子弹在树中，而电锯恰巧锯到了子弹，就被弹飞了。那枚子弹可能是当年日本军队留下的东西，所以日方负责人并没有投诉中方、索要赔偿。

即使是和平的植物，也被蒙上了战争的阴影。

在日本，桐制衣柜是很有名气的嫁妆，因此只要女孩一出生，就有种植梧桐树的习惯。而当女儿嫁为人妻时，就可以用那棵桐树打造衣柜当作嫁妆了。在中国绍兴，若家里生了女儿，家人就开始着手酿酒，待到女儿出嫁时，正巧也是酒最纯最香的时刻，此酒便作为女儿婚礼上的喜酒，被命名为“女儿红”（也称女儿酒）。无论是种梧桐树还是酿女儿红，都无不倾注着父母对孩子的浓浓爱意。

凤凰是传说中的灵鸟，传闻凤凰只栖息在梧桐树上。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前秦皇帝苻坚（338—385），为了吸引凤凰飞来，在长安城内种植了数万株梧桐树。凤凰与龙一样，都是王者的象征。因此，凤凰栖息的梧桐树，必定与王者也有着深厚的渊源，除了中国，就连日本的皇室，也是采用梧桐与菊花的图样，制作了皇室徽章。

前秦皇帝苻坚消灭前燕后，给予了前燕皇帝及其皇亲贵族优厚待遇。相传，前燕皇帝的弟弟慕容冲，字“凤凰”，那上万株桐树终于吸引来了凤凰。后来，慕容冲造反，苻坚也最终走向没落。而长安的梧桐树，也成为了招引凤凰栖息的地方。

虽然也有例外，但一般认为“龙凤”是一对，龙象征“武”，凤象征“和平”。

因此，皇后的宝冠上经常以凤凰来雕饰，凤凰筑巢的梧桐树也被当作制作嫁妆衣柜和雅致古琴的上乘材料。

桐材木质柔软不易碎、易加工，又不会破裂和变形，而且不易吸收空气中的水气，耐潮耐湿。所以要保管贵重物品，必须使用桐制木箱。乐器最怕湿气和变形，因此用桐树作为乐器的材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在我经营桐材生意时，用来制作高级木屐的桐材的需求量很大，但不知现在的行情如何。毕竟如今很少能看见穿木屐的人了，特别是小孩子，几乎已经不再穿了。

不只是木屐，草鞋也是如此。在女子大学的毕业典礼和感谢会上，女生们穿着紧致的和服裙裤的样子甚是迷人，但是穿草鞋走路的步态却显笨拙，看起来很难走的样子，估计是大部分人平时都没有穿过吧。

虽然桐树作为木屐材料的需求减少了，但在其他方面的需求还在不断增加。近来，有钱人购买了值钱的宝贝，都会选择用桐箱来保存，可以说桐树在这方面的需求还在日益增长。在我要辞去贸易助手的时候，听说桐树被用来作为人偶盒子的材料，且需求量以惊人的速度在暴增。眼下奢靡之风盛行，桐制衣柜的需求量自然也在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桐树开始从中国进口，并且常以装运桐材的港口命名，被称为青岛桐等。

据说中国是梧桐树的原产国，但现在仅仅从中国进口梧桐树已经远不能满足需求量了，好像进口渠道也扩大到了北美、南美国家。

据说梧桐树是在19世纪中期被引入北美的。那个时期正是北美大陆横断铁道的建设期，有大批中国劳动力被输送到美国。

人类的移居，并不仅停留在肉体的移动。或许是勤勉的中国劳动者，在加利福尼亚的某个地方建造小小家园时，心想，“真想在南侧窗外种上梧桐树啊！”于是便托人从祖国寄来了树苗或树种。在当时对梧桐树还没有什么需求量的美国，是无法想象为了赚钱而种树的。

而南美引入梧桐树则是依靠日本移民。

人们认为梧桐树是彬彬有礼之树。大多数都是每一根树枝上左右两边各六片树叶，表示一年12个月，有时会多出一片，则被解释为当年是“闰年”。梧桐树恪守着自然的节律，遵循着季节的变化，所谓“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

作为和平之树的梧桐树，和平地渡过太平洋，如今因为日本的需要，又作为贸易商品再次跨越太平洋和平地来到了日本。

（1990年6月25日）

# 36.义务劳动

“义务劳动”是一个比较久远的词语了。虽然是一个充满了战中时期痛苦回忆的词语，但是现在回过头去想想，也是一段难得的体验。

中学时代，我曾前往兵库县押部谷村的农家进行过一两天的义务劳动。虽说是给农家帮忙，我印象中不是收割这种重要工作，是收割之后的捆扎秸秆工作。

我家原本是台湾农民，在家中排行老二的祖父离家经商，成了城里人。虽然我的父亲做过农活，但对于神户生神户长的我来说，完全不了解乡村生活是什么样的。通过在乡村的义务劳动，我才有机会呼吸了农村的空气，也学着做了些农活。

我记得当时我们10人左右，分住在农民家的下房里。有学生神经敏感，抱怨房间内气味难以忍受，一夜未眠。因为当时都使用堆肥，所以四处弥漫着堆肥的气味。还有的学生说道：“这种味道好令人怀念啊！”那位学生可能经历过乡下生活吧。老师问我们：“怎么样，体会到勤劳的快乐了吧？”坦言说我们并未体会到那种快乐。要说有勤劳的快乐，当是体力劳动结束后的那种心理轻松吧。

尽管如此，当年我还是经常去各处“义务劳动”。昭和十三年（1938），神户遭受巨大洪水，市内有大部分地方被泥土掩埋。无法忘怀的7月5日，那天正值期末考试，由于洪水灾害，那一年的暑假，我们都被强迫去参加义务劳动，去游泳等暑假该有的娱乐活动全都没有了。同样是“义务劳动”一代，我们神户这批人应该是干得最多的。

我们用铁锹挖出泥沙装入簸箕拉走，现场分挖沙组和运沙组，两组交替作业。挖沙时觉得运沙组轻松，真到了自己运沙，肩膀火辣辣地痛，又想早点换回到挖沙组。其实两组的工作都不轻松。

洪水灾害那年我念初中三年级，等初中四年级的时候，又到橿原神宫旁建设的大型运动场工地里进行义务劳动。好像当时也是干了一两天。用铁锹挖泥沙装入簸箕运走，这种单纯的劳动我们当时已经非常熟练了。据说现场监工人员还表扬我们说：“从神户来的这帮初中生挺会干呀！”

升学后我们还在大肆炫耀义务劳动时，大阪初中毕业的朋友说：“在神户水灾时，我们也被叫去帮忙救援了。”但他们只干了一两天，而我们则是整个夏天，工作经验上存在很大差距。

去年，我同朋友们前往藤之木古坟参观学习的途中，路过橿原运动场，当时同行的小松左京唱起了“啊！浓绿的橿原内矗立着巨大的宫柱……”那是我们在义务劳动时咏唱的歌曲。小松先生也曾就读于神户的初中，也同样被动员去义务劳动了。我与他年龄相差四五岁，想必接连不断有人被动员去参加橿原运动场建设了。歌曲最后在“我们是建国服务队（或者是团？）”的叠唱中结束。

昭和十八年（1943），历经春夏两季，在大阪瓦斯大厦斜对面的空地挖大防空壕。当时还未遭空袭，可见计划此事之人多么具有先见之明。

现在这个地方已是高楼林立，但瓦斯大厦还在，能勉强找到。不知遭受空袭时那个大防空壕是否派上了用场？更不知那个大防空壕最后是否完工了？实际在挖大防空壕时，还有“流言蜚语”说挖防空壕只是为了让我们干活，根本就没打算使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计划此事之人并非拥有先见之明，而是一位残忍之人。

最近，去参观了神户报社在西神建成的新作业中心。开车路过押部谷的附近，那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全想不到当初在哪里堆起的稻草了。当时的农家气息，也不复存在了。

（1990年7月2日）

# 37.方位

我曾在之前介绍过，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在被称为“天下”之前，是被称为“四方”的。这是研究者经过努力考证的结果，所以应该是正确的，但我对此还存有疑惑。

天下的大地是无边无际的，这是很原始的思维。将无边无际的大地分为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需要更高级的头脑思维活动。

人们最初无疑是将日出日落的方向作为基准分成四方。再将四方进一步细分变成八方，八方再划为十二方。

方位也分吉凶，如果知道得太详细，我们每天就无法正常生活了，所以普通人不了解方位吉凶反而生活轻松。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家有位有钱人的朋友，他们家就住在旁边学区的小学附近，但偏偏要来我们的学校上学，当时我们感到特别不可思议。因为不是由于两所学校的好坏差异问题，况且友人家旁边的学校属于富家子弟学校，应该更适合他才对。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从他家步行只需两三分钟的那所小学方位不好。

这就是方位禁忌。家附近的小学为凶方，所以才舍近求远地上学。方位禁忌，正确来讲应该先向其他方位走，然后改变方位到达目的地。

最近去世的池波正太郎先生是“气学算命法”权威，对方位也甚为了解。我与池波先生虽仅限于每年在直木奖评选委员会上见两次面，并无深交，但我与池波先生在评选会上经常不谋而合。有时只有我和池波先生同其他人意见相左，最终寡不敌众。

我曾认为是我们两人阅读小说的方式很像，但有一点，就是我搞不清池波先生的方位观。据百科事典讲，不能将方位的传承和禁忌一概而论视为迷信。因为它包含了基于人们从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文化的空间定位，我总感觉这不是单纯的迷信。

几年前，池波先生辞去了直木奖评选委员。我听闻此事，想到应该是因为那件事吧。评选会的召开地点对于池波先生家来说位于大凶方位。为此，池波先生曾因方位禁忌而历尽辛苦，有时要提前一天去别的方位住宿，第二天再赶到会场。池波先生定是已经受够了这个。听说某位编辑希望池波先生能够再三考虑，池波先生说：“有陈先生在，没问题的。”我深感责任重大。

众所众知，阴阳道上讲丑寅（东北）为鬼门，属于恶鬼方位，人们一般都避开。一般会在这个方位放置鬼瓦，禳灾避邪。在比睿山建立延历寺就是因为那里是京都的鬼门。听说大阪城的鬼门方位上以前没有住人，也许是特意没有让人居住，保留着自然风景，因此20年前才得以在那里建世博会会场。

鬼门之禁忌在日本得到严格执行。而在中国，鬼门虽也不是好方位，但人们并不禁忌。人们不喜丙午方位这一迷信，在中国明朝时有，如今已经消失。就像保留正仓院那样，在日本，有着“什么都要精心保留”这一传统。

像丙午这种迷信，我们可以轻松祛除，但如果说“不能一概而论皆为迷信”，我们就会很难取舍。我们只能怀着“无知者无畏”这种心态去面对了。

我的一位朋友，女儿结婚，想让池波先生当媒人，考虑到他比较忙，遂选了几个日期供池波先生决定。结果池波先生指着其中一个日期说：“这天不行。下大雪不能举行婚礼，所以要换一天。”到了那一天竟然真的下起大雪，我的那位朋友不仅惊讶，更多的是后怕。

去年，池波先生跟周刊编辑说：“平成二年（1990）是我的大凶之年，如果能平安度过就最好了。”池波先生去世后，那位编辑将这段话登在周刊杂志上了。感觉对自己的命运还是不知为妙。

（1990年7月9日）

# 38.阿拉穆特

抑制着心中复杂的心情我驱车上了这条道。那已经是8年前的事了。距伊朗首都德黑兰向西一百多千米的地方有个小镇叫里海，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之后继续向北往厄尔布尔士山脉赶，我们的目的地是阿拉穆特遗迹。年轻时对这个地方非常痴迷，等到58岁才能完成自己的心愿。都说登山之后就不会感觉路途遥远，但这是一个漫长的崎岖之路，花了整整4个小时终于到了叫玛慕达吧都的小村落。从这里开始因为有川河挡道不能开车，改为骡队沿着河道行走。在骡背上摇晃了2个小时，终于到了阿拉穆特山脚下的卡桑汉村落。从伊朗大地震报道中看到里海的地名时我胸口一紧。从里海再往西走的话就是暂将，暂将以北的拉西特就是这次地震的地震源地区。

里海海岸附近厄尔布尔士山脉区域受到了严重灾害，我对阿拉穆特很是担心。阿拉穆特在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中广为所知。

书中故事描写的过于神秘。美丽的庭院，用黄金涂装的楼阁，还有四条流淌的河流，河中之物各为葡萄酒、牛奶、蜂蜜、清水，以及可以演奏世间乐器和歌舞的绝世美女。

马可·波罗小说中说的“药”其实是名叫哈希什的麻药，英文中暗杀者的assassin单词就是服用哈希什者的意思。

学生时代第一次读到的时候竟对这不可思议的哈希什有了那么一种好奇。

自那之后经常听到关于哈希什与大麻的事情，其实这些药并非传说中那么万能，在美国更有说法说它的危害都不及普通香烟。

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时已是阿拉穆特沦陷36年之后了。当时统治西亚细亚的弗拉股正是被神秘之风挡住了侵略日本之念的弗比拉伊的同母兄弟，他们的生母是基督徒。

我们借宿在阿拉穆特山下的民房。房子是由很大的岩石堆积而成，厚重的墙壁是为避暑与防寒，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但是岩石之间没有看到类似黏合剂之类的东西，堆积起来的岩石是比普通石砖大很多倍的岩石，所以即使没有黏合剂看着也比较稳定，也感觉不需要再用黏合剂。但是看似稳定的住房一旦遇到地震也会一轰而倒。

看着伊朗地震受灾的照片让我想起了阿拉穆特山脚下。但是新闻也好报纸也好都没有看到关于卡桑汉村落的报道，或许因为那里只是一个太过偏远的小镇吧。当时NHK正在拍摄《丝绸之路》节目，为拍摄阿拉穆特借用了伊朗空军的直升飞机。村落的孩子们说他们平生第一次看到直升飞机，救援的直升飞机应该已经到当地了吧。

（1990年7月16日）

# 39.未来记

我在大阪上本町的学校读书时，经常透过教室的窗户眺望四天王寺的五重塔。五重塔曾在1934年的室户台风中被摧毁，之后又重新修建，所以至今仍保持着光彩鲜艳的朱红色。

在我的印象中，即使在课堂上我也经常悠然自得地眺望窗外的风景，看来我的老师们对我都很宽松啊！

同样都是与圣德太子有渊源的寺庙，法隆寺却能屹立千百年而不倒。关于法隆寺，虽说有重建、非重建的争论，但主流观点认为它是670年火灾后重建的，所以历经1300年漫长岁月仍旧经得住各种考验。与此相比，四天王寺的塔却屡屡遭受雷击、火灾、台风及战祸，每次都要进行重建。

据说法隆寺是作为圣德太子的私人寺庙而建造的，四天王寺则是圣德太子在讨伐物部守屋时向四大天王祈祷战事顺利而兴建的。

宽弘四年（1007）在四天王寺的金堂里发现了一种预言书——“手印缘起”。上面写道，向寺庙捐赠财物的人都会得到太子的庇佑并从此与净土结缘，若侵吞寺庙的财产则会使佛法灭亡，引发内乱，好像怎么有利于寺庙上面就怎么写。上面还印有圣德太子的手印。据说自从出现了这个缘起，四天王寺一直保持着繁荣昌盛。

据《平家物语》记载，保元、平治的源平合战正是缘起中所述的内乱，缘起还预测了平家的都城沦陷一事。除此之外，在四天王寺里还发现了石文预言。该石文预言：承久之乱后，后鸟羽上皇的讨伐将会以失败告终。《太平记》第六卷中记载，楠木正成在四天王寺中打开了未来记。未来记中记载着后醍醐天皇被流放到隐岐之后的事情——370余日之后太阳没入西天，自西方有鸟飞来，吞食东方之鱼。此后三年实现国家统一……楠木正成认为“太阳没入西天”即天皇流放到隐岐，“370余日之后”即后年，因此他深信自己能取得胜利。

我们把未来记和预言书之类统称为“谶语”。中国也有非常多的谶语。

《河图洛书》应该说是谶语的鼻祖了。河图是上古时代汉族神话传说中黄河里浮现出的龙马身上的图案。洛书是传说中的圣君大禹在治水时，洛水里浮现出的神龟背上的文字。这似乎就是八卦的起源。《易经》中写道：圣人依据河图洛书作卦。

所以，它并不只是单纯地预测未来，而更像是一本指南书。世间圣人出现，将其解读并据之领导人民。

如果它仅是预测未来的话，那人类的命运就被注定了，再着慌也无济于事。而如果它是一本法则命理书的话，我们可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未来生活方式，所以不会过度地陷入命运论中。

未来记的特点就是话术委婉、拐弯抹角，比如“太阳没入西天”“自西方有鸟飞来，吞食东方之鱼”等说法。解读会因理解而异，这便是典型的未来记文章。

中国在前汉末年到东汉这一段时期，未来记相当盛行。李通曾对东汉的光武帝（25—57年在位）说，未来记中清楚地写道“刘氏复兴，李氏为辅”，光武帝听后便下定决心起兵。

隋炀帝（604—618年在位）虽然集千古骂名于一身，但也有闪光点。在位期间修建大运河，滥用民力使百姓民不聊生。但是，大运河又造福了后世人民。另外，他还实施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举制度。他的另一大功绩是严禁谶语即未来记。

隋炀帝即位之后便将天下与未来记有关的书籍收集起来全部焚烧。从此以后，谶语这一学问便再没出现过。

作为一门学问的未来记虽再没出现过，但之后人们也创作了各种各样的未来记和预言书，并且是不分海外东西的。据说中国明朝的开国元勋刘基（1311—1375）创作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籍《伯温谶语》。刘基名伯温，精通天文、兵法和数理，这本书也许是打着他的名义虚构的。书中预测了原子弹的出现，同时还精准预测了“无居所”。“无居所”我们可以将其解读为是对日本平成时代苦于地价高涨而买不起房子的平民的预言。另外，西方也有很多预言书成为了畅销书，在此不再赘言。

（1990年7月23日）

# 40.鲇鱼

汉字究竟有多少个呢？清朝康熙五十五年（1716）将所有的汉字收集起来编纂了一本《康熙字典》，里面收录了42000多个汉字。

日本战后由诸桥辙次编纂的《大汉和辞典》中收录了包括补遗在内的49964个字。因为日本创造了很多“国字”，所以字数自然要比中国多。

汉语的构词能力是非常卓越的。即使发现了新鱼类，也不必担心它没有名字。因为我们拥有“鱼字旁”这一强有力的武器，只需在其旁边再创造性地加上一个字即可。

虽然汉字在构词能力上出类拔萃，但同一个字可能会因地域不同而意义发生变化，因此也有诸多不便之处。像地理距离相距遥远的日本和中国，这种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例如“鲇”字在日本意为香鱼，在中国则意为鲇鱼。

据中国最古老的字典《尔雅》（据传乃孔子门生所作，尚待考究）记载，鲇鱼曰“鲇”，别名“鳀”，江东（长江下流）通呼“00017.jpeg”。可见在公元前，鲇鱼就至少有三种汉字表述。

鲇鱼非常黏滑。正如发黏用“黏着”来表示一样，“占”字旁意为黏液。如此说来，我们应该就能理解为什么用“鲇”来表示“鲇鱼”了吧。另外发音也相同，都是二声。

“鲶”这个字在日本任何一本字典上都显示它是“国字”。因为这是日本创造的汉字，并没有收录在《康熙字典》里。我们仔细端详这个字的话，会发现它头非常大，长着两根胡须，身体呈弯弯曲曲状。这不就是鲇鱼吗？也许是因为这个词造得太巧妙了，近年来，它被输入中国，并被收录到新编辞典中。因为“鲶”也读二声，所以在中国并没有遭到排斥并被采用。这个字很早之前就被日本创造出来了，9世纪末的《新撰字镜》就已将其收录。

那么，“アユ”（香鱼）在中国叫什么呢？一般是叫“香鱼”或者“年鱼”。我猜是非常通晓汉字的日本人指着“アユ”（香鱼），问一位目不识丁的中国人“这个鱼叫什么？”时，他回答“叫nián”。那位中国人本意是想说“年鱼”，结果这个精通汉字的日本人，想当然地认为按吴音（由中国传入日本的一种汉字读音）“nián”即“鲇”。于是，本应该表示鲇鱼的“鲇”字在日本就变成香鱼的意思了。我再次重申，上述说法纯属我个人猜测，并无科学依据。

说起鲇鱼，就会让人联想到地震。没有鳞片的鲇鱼滑溜溜的，很难抓到。想用圆圆的、滑滑的葫芦来抓住鲇鱼，那是不可能的。

用葫芦抓鲇鱼，用来比喻无法捉摸、不得要领。地震不正是如此吗？没有人能控制得了地震。

其实，鲇鱼对于天气的变化异常敏感，具有预知地震的能力。据说为了探明其预知地震的身体构造，还多次对鲇鱼进行了研究。

我记得在一本书上看过：一个美食家曾说外表越丑陋的东西其实越好吃。当时他举的例子是老虎鱼，但要说丑八怪，鲇鱼绝对不输给老虎鱼。

京都有家鲇鱼料理店，我曾经去吃过一次，确实非常美味。当时听店里人说，虽然都是鲇鱼，但味道也不一样。在湖沼里生长，几乎不怎么活动的鲇鱼呈黄色，味道并不鲜美。只有在活水处生长，身体呈白色的鲇鱼才好吃。

中国有句谚语叫“鲇鱼上竹竿”。

竹子本身就很光滑，滑溜溜的鲇鱼爬竹竿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衔住竹叶，扭动身体，爬到下一片叶子上，便能到达终点。这用来比喻克服困难，依靠一些外力最终是能成功的。

北宋文人梅尧臣（1002—1060）奉命编写《新唐书》时，他对妻子说：“吾之修书，可谓猢狲入布袋。”妻子听后说：“君子仕宦，亦何异鲇鱼上竹竿耶！”猢狲天性自由，而梅尧臣本人也是如此，所以把他放进袋子里，他自然不乐意。而旁人看来，这算什么呀，你不一直就像鲇鱼上竹竿一样战战兢兢的吗？这是《新唐书》的主编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描写的一段逸闻。

（1990年7月30日）

# 41.“妇”字

报纸上说：“兵库县某地因为‘婦’（妇字的日文写法）字是女字旁加一个帚字，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所以规定尽量不要使用。”这个规定让我大吃一惊。

当下非常盛行净化语言，竟然还扩大到了净化文字，这让我很无语。如果这么解读“妇”，那表示在田间干体力活的“男”字，岂不也是对男性的蔑视吗？田间劳作也好，打扫卫生也罢，其实都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语言是有生命力的，用以表现它的文字也是如此。我们必须要重新审视当今社会中，这些鲜活的文字背后究竟拥有怎样的语感。如今“妇人”二字有轻蔑的意味吗？

若说“妇”字有贬低之意，不可使用，那“女”字则更用不成了。“女”字是象形字，源于古代双膝跪地的女子形象。白川静所著的《字统》一书中有“双手相交向前，压住衣服下摆跪着”的记载。在日语中有“女子供……”的说法，意为“妇孺之辈……”，像这样即便仅是只言片语，也会带有强烈的无知、幼稚的语感。

我们经常会听到“女流之辈”，但很少听会到“妇流之辈”这样的说法。

1976年，在中国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西北处发掘的殷墟五号墓里出土了刻有“妇好”的青铜器。据推算，这是殷朝第二十代商王武丁的妻子的坟冢，也有人称之为“妇好墓”。这座大墓中有16名殉葬者、440多件青铜器、590件玉器。虽然修建于三千多年前，但却作为唯一一座能够确定墓主的殷墓广为人知。

此处的“妇”相当于一种爵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殷墟里出土了十余万片的甲骨，根据其上刻载的卜辞（占卜文），对殷商的爵位制度进行研究，发现商代有下述八种爵位：妇、子、侯、伯、亚、男、田、方。

可见“妇”是最高爵位，被加封予帝王的妻子。商王武丁有60多名妻妾，但只有3人被封为了“妇”。受封之人同时也会得到封地，且必须去封地赴任。在这些卜辞中有妇好领兵千人征战沙场的记录。有说法称妇好亲自挂帅带兵出征，也有另一种说法称她发动娘家大军为国征战南北。

排名第二的爵位是“子”，这是授予皇子的爵位，但并不是每个皇子都能受封。被选中的皇子，受封“子”爵，获得封地并统治封地。“侯”和“伯”是授予皇族、功臣和将军们的爵位。“男”在甲骨文中为耕田种地之意，“男爵”可能就是农业管理者吧。据说“方”是授予殷统治范围之外的部族首长的爵位。

那么话说回来，让大家纠结的“帚”，并不是单纯的“扫帚”。据说为了清扫宗庙，要在庙里洒酒。比起扫帚它更像是献给神明的币帛之类的东西。

清扫宗庙是事关江山社稷的大事，因此并非任何人都能胜任，只有极少数被选中的“妇”才可以，按当时人们的价值观，此人必须是地位极高的女性。

在众多的皇子中，能受封“子”爵的恐怕也只有“妇”生的孩子吧。

不论是古代皇权还是现代的独裁政权，对一国之首来说，最值得信赖的莫过于“妇”与“子”。从殷商的爵位制度中可以看出，“妇”与“子”是国家政权的核心。既然“妇”有如此经天纬地之功、权倾朝野之重，为什么禁用呢？真让人惊奇纳罕。

与之相比，后来“妇”从爵位制度中彻底消失了或许才是问题所在。仔细想来“妇”字也确实时运不济，它曾是商朝的顶级爵位，却一落千丈沦落至被禁用的田地。在四书五经的《礼记》中，关于配偶的称呼有如下记载：“士曰妇人，庶人曰妻。”即贵族的配偶称为妇人，庶人的配偶称为妻。由此可见，即使“妇”落魄了，也比妻子级别高。

最近好像平民夫妇常被称为“鸳鸯眷侣”，而权贵夫妇反而被称为“夫妻”，可谓是乾坤颠倒了。

顺便说一句，上述引用的《礼记》中的文章还有前文：天子的配偶叫后，诸侯的配偶叫夫人，大夫（大臣）的配偶叫孺人，卿的配偶叫内子……

士的官位在卿之下，如此说来，妇人已被四个名称超越了。

又是丧失爵位，又是降低身份，真是祸不单行啊。屋漏偏逢连夜雨，现在甚至“妇”这个字都要被禁用。见义不为，无勇也，所以我还是大胆提议今后能尽可能多地使用“妇人”这个词。

（1990年8月6日）

# 42.重箱和汤桶

由两个汉字组成的单词，前一字训读，后一字音读，这种读法叫作“汤桶读法”。与之相反，前一字音读，后一字训读，这种读法叫作“重箱读法”。

重箱是日本盛食物用的木漆盒，虽然如今已经慢慢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每到正月，大家还是会拭去盒顶的浮尘，将它重新拿出来用。所以提起“重箱”大家还是会懂的。“うな重”（鳗鱼饭）是指将烤鳗鱼放入重箱的鳗鱼饭。此处即便进行了大胆的省略，但大家都明白。

然而，说到“汤桶”则鲜为人知了吧。汤桶是一种带有注水口和手柄的漆器，荞麦面店用它来盛舀面汤，是一种十分平民化的器具。

汉字的不规则读法用餐桌上的“汤桶”和“重箱”两种漆器来表示，这种命名方法堪称绝妙。

曾经知名度等同的两种器具，如今“汤桶”似乎已被时间的洪流冲走了。

在日语中汤桶的正确读音是“ゆとう”。如果按照汉字字面进行音读的话是“とうとう”，恐怕日本人完全听不懂。如果两个字都按日语训读来读的话是“ゆおけ”，这么读即使日本人能听懂，但恐怕第一反应想到的不是荞麦面店用的面汤桶，而是澡堂的浴桶。

说起浴桶，它不仅指公共澡堂使用的小桶，还包括木质圆形浴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只有极少数家庭能在家里洗澡，即使能洗，浴缸也仅仅是个圆形的木头浴桶而已。现在，浴室得到普及，浴缸多为聚酯、合金材质，木制成了十分高级的材质。

重箱得以幸存而汤桶逐渐消失的原因，可能是前者还一直保持着高级感，但后者被塑料所代替，丧失了“木桶”原本的感觉吧。

或者说，也许从一开始重箱的势头就很强劲而汤桶的存在感则极低。两个字的汉字词，采用音训结合的读法，无论音训的前后，统称为“重箱读法”。

江户时代的掌故学者、考证家伊势贞丈（1717—1784）说：“音训混读的读法会被儒家学者们耻笑的。”

儒家学者是认认真真学习汉文的人，他们非常瞧不起这种读法。但是，不管再怎么被轻蔑，重箱就是读作“じゅうばこ”，没有人会读作“じゅうそう”或“ちょうしょう”。顺便说一句，“じゅうそう”是吴音的读法，“ちょうしょう”是汉音的读法。

有一些词只“读半边字”（念汉字时只念偏旁的读音），显得非常粗鲁，甚至带有侮蔑意味。

“病、膏肓に入る”（病入膏肓）的“膏肓”，正确读音是“こうこう”，但是“肓”这个字很罕见，所以很多人都误用成“盲”而读作“こうもう”。有学问的人自然对这种“读半边字”的读法嗤之以鼻。

膏指心尖脂肪，肓指心脏与隔膜之间，若病情已到达此般田地则已无药可救。虽然是误读，但读的人多了也便成了习惯读法，令学习日语的外国人困扰的正是这种“习惯读法”。

“登記”读作“とうき”，那为什么“登山”不读作“とうざん”，或者“登記”读作“とき”呢？在学习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这些疑问。

学习日语的外国人骤然增多起来，照着这样的发展趋势，其实只要不是特别奇怪的读法，大都能被接受。

连日本人都会一不小心读错的读法，也许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或者无法用理论来解释。所谓习惯读法，应该也要与时俱进。

最近，颁发芥川奖和直木奖时，新闻评论员在说到“ことしの上半期の……”（今年上半年度的……）时，将“上半期”（かみはんき）读作了“じょうはんき”。当我正在思考是否有“じょうはんき”这种读法时，新闻结束之际，该评论员道歉道“刚才读成了‘じょうはんき’，应该是‘かみはんき’”。“かみはんき”是“汤桶读法”，“じょうはんき”三字都是音读，难道不是这种读法更合情合理吗？

汤桶读法在说“かがく”的时候，人们往往不知道是在说“科学”还是“化学”（这两个词日语发音相同，都是かがく），所以就有了“ばけがく”（化学，“ばけ”在日语里写作“化”）这种一听便知道的读法。因此，“汤桶读法”也被说成是“读半边字”。

想必在股东大会上，报告者为了说得更浅显易懂，才将“じょうはんき”说成了“かみはんき”吧。同样，都是“半”，为什么“上半身”读作“じょうはんしん”而不读作“かみはんしん”呢？都是“汤桶读法”，为什么不读作“うえはんしん”（かみ、うえ都是“上”的训读）呢？在没有理论作支撑进行有力的解释说明的情况下，若能接受以上所有说法，既方便了外国学习者，也不会破坏日语的秩序。

（1990年8月13日）

# 43.干杯和敬酒辞

参加聚会的时候，我被指名带头干杯的情况越来越多了，看来我要多多注意了。

首先，这表明自己已经上年纪了。去年（1989年）去世的谷川彻三，享年94岁，生前常出席各种聚会，即使过了90岁高龄也不例外，因此他常被指名带头干杯。

每逢这时，他必定会说：“好像参加聚会的人当中，属我年纪最大，那么就由我来举杯祝酒吧……”在我的印象中他基本上每次都会提到年龄，而且也常说：“如果有比我年龄大的，请一定要示意我呀。”

我住在神户，当年担任神户市长的中井一夫先生，去年迎来了百岁寿辰，如今（1990年）年过期颐依然健在。他常作为大家的领头人，在宴会开始时举杯祝酒，结束时三呼万岁。对于生于明治时代的男人，相比于干杯，三呼万岁似乎更符合他们的作风。

我听一个见多识广的人说起过，上了年纪的人一开口就絮叨个没完，所以大家对他们的敬酒辞都敬而远之，常常会找其他有身份人说个两三句就结束了。纵使如此，也总有些年纪大的人在开席之前会主动举杯说：“干杯之前我想先说两句……”而后连篇累牍地说很久。

虽然一个劲儿地推杯换盏也让人稍微吃不消，但是，比起致辞我还是觉得干杯更痛快，毕竟一口喝净干脆利落，长篇大论的致辞实在让人难以应付。

我有时会参加一些研讨会，因为会前发言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主持人会一直掐表计时。发言人也只是勉强能在规定时间内说完，稍微超时一两分钟，主持人也会默许。

最近，我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应邀做一个20分钟的发言。于是我提前准备了稿子并进行了彩排，稍微有点儿超时，所以进行了删减，刚好20分钟能说完。可在会场上，在我发言快结束时，主持人却提醒我说：“没够20分钟，还剩2分钟呢。”当时我就慌了神，以为自己漏说了什么内容。

事后我仔细回顾，并没有少说一句话。可能是想尽快结束，所以不知不觉加快了语速吧。

并且这次演讲的内容是我经过深思熟虑写出来的，文章逻辑结构十分严密，硬是被要求在结尾再追加2分钟的结束语，我真是无能为力。

好不容易到18分钟的时候可以完美收尾了，却要再说2分钟的闲话，这不是画蛇添足吗？

最近，有一种叫执行策划的行业，可以承办策划各种活动，工作内容从幕后准备到现场执行无所不包。某次我看到了他们的工作时间表——剪彩2分钟、入场3分钟、司仪致辞1分30秒、敬酒2分30秒、A老师发言10分钟、B老师发言8分钟……他们真的是把活动安排精确到了每分每秒。在某场演讲活动中，他们甚至把演讲者从休息室走到讲台的时间精确到了1分40秒。若照此执行的话，这些“专业策划人”只会把重点放在对时间的把控上，而容易忽视掉活动内容本身的质量。或许是因为租来的场地有时间限制，而且还得按时结束把场地让给下一场活动，所以才会格外注重时间的把控吧。

我们参加聚会的目的，不是为了听演讲，若想听演讲，大可直接去讲演会了。不论是参加出版、获奖或是入职纪念活动，还是参加周年庆典或者动员大会，我们都是为了祝贺和鼓励当事人，同时也期待着借此机会见到久别的朋友，我想没有人是来专门听来宾演讲的吧。

如果来宾的致辞过长，就剥夺了我们“私聊”的时间。为了书写方便，我用了“私聊”这个词，但似乎有些用词不当。因为大家本就是为了畅所欲言才来参加聚会的，而“私聊”却有种遮遮掩掩地说悄悄话的感觉，用来形容聚会上无可厚非的会友畅谈有些欠妥。但冗长的致辞剥夺了来宾们相互交流的时间，所以当台上的致辞滔滔不绝之时，台下的宾客们兀自“私聊”成一片，此起彼伏的嘈杂声就权当是宾客们对台上发出的抗议吧。

最近，没有致辞的聚会逐渐增多。主办方会把“致辞”打印出来，在会场入口处发放，或是在聚会结束时同小礼物一起发给来宾。就别操心打印的致辞有没有人看了，就连拿着麦克风大声读，不想听的人还是不听，更别说看了。

不要求按时到场的普通聚会，又通知了具体的宴会起止时间，就是为了告知客人在这该段时间内随时到场皆可，因此，刻意安排几点开始演讲什么的就没有意义了。既然如此，干脆连开席前的带头干杯也省了吧。

现在，我依然觉得干杯比致辞更好，但是我认识的老人们却都患了干杯恐惧症。不管去参加什么活动，自己都是最年老的，所以不免有些寂寞，我也渐渐到了能够理解这份寂寞的年纪了。

（1990年8月20日）

# 44.杯子和茶碗

相扑比赛最后一天会角逐出最优秀的力士，举行授奖仪式，最高奖赏是“天皇赐杯”。这种奖励制度的历史之悠久堪比整个昭和时代，其源头要追溯到大正十四年（1925），首个优胜大奖“天皇赐杯”是利用摄政宫即昭和天皇御赐的奖励金制作而成。当时，东京和大阪的相扑协会正为两家合并一事闹得不可开交，但用奖金做奖杯一事恰巧促成了两家协会的顺利合并，并于同年设立了财团法人大日本相扑协会。

不仅是相扑，奖杯也经常作为其他体育比赛的优胜奖被颁发给第一名。或许这么做，蕴含着以此杯品尝胜利美酒之意，但真拿奖杯喝酒的人肯定一个也没有。虽然也常看到获胜力士用超大酒杯豪饮的照片，但那杯子也绝不是奖杯。

大酒杯，可能是“传杯共饮”这一习俗的产物。我认为这源自于“神人共饮”的传统，在日本，人们祭祀神明之后会共同喝下大酒杯中的供神之酒，但除传统之外，人们用同一个杯子传递喝酒，也一定能增进友谊，有结交同盟的用意。

在日本，还有一种表示人与人之间关系要好的说法是“同吃一锅饭”，有同甘共苦之意。话虽如此，但同一个锅做出来的饭，要吃到嘴里还得各用各的碗。

对于传杯而饮，若是依心怀叵测之论，除确认敌友之外，更是为了防止有人往酒内下毒，这也是古代最常见的毒杀之法。中国史书中常有“投之以毒”的描述，专指在酒里下毒。相传有鸟名“鸩”，其血或羽翎有剧毒，古代人常用鸩羽泡酒杀人于无形。这种手段不止用于暗杀，也常用于当众执行死刑。关于死刑有斩首、绞首乃至高压电椅等，不一而足，毒杀也是其中的一种，且多用于处决有身份的人。

《礼记》中记载“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意为：对庶人不必责求完礼，一旦犯罪就要受到刑罚。与此相对，身份地位高于庶人的士大夫若犯罪，可免受刑苦，但必须严格遵守礼仪。

士大夫若有作奸犯科之嫌，刺史便会下令：“将此人交由廷尉处置！”

前去传令的刺史不仅会带着朝廷判书，还会带去含有鸩毒的酒。而朝廷要员，只要有犯案之嫌，就必须服毒自尽。

“服毒自尽”在史书中屡见不鲜，自杀者并非随身常备毒药，随时准备自尽，他们的死往往是遭人胁迫所致。

“鸩”究竟是怎样一种鸟，我们不得而知，有人说此鸟生于南海，也有人说“鸩”其实并非是有毒之鸟的血或羽，而是一种秘制的毒药。

总而言之，古代人不会草率饮酒。外出做客，同主人传杯共饮无疑是最安全的做法。当然，得主人先喝才行。

“献酬”是日本独特的饮酒风俗，意为交杯换盏、互相敬酒，可谓是“传杯共饮”的衍变形式。

“干杯”一词的英语是“toast”，将同一瓶酒分别倒入各个酒杯，大家互相碰杯，使各自酒杯中的酒碰溅到对方的杯中，随后举杯共饮，以示酒中无毒，象征诚意。这也是防止毒杀的做法。

我曾看过一部名为《波吉亚家族的毒药》的电影，有一幕描写投毒：将毒药藏于戒指内，随后巧妙地洒入对方的酒杯中。

在茶道中，也有主客共饮的做法。房间里茶釜和风炉一应俱全，当着客人的面泡好的茶，不仅能驱散世间的功利心，还能消除人心中的“恶意”。

在日本，有些名贵的茶碗甚至值得用一国一城来交换。特别是手工捏制的茶碗，器形不规整、外观粗糙简陋，但却异常名贵。这让桃山时代到访日本的耶稣会神父们百思不得其解。

说起茶碗，虽然如今的茶道已成为模式化操作，但是仍保留着“转碗”的做法。为了能让对方欣赏到杯子的花纹，主客双方在拿到茶碗的同时会将正面花纹恭谨地转向对方，这种做法满含着人们对彼此的尊重。除茶碗外，许多茶叶罐也非常名贵。它们拥有优雅的名称，曾令战国大名们如痴如醉。

但是说起酒来，还没听说过哪支酒杯值得用一国一城来交换的。正仓院御物中有支高脚杯，虽然也十分贵重，但也仅仅是在古代美术方面有较高价值而已。人们喝酒的时候是不会碰它的，谁都不会用这种杯子喝酒的。

酒比茶的历史更为悠久，但茶发展成了茶道，酒却没能入“道”，或许正因如此，酒具才没有茶具那般名贵。

（1990年8月27日）

# 45.幻杂记

“幻之名酒”“幻之温泉”等以“幻”命名的东西，总让人觉得稀罕可贵。因某出版社忘年会宣布用“幻之名酒”招待来宾，即便在忙到分身乏术的年底，人们依然趋之若鹜。

所谓“幻”就是平时很难得到的东西，所以显得极其珍贵。可是“幻之名酒”现在已经很常见了，在街道酒坊就能买到，因此显得不那么稀罕了。但我们并不知道酒的味道究竟有无变化。

看似存在又转瞬即逝，即为“幻”。听说哪里有一年只卖一天或只卖一两个小时的东西出售，于是马上飞奔过去买，却发现已售罄，这同“幻”如出一辙。如果一周只卖一天，却周周都能买到的话，就不是“幻”了。

“人生五十年，与天地长久相较，如梦又似幻。”这是织田信长喜欢吟唱的歌中的句子。

因为转瞬即逝，我们总是用“梦”来类比“幻”。但是，人们只把梦作为深层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却未把幻纳入近代科学的研究范畴。柳田国男在《远野物语》的“民谣觉书”中写道，“如果有理论证明梦是真实存在的，那研究幻的历史就并非徒劳无益之事”。

虽说同样是转瞬即逝之物，梦人人会做，但幻则极少有人见过。即便是声称看见了幻，大部分也都是错觉。说是错觉也就罢了，有时还会被认为在骗人，人们也时常会陷入看见幻的沉思中。

所谓“幻人”就是魔术师。据说唐朝时期，魔术师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原，在长安的市场上表演吞刀、吐火、屠人、肢解等魔术。吞刀、吐火就如字面意思一样。“屠人”是用刀剑来刺箱子里的人，但箱子里的人却能毫发无损，这也是现在经常表演的绝活之一。“肢解”是指，将身体的关节拆分肢解，使其能在狭小的空间里穿梭的技能。

这类魔术师在三国至唐代的文献中记载为“幻人”，在《汉书》里演变为“眩人”。文献记录了大宛等西域诸国向中原进贡大鸟卵和罗马魔术师的事迹。丝绸之路将丝绸从东方传到西方，又将魔术从西方传到东方。

“幻”字在日本字典上其正确写法应该是上下倒过来写的“予”。至于为什么倒过来写，有一种说法是“予”即“给予”，有人对你说，“这个给你”，然后你伸手去接，这个东西却突然消失了。但我总觉得这个解释很牵强。

我们把“予”当作织布机的“梭子”，如果反着操作的话，就会纵横交错，眼花缭乱，我认为这种说法更有说服力。

印度也很流行魔术。几年前印度大魔术团也曾访问过日本。古印度把魔术般不可思议的力量称为“maya”。佛经中经常出现这个词。中国翻译佛经时，将“maya”翻译为了“幻”。

把没有实体的东西当作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凡人的迷妄，而把这份迷妄往正确的方向上引导便是佛教的作用。佛法中经常使用“幻”。织田信长喜爱的舞的句子“如梦又似幻”，也充满了浓郁的佛教色彩。

虽说比起梦来看见幻的人是极少数，但是古代人似乎比我们更容易看见幻。众所周知，野生动物能事前预知天地异变。所谓看见幻可能也与这种预知能力有关系吧。

清和天皇的贞观十七年（875），有记载称，当地所有居民都看见了富士山顶上有两个白衣美女在跳舞。对此，柳田国男认为，若有一个人说看见了某种东西，在场的其他人马上就会产生相似的幻觉，这应该是因为双方心里有共同的“预识”。

为了看见幻觉，我们必须更加原始化或更加野性化。旁人能看到的东西我也必须能看到。脱离自然，一味地追求自我的话，我们会失去很多东西。

幻之名酒先暂且不提，偶尔还是很想看一下“梦幻”的东西。如果想用药物来实现这一愿望的话，无疑就是堕落了。

（1990年9月3日）

# 46.泡沫和阳炎

“幻”的兄弟可能就是“泡沫”和“阳炎”（蒸腾水汽、空气）了吧。它们和“幻”一样都是转瞬即逝的，所以一起诞生了这两个词语。

日语中“幻泡”或“泡幻”就是比喻那些稍纵即逝的东西。在此基础处上加上“梦”字，就有了“梦幻泡”这样的表达方式，在北宋欧阳修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表达。另外，再加入转瞬即逝的“影”字就变成了“梦幻泡影”，这是将四个形容转瞬即逝的字组合在一起形成的新词，《金刚经》中首次使用了这个词语。不管是多么易逝的东西，这四个字组合在一起，就让人感觉到了一丝存在感，很是有趣。

在选举中经常用到“泡沫候选人”这个词，泡沫不仅消失得快，而且一直处在漂浮的状态。“泡沫候选人”指没有脚踏实地地干政治活动，只是做表面功夫，这样的候选人落选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泡沫”在日语中用和语词表示是“うたかた”，枕词的“うたかたの”与“消逝”和“忧愁”有关。

当然，“憂き”（忧愁）的读音和“浮き”（漂浮）是一样的。

话虽如此，“泡沫”和心里没底、靠不住这种印象不同，而是和繁盛有关。我们往往用“水泡四溅”来形容水流湍急的声音和波涛汹涌的样子。在河川处出现泡沫，那河水一定是急流或者是河水碰撞岩石的效果，绝对不是涓涓细流。扎啤杯里向上翻腾的酒泡也是来势汹汹。另外，还有很多大叔，一听说冲绳的特产“泡盛”就立马变得气宇轩昂。在繁殖能力极强的归化植物里，有一种叫作“背高泡立草”（一枝黄花）的植物，这听起来也是非常“勇敢”的。

“泡沫”告诉我们，事物都是有多面性的。

阳炎[[1]](#_1_95)严格来说并不是转瞬即逝的东西。它在春日里悠闲地摇曳。但想拍摄它的照片，捕捉它的话也是难以办到的。在这一点上，泡沫与之不同，想要抓取泡沫的话想尽办法还是可以抓到的。

“かげろう”写作“阳炎”“阳焰”“游丝”。这是因温度上升而使空气密度不均引起折射所看到的空气晃动的现象。虽然眼睛能够看到，但却不是实体，所以可能它比泡沫更像幻。

在佛教中，把阳炎和幻觉都当作没有实体的东西称之为“幻炎”。阳炎在夏天偶尔也会出现，但它的有趣之处就在于一般并不是在烈日炎炎的时候出现，而是在春意正浓时出现。

杜甫有诗云“落花游丝白日静”，因为说到了“落花”，所以果然阳炎和春天更匹配。这样的话，比起“炎”“焰”这些字，“游丝”一词更为优雅悠然。中国的古诗词里说到“かげろう”一般会用“游丝”来表示，很少使用“阳炎”或“阳焰”。杜甫还有诗句写道，“炉烟细细驻游丝”。南朝的沈约（441—513）也写过“游丝映空转”的佳句。

随风摇曳的细丝状的东西的确充满了诗情画意。很多诗人都无比憧憬这样的场景。唐朝诗人李商隐（812—858）曾写过“几时心绪浑无事，得及游丝百尺长”的诗句。大意是：对纷繁世事的感叹和自己的万千思绪，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困扰我们的事情何时才能烟消云散？何时才能追逐百尺高的游丝，一起随风摇曳啊？

佛教说游丝是没有实体的东西所以无法捕捉。可是，一些人发自内心地羡慕游丝，别说想抓住它了，甚至想和它一起摇曳。

因此我们可知游丝也是多面的。它既是追逐不上的东西，又是想要追逐的东西。

游丝也被称作“野马”。《庄子》中有云“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说游丝和尘埃等都是生物用气息相吹拂的结果。下一句我也非常喜欢：“天之苍苍，其正色邪？”是不是因为离得太远所以看到这样的景色？大鹏在九万里的高空翱翔，它看到的地面的情况和真实的情况一样吗？

天空真的是蓝色的吗？相反，从天上看地下，也不会和真实的颜色相同。不管是从下而上还是从上而下都不会看到真实的颜色。诚然如此！

（1990年9月10日）

注解：

[[1]](#_1_94)　阳炎，日语词语，指远处地面火热导致光线像火焰一样跳动的折射现象。

# 47.西亚

仔细想想，“中近东”真是一个奇怪的叫法。

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土耳其、埃及似乎属于近东。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应该属于中东。

从欧洲来看的话，近东指的是临近欧洲的东方。日本、韩国等距欧洲最远的东方被称为“远东”，在日本也使用了该叫法，完全把欧洲的感觉复制了过来。

如果以日本为中心来看的话，难道不应该把勘察加（半岛）、新几内亚及澳大利亚的东部视为“近东”，中途岛、夏威夷诸岛视为“中东”吗？但是，在世界上中近东即“near east”和“middle east”已经获得了广泛认可。所以在翻译国外的电报或西欧的书籍时，应该就那样使用。这种信息或思维方式是站在西欧的角度上考虑的，所以没有替换的必要。

战争时期，我从大阪外国语大学毕业后被任命在本校的西南亚语研究所做助手。月工资60日元。我格外中意“西南亚”这个名称。所谓的中近东和印度都属于西南亚的范畴。把中近东划进“西亚”的范围里或许才是最合适的。把东西以远近作区别是否有失公平呢？东亚洲——东亚、中亚这两个名称已经得到普及，只有西亚还在“中近东”的范围里，作为地域名稍感缺了点气势。

从东亚看西亚，感觉非常遥远。那份遥远并不单纯指距离，也源于对对方的一无所知。伊拉克进攻科威特时也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吧。

西亚地区除了以色列和极少数地区外都是伊斯兰的世界。这也成为了东西方互不了解的一个原因。

日本和韩国大部分人们信奉基督教，很少有人信奉伊斯兰教。现在日本的穆斯林也是寥寥无几。在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少数民族当中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塔吉克族等都信奉伊斯兰教。

另外，汉族的穆斯林也非常多。单北京就有数十万穆斯林，这让日本人感到很不可思议，这也反映出了伊斯兰教在日本不为民众所知。

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常会看到写有“清真”字样的饭店。清真饭店不是只有穆斯林才能进出，非穆斯林也可以。清真饭店饭菜的口味比一般饭店的偏甜。很多非穆斯林偏爱这一口，所以也常去那里吃饭。当然饭店里还是穆斯林更多一些，所以这也可以看作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一种接触。

日本人和中国人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中和穆斯林接触这一点也是其中之一。日本人平时很少和穆斯林接触，但中国人却与他们接触频繁。即使不理解他们的教旨，在生活层面上的理解还是可以做到的。

日本采用的是中国的文字，中日拥有许多共同的典籍，所以日本对中国非常了解。

原本应该是最熟悉的事情有时候反而会变成负面的事情，我们应该谨防这一点。日本通过佛教对印度有了一定程度的接触和了解。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又明智地吸收了欧美国家的制度、文化和思想，可以说当时日本对欧美国家了如指掌。

照此来看，世界的几大文明国度中，日本接触最少的就是伊斯兰国家了。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加大加深对伊斯兰的了解乃是当务之急。

目前日本对伊斯兰国家的了解依然浅薄，但和战时对西南亚的研究程度相比，已有了极大的进步。以前的外交官中，没人会讲阿拉伯语，而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朋友片仓邦雄，作为驻伊拉克大使，十分精通阿拉伯语。在当地交流过程中，他能直接使用阿拉伯语，而不再用英语或法语了。希望他今后能再接再厉、奋勇向前。

# 48.虚虚实实

我非常喜欢“周边”这个词，平时也经常使用，它的意思就是周围、附近。我有一本叫《异人馆周边》的小说，这本书篇幅不长，我在写短篇小说集的时候很想套用这个书名。

有趣的是，“周边”二字在中国并不常用。“周”是周围，“边”是边缘，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倒是可以通达词意。汉字属表意文字，它的实用之处在于不用重复使用意思相同的汉字，即可将词义表述清楚。

查阅中国人常用的日语词典就可看到，日语的“周辺”对应的中文是“周围”或“四周”。例如，“東京及びその周辺”翻译成中文是“东京及其四周”。“周边”这个词语对中国人来说意思很明确，但却很少使用。

“界隈”这个词语和“周边”类似，“界”和“隈”组合在一起，词意几乎谁都明白，但在中文中却不常用。在日语辞典中会将“界隈”译为“附近”或“一带”。

“炎上”这个词在中国也很少使用，但看字面，就能对词意一目了然。但何时使用，却无人知晓。日语词典中的解释是，用于大型建筑物着火时。所以，金阁寺着火可以用“炎上”，但小茅屋着火就不能用“炎上”。

日本也创造了很多四字成语，比如“虚虚实实”这个词，它指的是用尽计谋手段的激烈争锋。但汉语中虚就是虚，实就是实。

所谓虚即没有实力。没有实力，却要装作有精兵强将，让来袭的敌人都是空跑一场；明明兵强马壮，却要装作不堪一击，故意让敌方低估自己的实力，好杀他个措手不及，这便是虚实结合的战术。

《孙子兵法》中有一篇名为“虚实篇”，讲的是有关力量的集结和分散，强调集中力量攻打敌人的薄弱环节。需要根据敌情来判断何时该集中兵力，何时该分散兵力。己方兵力集中但做出兵力薄弱且分散的假象迷惑敌人。

关于“虚实”的表述众多，用叠词“虚虚实实”来表达则更通俗易懂。日语词典中解释为，“双方以智谋决高下，千般谋略、万种方法，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典籍《吕氏春秋》中有云“虚则实之”，即虚无之处则自然会充实，与此相对，也有“实则虚之”这一说法。

前段时间，废除虚礼一事被炒得沸沸扬扬。议员们在朋友乔迁新居、结婚及其他红白喜事之际，会包礼金或发电报以示祝贺，这种行为就被称为“虚礼”。

但这对于想冲击下一届大选的议员或候选人来说，真的只是“虚礼”吗？他们想借此拉票，希望能对自己有利，所谓的这些祝贺、吊唁、礼金绝不是徒有其表。如此说来，可以称之为“实礼”吧！

这就是所谓的虚则实之。

反过来看，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每年在写贺年卡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期待获得什么实际利益。当然，在给客户或班主任写贺卡的时候，也许会稍稍抱有今后请多多关照自己或给自己加学分的期待。

但给十多年未见的老同学，或给机缘巧合下邂逅但许久未见的人写贺卡时，我们只是想单纯地向对方传递“我很好”这一信息，一般不会和利益挂钩。这才是真正的“虚礼”吧。

正月里收到贺卡，真是一件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咦，他去年夏天搬家了呀！”“哇，小长孙出生了，真是太好了！”“他当上分行行长了，咦，这家银行不就在我家附近嘛！”就这样一边在心里嘟囔，一边看这些贺卡，也许会突然想要找这位当上分行行长的老朋友谈关于融资的事情，但他最初肯定不是带着这个目的给我写贺卡的。

把普通老百姓的这种小小的享受，偏颇地断定地为“虚礼”而废止的话，也很让人困扰。“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虚与实之间果然是千变万化啊！

# 49.落选也万岁

“请您就此事简单地说两句！”我们偶尔会遇到需要针对某事稍作评说的场合。“说两句”可能是受以秒计时的电视或广播的影响，有些能用三言两语说完，但也有些事情不能。我希望今后还是少一些这样无理的要求。

你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绘画是什么？小说是什么？每当被问到这种问题时，我都茫然无措，不知该如何作答。

很久之前，有一档正月期间的广播节目，节目形式是每期邀请不同的嘉宾，一边播放嘉宾最喜欢的音乐，一边进行漫谈。我记得这种节目模式大概只持续了一周。当时让嘉宾选自己最喜欢的歌，其实是受限制的，因为其他嘉宾选过的曲目，就算新来的嘉宾再喜欢也不会再选。我当时点的音乐是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虽说把它作为我最喜爱的曲目，但也只能说是“当下”最喜爱的。

记得数年前，我在逛完伊朗的伊斯法罕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的市场回去之后，会单曲循环凯特尔比的《波斯市场》。

《图画展览会》是穆索尔斯基的作品，原为一套钢琴组曲，其灵感来自于一次画作展览会，会上的作品是由穆索尔斯基一位已逝世的朋友维克托·阿里山大罗维奇·哈特曼所画。全曲中分为漫步、侏儒、古堡、杜乐利花园等十个部分，其中的“漫步”穿插于全曲，展现出了人们流连忘返于各个画作间的场景。

画展上有着独特的氛围。漫步于各个画作之间的人们，回味着已看到作品的余韵，期待着下一个作品将带来的惊喜，这两种情感交织在一起，使人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也许是受展厅空间布局的影响，作品与作品之间都间隔较远，若是将画摆得满满当当，也就使赏画失去了悠闲漫步的感觉。

在公开展览会上，每当看到作品旁边贴有“金奖”之类的标签，就会感觉这个标签实在碍眼。我不想因为看到标签而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而是期待着直接与作品面对面，用心感悟。金奖、银奖这些标签一定程度上会干扰人们赏画。

“哇，原来这是获大奖的作品啊！”如果一边这样想一边看作品的话，就会有先入为主的想法。

当然也有人赞同这种做法，他们认为这可以作为鉴赏参考。如果这个作品没有贴标签的话，可能有的人看到就会想“什么玩意儿啊，这幅画！”于是匆匆而过，但如果贴上了金奖的标签，可能就会引人驻足仔细品味，然后发现这幅画的点睛之笔，发出“原来妙在此处啊！”的感叹。

这么说似乎也有道理，但我觉得用小册子介绍画作的话效果会更好，因为贴上如此醒目的标签，无论如何都会影响观众的判断。在美术之秋上，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想说一两句，但不知不觉又说多了。

选拔考试也是鉴赏的一种，所以，最佳的评选心态就是去掉先入为主的观念的白纸状态。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采用糊名制度，即把考生的名字粘住、盖起来评阅试卷。不同的时代具体做法不同，据说某个时期有可能通过笔迹判断出考生，所以所有的答案全部由负责官员统一书写，然后再由考官判分。

不仅是美术，在音乐或文学上获奖的通常都是自成一派的泰斗或被称为“大家”的人。所谓自成一派，创造了自我世界的人，往往容易以自己设立的标准来看待事物。

让人困扰的是，他们非常顽固，对于别人的意见几乎充耳不闻。总之，设立奖项之类的事归根到底只是给人们的一种参考，再无其他作用。

在19世纪的法国，官方沙龙场地会集中展示被评选淘汰的作品，举办所谓的“落选作品展”。拿破仑三世便是这个活动的创始人，这无疑是一个好点子。可以说，落选作品展对印象主义这一新流派的诞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比如爱德华·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便在1863年的落选作品展中展出，当时的官方学院派并不认可这幅画的画风。我们不知道那年入选“落选作品展”的都是怎样的作品，但的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有几幅颇受好评的作品被世人传诵。

据说，如今画作价值连城的梵高，生前也仅成功卖出过一幅画，也是一位当时不入流的“落选画家”。

我在做客广播节目时，将《图画展览会》选为了最喜爱的音乐，但如上所述，如果是丝绸之路或跳蚤市场兴盛的时期，我一定会选择《波斯市场》这支曲子。

对于获奖者我们欣然祝福，但我也想对落选者高呼“万岁！”

因为胜负高下尚未决，而世事变幻，也许胜负高下终难断。

（1990年10月8日）

# 50.正仓院有感

据史料推断正仓院创建于天平年间（729—749）。虽然，其近旁的大佛殿历劫过数次火灾，但正仓院历经1200余年，至今仍完好无损，真可谓是奇迹一般的存在。

大雁塔是唐朝长安城的缩影，其历史虽比正仓院早百余年，却是用砖、石所建。像正仓院这样的木质建筑，能历经千年之久仍保持原貌的实属罕见。大火对木质建筑的破坏力不言而喻，但能对大型建筑物造成损害的还有人祸。所谓人祸，就是人为原因造成的损失和破坏。

正仓院的宫殿及其他房舍均选用顶级木材搭建。木质建筑的优点是可拆解至别处另行搭建。10世纪初期，朱全忠灭唐，迁都洛阳。被搬走的不止有雄伟宏大的唐朝大宫殿群，还有长安城的大宅院、大寺院，这些建筑全都被拆解成木料，投入渭水之中，于是这些“建筑材料”便顺利地随渭水漂至洛阳，重现雄姿。

若是将砖块、石料投入水中势必会沉底儿，所以砖石结构的大雁塔免遭迁徙厄运，现在仍巍然耸立于古城西安。

正仓院能完好地保存至今，并不仅仅是因为幸运，也离不开严谨的组织与管理。这里收藏着许多天皇敕封的“御用之物”，不可随意乱动。正因为藏品如此贵重，管理者才十分仔细、小心，做好了防火防灾的万全之策。

正仓院御用之物，是公元前756年光明皇后献给东大寺卢舍那佛的圣武天皇遗物，用来为先帝祈冥福，是献给神明的贡品，并非观赏和日常之用。

战争时期，为避免遭遇空袭，正仓院专门将“御用之物”交由拥有牢固藏品库的奈良国立博物馆（当时的“帝室博物馆”）来妥善保存。战争结束后，借由“御用之物”返还正仓院的契机，这批宝物得以被展出，并于1947年10月正式举办了这一划时代的珍品博览会。十分幸运的是这一展出活动被作为每年的例行活动传承了下来。

正仓院创寺1200多年间，为了通风除虫，每年都要将藏品开封晾晒，这项事宜颇受重视，须由天皇下诏，派敕史亲办，开启敕封。每逢此时，受命者便可大饱眼福一睹藏品真容，这也是其“职务”所在。

即便是贵族，想要一览正仓院御用之物也并非易事。第一位被特许观展的贵族，是赫赫有名的藤原道长，因其受戒于东大寺，所以获此特许，于宽仁三年（1019），即正仓院御用之物供奉的第263年，入寺观览。

北京紫禁城，即“故宫”，所存文物藏品跟正仓院的御用之物大有不同。正仓院的御用之物是敬奉大佛的贡品，而故宫藏品则是各地献给皇帝的贡品。正仓院的御用之物原则上是不能让世人参观的，但故宫的藏品专供皇帝赏玩，皇帝偶尔还会让宠臣一起观赏，甚至心情好了还会赏赐给大臣。原则上讲，故宫的宝物是皇帝的私人收藏。

无论是故宫文物还是正仓院御用之物，现在这些藏品老百姓都能看到，真是十分难得。正仓院有北、中、南三仓，北仓和中仓存放敕封御用之物，南仓存放着大量的佛具和药材，由东大寺施“网封”封锁监管，必要时可以开启南仓取用药材。依据佛教教义“慈悲”，如遇病人上门求药，不得拒绝。但每次取药都要请敕史来开封，委实过于麻烦。最后，南仓也被“敕封”，不得随意开启。

世间之事没有一成不变的。

正仓院的药材也一样，从治病救人随时取拿，变成了存而不用的贡品。其中记录在册的有60种药材。像麝香、犀角等，虽为高级药材，逐渐也变得可通过商船从海外载回或通过其他方式更加方便地获取，即便如此，正仓院的药物依然不开仓使用。这些药材，被作为“天平年间的专用物品”成为了纪念品，或者作为重要资料被严加保管。

琵琶、镜子以及屏风，原本都被列为为前代天皇祈福的贡品，但是逐渐演变成为“古董美术品”。若是“古董美术品”的话，那世人自然想一览其芳华。

恰逢战争结束，御用之物返还，于是顺理成章地促成了正仓院御用之物的展览。

正仓院御用之物不仅有贡品和古董美术品的价值，还是传播西方文化的媒介，是西方文化经由南海传入东方的宝贵证据和珍贵遗产。这些“御用之物”，满载着先进的西方文化，和人类的强大意志与美好善意，传入了这片对西方世界尚无认知的土地，传给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这些“御用之物”的价值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古董美术品，是一笔瑰丽无比的文化宝藏。

（1990年10月15日）

# 51.五弦琵琶

我很纠结于甄选出一件“正仓院的经典御用之物”，因为可以从各种角度选出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最终，我还是选了“五弦琵琶”。

关于“琵琶”一名的来源有这样的说法：演奏琵琶时，手指由内向外拨弦称为“批”，反之由外向内拨弦称为“把”，琵琶的弹奏方式正是如此反复拨弹，故得此名。但我认为，琵琶是从西方传来的乐器，所以应从它波斯语的名字——八鲁巴特（barbat）来探究琴名的来源，这样才更具说服力。

波斯语辞典中解释道，八鲁巴特是鲁特琴的一种，“八鲁”是指“胸”，“巴特”是指“鸭子”，而琴身确实与鸭胸脯十分相似，由此命名为“八鲁巴特”。这一解释更加妙趣横生啊！

既然有“鸡胸脯”这种词汇，那我们称之为“鸭胸脯”也无可厚非。仔细想来，漫步在北京街头，看见北京烤鸭店门前挂着的一排排鸭子，确实看上去就像挂了一排排乐器。

伊朗的琵琶是四根弦，琴头部分弯曲上翘，即所谓的“曲颈”，琴身前端像“虾尾”一样，总觉得整个琴很像鸭掌蹼。正仓院里也有几把四弦琵琶，有贝壳螺细镶紫檀的，有木雕镶紫檀的，还有桑木的，各不相同，妙趣横生。但是，五弦琵琶只有一把。

据说五弦琵琶起源于印度，但最初传入中国的是伊朗的四弦琵琶，印度的五弦琵琶是在四弦琵琶广泛普及之后才传入中国的。

新事物刚兴起的时候，总是十分稀罕，无论是什么都令人趋之若鹜，但往往最终，人们还是会回归到原本熟悉的事物上。在中国也是一样，从印度传来的五弦琵琶一度十分盛行，但最终却无人问津，目前现存于世的五弦琵琶已经很少见了，恐怕只能从出土的文物中找寻它的踪迹了。

五弦琵琶在追趋逐耆盛极一时的时代被传入日本，收藏于正仓院中而保存至今。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唐朝五弦琵琶的真品，世间现存的仅此一把，确实弥足珍贵。

特别能够说明此琴是“真品”的，是在石窟寺院的壁画上，画有这样的一把五弦琵琶，跟保存在正仓院的一模一样。

据传，琵琶原本是骑在马上弹奏的，并不是收于室内轻抚慢捋的乐器。又有说法称汉帝嫁女于乌苏氏，被称为“乌苏公主”的皇女在马背上弹奏琵琶，她就是马背上弹琵琶的第一人。在描绘昭君出塞的画卷中，也一定能看到骑马弹琵琶的人物形象。

正仓院所藏五弦琵琶的捍拨（弹奏琵琶用的拨子）上镶嵌着鳖甲（玳瑁），还装饰着贝壳螺钿精雕，绘制着异域乐师骑在骆驼上弹奏琵琶的情形。无论是骑马还是骑骆驼，肯定免不了颠簸晃动，如此弹奏势必不能手准琴稳，所以古代马背上弹琵琶一定是随机应变、即兴演奏。

杜甫曾造访王昭君的故乡，并作诗句：“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昭君出塞的故事已传诵千年，时过境迁，这句“千载琵琶作胡语”也变得晦涩难懂。“胡语”是昭君远嫁之地的语言，边陲荒漠弹琵琶唱胡语，昭君已死却仍魂宿塞外，她的“怨与恨”与边塞胡语和琵琶琴曲交织在一起，乐音不停泣诉不止。

琵琶的即兴性很强，可以与任何国家的语言搭配弹唱。人常道音乐无国界，正仓院的五弦琵琶仿佛就印证了这句话。它的花纹中有骆驼和胡人，颇有西方色彩。外形酷似芭蕉，那是一种生长在东南亚的热带植物，而装饰用的鳖甲和螺钿显然是南海所产，真是包罗了世界各地的元素。甚至可以断定五弦琵琶所上绘制的那个骑骆驼弹琵琶的胡人，怀里抱着的是曲颈四弦琵琶。

乘兴而为，吟诗作赋，鼓动琵琶，历史上有很多作品都借琵琶抒情达意。比如收录于《唐诗选》，被日本文人所熟知的王翰的名篇《凉州词》，也是以琵琶曲为背景，表达了出征将士的悲戚之情。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作者描写的将士们，不仅要受着马背的颠簸，还要端着夜光杯，痛饮葡萄美酒，且这颠簸晃动不能浪费，恰可抱着琵琶顺势拨弹，可见琵琶真是不挑场合宜静宜动的百搭乐器。

（1990年10月22日）

# 52.月琴

我曾在长崎听过月琴演奏。那是一首名为“算命”的曲子，是中国明代歌谣，随外来的商人传入长崎。

“算命”一词的本意是占卜命运，占卜者被称为算命先生。说到明代，不禁让人想起该时代创作的小说——《金瓶梅》，书中塑造的女性角色命运多舛，那坎坷的人生几乎与哀婉琴曲的跌宕旋律完美贴合。

唐代诗人白居易写有长诗《琵琶行》，乃是随着一曲琵琶，讲述了一位昔日的长安名妓，红颜退尽，嫁给商人为妻，潦倒落魄靠着弹奏琵琶勉强生活，漂泊于世的故事。幕府末年明治初期，歌人高崎正风（1836—1912）改编了这个故事，取名《浔阳江》，也是配着萨摩琵琶的琴声娓娓道来。流传至长崎的《算命曲》应该也属于这样的曲风。

普通的琵琶都形似西洋梨，但是“月琴”形如其名，琴肚如满月一样是正圆形。月琴是在江户时期从中国传到了长崎。

据中国文献记载（如明代《三才图会》），月琴也被称为“阮咸”，也有说法认为其本名就是阮咸。

“阮咸”其实也是“竹林七贤”其中一位的名字。据传此人通晓音律，偏爱四弦正圆形琵琶，于是人们便不再叫他的本名，而是称他为“阮咸”。据说阮咸这门乐器也是由他所创。

在日本正仓院的御用之物中，也有一把精美的螺钿紫檀阮咸，这也是唐代仅存的阮咸真品。琴的背面绘制着两只鹦鹉盘旋飞舞的绚丽图案。

这把正仓院的阮咸，和月琴有所不同，它的琴颈长度相当于琴身圆形面板宽幅的1.5倍，而月琴的琴颈要短很多。月琴的琴颈比圆形面板的直径略短，抱着弹更舒适，也容易调弦校音。这种设计使月琴更利于即兴弹奏，从而也就更易融入百姓的生活。从琴颈长度这一点来看，显然阮咸和月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乐器。

据传，在幕府末年花柳巷里，与三味线相比，月琴似乎更为独特、洋气，曾经风靡一时。不仅是花柳巷，由于轻巧便携的设计，月琴也普及到了寻常百姓家中，并且至少传承到了大正时代。大概在吉他这类西洋弹唱乐器兴起的时候，月琴才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正仓院的阮咸是地地道道的唐代乐器，但实际上在唐代初期，阮咸就已基本销声匿迹无人知晓了。通过史料文献和传说才得知这是竹林七贤之一——阮咸的心头好，或者有推测认为是阮咸制作的乐器。但时至今日已完全找不到“阮咸”这种乐器了。

竹林七贤之一“阮咸”，生活在3世纪。在7世纪后半叶武则天执掌朝政的时期，从四川古墓中出土了一件铜质的类似于乐器的东西。外形似琵琶，但琴身却是圆的，当时谁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但是，有位见多识广的人说，这是阮咸制作的一种乐器，原本应是用木头做的。就这样，在地下深藏了四百年的“阮咸”真容，终于重现天日。

以上是《三才图会》中的内容，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正仓院的那把阮咸琴就是这种乐器刚复兴不久的时候制作的。

据其他史料记载（《旧唐书·音乐志》）：“圆体、修颈、小形乐器，被称为‘秦琵琶’，又俗称‘秦汉子’。”我个人比较中意“秦琵琶”的叫法，因为之前说过了，“琵琶”实际上是波斯的八鲁巴特琴，若在前面加个“秦”字，就引入了中国元素，有了中国味道。

“秦”这个字，写出来、读出来都是满满的中国味儿。始皇帝争霸天下一统诸侯，秦朝维系了15年后被汉朝取代，汉家天下绵延了400余年。汉族、汉字都被我们所熟知，“汉”也代表了中国。像“秦汉”这样，将两朝代号叠加起来命名的，总让人觉得有点奇怪。

琵琶虽是从波斯舶来的乐器，但是迎合世人的喜好加以改良，称其为“秦琵琶”或是“秦汉子”也无妨啊。“阮咸”本人和阮咸琴不也是经过了一番改良才被世人所熟知的吗？

阮咸和他的叔父阮籍都被世人称为传奇人物。每年七夕是通风驱虫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各家各户的衣物博览会，不管大名鼎鼎的阮咸在家门口晾上什么，哪怕是一条兜裆布，也绝对会引起轰动。

那时候，宰相荀勖也精通音律，常与阮咸争论音乐，但还是阮咸略胜一筹。荀勖因此生了妒恨，便借故把阮咸贬为始平太守。

阮咸凡事率性而为，个性乖张，不喜欢依照常理弹奏波斯的琵琶，于是将琴身整体做了改造。当时，正逢朝局不稳，党争激烈，竹林七贤中也有人因此丧命，而阮咸因遭人妒恨被贬到地方做官，这才保全了性命。真是何其幸运，正好天高皇帝远，悠哉享尽天年。

（1990年10月29日）

# 53.围棋传入日本

正仓院中，除了背面饰有华丽鹦鹉图案的“螺钿紫檀阮咸”，还有一把桑木阮咸，这把阮咸的捍拨是皮质的，上面刻画着一幅“树下围棋图”。图上画着两位似神仙的人正在下围棋，两人中间还站着观棋者，背后是松树和竹子。

因为竹林七贤之一“阮咸”酷爱乐器，所以人们将这把四弦正圆形乐器命名为阮咸，捍拨上还画着象征着竹林隐士的人物形象，生动有趣。

说起围棋，在正仓院御用之物中，有一件精美绝伦的彩绘棋盘，紫檀质地，在《国家珍宝册》上榜上有名，被称为“木画紫檀棋局”。

据说将围棋带入日本的是遣唐使吉备真备，这套“木画紫檀棋局”就是他当年离开唐朝时带回日本的，这一说法应该有误吧。吉备真备于天平七年（735）返回日本，是圣武天皇即位11年后的事情。没过多久，圣武天皇珍爱的物品就悉数献给了东大寺。

我认为说什么这些东西全都是遣唐使带回日本的，这只是形式主义上的说法而已。应该是中国的文物从百济随佛教僧侣而传入日本，整套留存了下来，这种说法尚可说得通，专程从中国背一盘棋回来不太可能。若棋盘真是由了解围棋的人远渡重洋带回日本的话，这套围棋实在跟唐朝时围棋的外观大不相同，肯定是经此人之手在棋盘上描了线，在圆圆的棋子上着了色，这才成了现今的这套围棋。

正仓院的围棋棋盘，和现在用的棋盘一样都有19路。从汉代墓穴出土的陪葬冥器中，发现了17路的棋盘。但是，从开皇十四年（594）征虏将军张盛之墓中出土的青瓷棋盘，就已经有19路了。魏晋南北朝时代——3世纪至6世纪，棋盘从17路演变为了19路。那么值得探讨的是，从2世纪到3世纪的这段时期，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刘备、曹操他们所用的棋盘究竟是17路还是19路呢？

或许在那个权谋术数极为复杂的时代，17路围棋也不够施展了，所以增加了路数也未可知。

历史人物都怎么下围棋呢？据说，要是能看到他们的棋谱就能稍许猜出下棋者的性格。但是非常可惜，据说现在虽有留存下来的棋谱，但那些也都是12世纪以后的棋谱了。若真从棋路看性格，倘若看似粗野蛮横的张飞下起棋来却是意外地慎重仔细，那可就有意思了。

唐代小说集《杜阳杂编》中有一篇，讲的是一位擅长围棋的日本王子和唐朝著名棋手顾师言对弈的故事。几个回合下来，顾师言险胜，日本王子问鸿胪卿（礼部大臣）：“顾先生的棋技在唐朝排第几名？”答曰“第三名”。其实，顾师言的棋技就是第一名，谎称其第三也许是为了彰显国威吧！日本王子长叹道：“小国第一不敌大国第三啊。”这个故事发生在大中年间（847—859），但那时候西渡大唐的只有元珍和尚（智证大师），事实上并没有王子遣唐这回事。

社会上有言论称，《杜阳杂编》中出现了虚构的国名，所以无法作为史实来阅读。

但是日本人擅长围棋的说法却是真的。延历二十三年（804），空海和最澄这两位大师出使大唐，当时有一位名叫伴小胜雄的人，因擅长围棋而出名，便也加入了遣唐队伍。

使节团抵达大唐之后，就经常和当地人一起下棋。即使语言不通，但下棋的规则相同，因此可以尽情对弈。唐朝人也是一样，即使找来了翻译，与其鸡同鸭讲问东答西，不如下盘棋来得痛快。

在中国，围棋也被称为“手谈”，因为下棋时默不作声，仅靠一只手的中指、食指运筹棋子，斗智斗勇。

空海一行人抵达大唐之时，大唐太子亲信有一名围棋名士叫作王叔文。他不仅是一名棋手，也是太子的政治谋士。后来太子即位（唐顺宗），王叔文便掌握了政权核心，推行了朝政改革。

大唐太子的亲信中有位围棋名士这一消息，也许当时已经传到了日本。日本和唐朝的交流，不仅靠遣唐使，在东亚海域，靠新罗商船进行频繁地通商往来也盛极一时。那时消息的灵通度，远在我们现代人的想象之上。让伴小胜雄一起前往大唐看似唐突，也许实则是当时掌权者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吧。

当时遣唐使抵达长安不久，德宗驾崩，太子即位，但是新皇帝重病在身，所以王叔文急着要推行政治改革，忙得顾不上跟日本棋手对弈。民间得知了掌权派的喜好，长安城内便会聚了棋手。于是伴小胜雄跟他们“手谈”甚欢，他精湛的棋技被当地人交口称赞，可能他就是《杜阳杂编》里日本王子的原型吧。

（1990年11月5日）

# 54.博弈

《论语·阳货篇》中有如下篇章：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即是说：整天吃饱了饭，什么心思也不用，真是太难了！不是有掷采下弈的游戏吗？干干这个也比闲着好。

“博”是指像“双六”一样的游戏，“弈”特指围棋。

有说法解释“博弈”就是双六，但是在《论语》的注解书籍中，大部分将其拆解为“博与弈”。

究竟“博”是怎样的游戏，至今无人知晓。因为在宋代文献记载中，此物已“失传”，所以估计在唐代，“博”这种游戏已经没落了。传至日本的“盘双六”勉勉强强流传到了明治时期。还有一种游戏叫“绘双六”，我们小时候特别爱玩，“盘双六”和“绘双六”的基本玩法都是按摇骰子的点数走棋子，但“盘双六”的规则要比“绘双六”复杂得多。

无论是雅乐，还是茶道、花道或是盘双六，在中国都“失传”了。这些在古籍记载中已黯然失色的物什，流传到日本，并且保存至今，这正反映出了“正仓院精神”。

正仓院中，珍藏着一件“木画紫檀双六局”，这无疑是唐代“博”的棋盘。从新疆吐鲁番的唐代墓穴中，出土了与其类似的小模型。

关于汉代的“博”，虽然没有实物留存至今，但是从古代陪葬品中可以找到陶制或木质的“博”的小模型，或者我们可以在石刻壁画上看到关于“博”的刻绘。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彩绘木雕六博俑”，和河南灵宝汉墓出土的“绿釉陶六博俑”，都曾在日本进行过展览。

正仓院的双六局，其外侧刻绘着唐花草纹样，并搭配蝴蝶、飞鸟和流云等图案，华丽无比、精美绝伦，其表面还有木镶嵌图样花纹和牙制新月花纹，但是，却没有汉墓出土人俑上绘制的那种规矩纹样。汉墓出土的俑，其所持棋盘的侧面排布着六根小棒，作用貌似是使棋子前进，被称为箸或者箭。

棋子各六个，棒也是六根，所以称为“六博”或者“双六”。

在中国，似乎不同时期有不同玩法，所以非常复杂。骰子的点数不是用数字，而是用“牛、雉、枭、卢、白、塔”来表示。

据古代文献记载，“枭”的点数最大。所以，要赢棋就必须要“杀了枭”。但是至于具体怎么“杀枭”，以及枭和胜负的具体关系，至今仍未能查明。至于为什么要杀枭，可能是因为“枭”是骁勇之将，替王破敌之后，势力越来越强大，很有可能弑主篡位，所以必须杀了枭，实现最终的胜利。《韩非子》（公元前3世纪）上记载：“博者贵枭，胜者必杀枭。杀枭者，是杀所贵也。儒者以为害，故不博也。”因为这下棋的规则是要杀死功臣方能取得胜利，做法实在残忍，所以说儒者不下棋。但正如文章开篇所述，孔子认为，与其饱食终日不如掷采下弈。孔子生活的时代比韩非子早250多年。

或许在孔子的时代，并没有杀枭的规矩。西晋时期（256—316）有一则逸闻，说是士兵出阵时听到了枭声，大喜，认为这是吉兆。然而，到了东晋时期，“雉”就变成了比枭更大的骰子点数。

“博”被逐渐废弃，与其规则之不义相比，可能更多是因为玩法过于复杂且规则多变吧！原本是一款益智游戏，但因掷骰子增加了赌运气的成分，最终和麻将一样沦为了赌博的工具。

“弈”换言之就是围棋，更偏向于纯粹的脑力游戏。可以“让子”，由弱者先摆上一定数目的棋子之后再展开对弈，可以说是非常绅士的玩法。因为是游戏，自然有输赢之分，但它与“博”不同，并不涉及赌钱，而是与书画、文房一样属于高雅趣味，其游戏规则与古代并无差别。

参赌押宝这一事情的性质日渐恶劣，“博”也随之变得恶俗起来。这种参赌押宝的行为被称为“赌博”，而赌博的人则被称为“赌徒”，就连“博”这个字也变得臭名昭著。“弈”成为了君子必备四大才艺（琴棋书画）之一，而“博”却落得如此下场。

另外，关于孔子的饱食终日之说，我想从“像真正的人一样活着”这方面去解释，“饱食终日”是连动物都可以做到的，但是动脑筋做事却只有人可以。

孔子十分担忧那些吃了睡睡了吃的人，于是才说了“去下棋也行啊”这样的话。

（1990年11月12日）

# 55.棋友

据传竹林七贤之一阮籍（210—263）在与人下棋时，有人告知了他母亲病故的消息，但他依然坚持在棋场上不肯离开，直到棋局见分晓时，才痛饮三升酒（相当于现在日本计量单位的三合），号啕大哭，吐血数升。

据说如果过分痴迷于围棋、将棋的话，会连亲人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阮籍的这一逸话，恰好证实了这一点。阮籍非但没去看一眼临终的母亲，反而不慌不忙地继续下棋，这不是大不孝吗？但是之后号啕大哭、大口吐血，这又该作何解释呢？

如前文所述，围棋的别名为“手谈”，除此之外，还有“坐隐”一说。“坐隐”并非归隐山林，而是坐着就神思隐遁了。

隐遁是指逃离烦闷世俗，过着清心恬淡的生活。而围棋可使人平心静气，于是也将围棋称为“坐隐”。如此说来，阮籍母亲去世之时，是他下棋时的心境努力抑制住了内心的波涛。

一旦沉下心来，不到棋局终了不能抽身，所以在下完棋后，他借酒意驱散心中的不安，不禁号啕大哭。

人世间不解围棋奥妙，冥顽不灵的人有很多。同时代有个叫祖纳的人，是个围棋痴，史官王隐劝他：“禹惜寸阴，不闻数棋。”意思是，圣人大禹，勤于治水，乃惜寸阴，不闻棋声。但是祖纳却巧妙回之“我亦忘忧耳”。

人定有烦忧，偶尔被烦忧所困甚至无法专心工作。大概是王隐无法体会围棋解忧之妙，才如此规劝祖纳，但纵使搬出圣人先贤的事例也无济于事。

诗人陶渊明（356—427）的曾祖父是东晋名将陶侃。据说他对荆州将士痴迷于围棋这件事十分愤怒，曾把围棋连棋带盘都扔到了河里。如果是在两军交锋之际，陶侃作为总司令官，这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有个故事讲，大概在3世纪时，一个叫王质的人进山砍柴，偶遇两小孩儿下棋，于是坐旁边观战，看得太投入以至于忘了回家。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斧柄都腐坏了。

这就和浦岛太郎在龙宫沉浸在与龙女的幸福生活中，忘记了时间流逝一样。观棋也是一件让人沉浸其中，忘却时间的乐事。故事中的浦岛太郎，在百宝箱打开的瞬间飞速老去；王质不过看了几局棋，手中的斧柄就已腐朽，可谓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王质遇到的两个下棋童子可能也是神仙吧。

上述王质烂柯的故事出自《述异记》，该书中还描写了另外一个离奇的棋友故事。

据说刘廓和朱道珍是一对棋友，只要他俩下起棋来，就不分白天黑夜地对坐在棋盘两边，甚至中途都不休息。现代人下棋用的棋盘十分笨重，用双手托起棋盘时，甚至要吆喝着“嗨哟”用劲发力才行。最后真想干脆就在存放棋盘的仓库里直接下算了。但是，正仓院珍藏的棋盘，其四个支撑面的中部都被掏空了，呈波形图案，看起来非常轻盈、便携，可以随意端去任何喜欢的地方下棋。此外，从隋朝张盛的墓穴中出土的青瓷棋盘小模型，其四边的立面也是这样的造型。

前文说的故事其实是这样的：元徽三年（475）朱道珍去世，刘廓痛失棋友。数月后，突然一男子给刘廓送来一封信，说是朱道珍给他的。刘廓打开一看，果然是朱道珍的亲笔，信上说“每天都十分想念跟你一起下棋的时光，正好还有缘分，很快就又要见面了”。

刘廓刚一看完，那封信连同送信的男子就都消失不见了。没过几天，刘廓就病逝了。

南宋一位名为赵师秀（1170—1219）的诗人写了一首《约客》。“客”指棋友。诗的大意为：约了棋友下棋，但棋友却迟迟不来。作诗背景为江南的梅雨季节。

黄梅时节家家雨，

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

闲敲棋子落灯花。

梅子黄时，家家都被笼罩在雨中，长满青草的池边传来阵阵蛙声。等到后半夜，约好的棋友都没有来。就像前面故事里，从另一个世界寄来的信一样，作者对棋友的思念之情越发迫切。后来等得倦了，也别无他法，只能独自一人轻轻敲打棋子。

“闲”，就字面意思来看是闲暇之意，有“闲情逸致”之感，但是在本诗中，却用来刻画诗人焦虑地等待棋友的画面。所以此处的“闲”应理解为“独自一人百无聊赖”。

“灯花”是灯芯燃烧时结成的花状物，可用剪刀剪去，也会自然脱落。诗人百无聊赖之际，在棋盘上轻敲黑白棋子，而笃笃的敲棋声将灯花震落了，一闪一闪照亮了周遭。

（1990年11月19日）

# 56.将棋、象棋

正仓院中有围棋盘和双六棋盘，却没有将棋盘。

将棋在古代文献中被写作“象棋”或“象戏”。

据说围棋黑白两色棋子象征的是阴阳，这也是起源于中国。与之相对的将棋，据说是模仿古代印度军队的编制，所以应该是起源于印度。古代印度的象军骁勇善战，令人印象深刻，所以将棋盘游戏命名为“象棋”。

象棋原本在印度名为“恰图兰卡”，直译为“四人组”，是在棋盘四角置子，四人参与的游戏。

该游戏从印度传出，途经波斯传至西方国家演变为“国际象棋”；传至东方国家演变为“中国象棋”“日本将棋”。

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象棋是后周武帝（太祖郭威， 951—954年在位）所创之物。

后周，是唐朝消亡之后，半个世纪内崛起的“五代”中的最后一个王朝。

若此说法成立，那么唐朝是没有象棋的，以此类推，那时候的正仓院应该也没有将棋棋盘。此外，后周出现的象棋中的棋子包含日、月、星辰，所以和将棋应该不是同一种棋。

明明没有象军为什么要叫“象棋”？“棋子”是指棋盘上移动的小块，在双六中也有使用。有说法称，上等的棋子是用象牙所做，所以叫“象棋”。公元前3世纪《楚辞》招魂篇中，就是用“象棋”来表示双六中的棋子的。

中国象棋的棋子是圆形的，朝鲜象棋的棋子是八角形的，而八角形接近于圆形。日本将棋的棋子则是长五角形，和中朝两国的棋子造型大不相同。说起日本的棋子，其尖尖的一头冲着对手，可谓敌我分明。圆形的象棋子，棋子上用红字和蓝字区分敌我，且同兵种的棋子，棋上的字各不相同。红、蓝两方的棋子名字对照来看：

红：兵、炮、俥、傌、相、仕、帥

蓝：卒、砲、車、馬、象、士、将

其中“帥”和“将”，相当于日本将棋里的“王”或“将”，有趣的是“相”和“象”是同等作用。

在现代汉语中“相”和“象”都有四声xiàng的发音。“相”是“宰相”，有辅佐君王之意。如上所示，蓝字写作“車、馬、士”的棋子，在对应的红色棋子上都额外加了单人旁，写作“俥、傌、仕”。如果蓝字的写法是本源的话，那么将象和砲、車、馬并列起来，就是一组象军，感觉可以与红色的“相”相匹敌。

中国象棋棋盘中央有一条“河界”，而象是不能越过“河界”前往敌境的。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因为大象太重，无法渡河。

因为日本将棋和中国象棋的棋子形状和下棋规则都不相同，所以有说法称，日本将棋并非源自中国。从中国传来的围棋，传到日本之后基本的游戏规则并没有改变。在中国，围棋开局之前要将黑白两子各摆两个，且呈对角星状，方可开局。在日本室町末期，废除了这种提前放子的规则。现在，中国也没有这种规矩了，所以说大体上中日两国下围棋的规则是一样的。

中日两国的象棋、将棋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有无“河界”；二、棋子被“吃掉”后是否还能在棋盘上继续使用。

象棋在古代印度兴起的时候，是一种战争模拟游戏。当然战场是想象出来的。

中国有长江和黄河这样的大江大河，所以哪怕在战争模拟游戏中，它们也必定会出现。于是也就有了“象”不能过河的规则。

其次，在日本将棋中，吃掉对方的棋子可以为己所用，但是，在中国象棋中，被吃掉的棋子就要被清出棋盘。因此，中国象棋是越下棋越少，棋盘上越来越寂寥。

吃掉对手的棋子后可以为己所用，可能是因为这一点在日本真实的战争中也有诸多体现。在源平合战中就是这样，亲族之间分成敌我两派，但打来打去都是自家兄弟姐妹，最后导致一族之人分崩离析。

这场由兄弟吵架演变成的大规模战争，战场上的对手既是敌人也是亲友，所以俘虏回来的敌人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被策反为自己的部下。

游戏规则是可以随着当地情况而改变的。河界是根据中国的地理现状设定的，而棋子的再利用是根据日本的人际实情设定的。

那么印度象棋的“象”这枚棋，在中亚地区就会变成“骆驼”，而“车”在东南亚就会变成“船”。

（1990年11月26日）

# 57.醉象

日本两大益智游戏分别是围棋和将棋，这两者总被人们拿来比较，将棋名士升田幸三曾做了个比喻来形容两者的不同：“围棋是画卷，将棋是雕刻。”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确实不能评判出到底画卷和雕刻谁更胜一筹。

将棋传入日本的时间要比围棋晚很多。关于将棋的记载，最早出现在11世纪初期的古代文献中。据说在平安时代，将棋被认为是比围棋更高雅的游戏。围棋只用黑白两色石子做棋，而将棋的棋子上刻有文字，换言之，下围棋的人可以不识字，而将棋只有读书识字的人才能玩，所以当时的人们认为将棋更高雅。在现代人看来这真是荒谬至极。

正仓院的围棋棋盘与现在的相比基本无异，但是将棋却随着历史的变迁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平安时代到镰仓时代，大将棋和中将棋棋盘边长有12格或13格。

棋子的数量也很多。还有一些棋子的名字叫猛虎、飞龙、奔车、猛豹之类的，虚张声势甚是唬人。

如今通用的9×9格小将棋，据说是在16世纪后半叶才得以确定。在日本，将棋以“将、马、车”三枚棋为主，在棋名的单字前加上别的字，变成更高雅的棋名，当然棋子的功能也有不同。比如，在“将”字前加上玉、金、银，就是“玉将、金将、银将”。棋盘上的大王是“玉将”，这个棋子一旦被围困就输了，在玉将周围还配有金将和银将两枚棋子。在中将棋盛行的时代，玉将也被称为“铜将”。在“马”前加上香气袭人的“桂”，就是“桂马”；在“车”前加上“香”，就是“香车”，诸如此类的加字命名的棋子不胜枚举。

在17世纪末的元禄时代，书中出现了关于“醉象”的记载。中将棋的棋子布局是在正中间放置玉将和醉象，然后在其左右两侧，从中间向两边依次摆放金将、银将和铜将。可见，醉象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枚棋子。

大象是凶猛的动物，喝醉酒的大象更是让人束手无策。

佛教语录《法苑珠林》中有云：

其王放醉象，凶害牙甚利，诸龙蛇怀毒，遇者皆当死。

书中说，醉象凶狠堪比毒蛇。在修行佛法中，更是用“斩毒蛇，擒醉象”来表示破除心中烦恼，禁锢心中邪恶贪欲。

可见醉象是多么可怕。

醉象这枚棋也许比飞车和角行的杀伤力更大。貌似小象棋时代还残留着醉象这枚棋。从16世纪的房屋遗址中出土了写有“醉象”二字的棋子。其他棋子上写有“玉、金、银”，或者“桂、香”等字样，但唯独这个棋子上是“醉”，感觉非常厉害。

日本享保三十年（1728），长崎引进了两头大象，但是死了一头，另一头被千里迢迢送去了江户。在运送途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看见大象。他们之前只知道大象是普贤菩萨的坐骑，只在画上或者雕像上看到过大象的样子。

在中国的皇家园林中，豢养着外国进贡的奇珍异兽。在清代，北京宣武门附近就有一个“象房”，那里饲养的大象平民百姓一般是见不到的。但是每年阴历六月三伏天，大象会被从厢房中放出，牵至河边进行水浴清洗。每年此时，百姓才有机会一睹“象容”。

北京的岁时记中，“洗象”是夏天的一项民俗，常有文人墨客以此为题吟诗作赋。清代诗人王士祯（1634—1711）的《都门竹枝词》中写道：

千钱更赁楼窗坐，

都为河边洗象来。

“千钱”，在当时应该比一两银子多一些。花这么高的价钱，只为租靠近河岸的屋子看洗象。清末彭蕴章（1792—1862）有诗《幽州土风吟·洗象》，也很有趣：

宣武城南尘十丈，挥汗骈肩看洗象。

象奴起象游玉河，长鼻卷起千层波。

昂头一喷一天雨，儿童拍手笑且舞。

笑且舞，行蹇蹇，日暮归来洗猫犬。

作者幽默地写道，看了大象洗澡的壮观景象，我也洗洗我家的阿猫阿狗吧。

日本也一样，当大象从长崎运往江户的时候，沿途有很多人围观，于是市面上出现了很多关于大象的书籍和绘本，一时之间出现了“大象热”。那时候，将棋里已没经有“醉象”这枚棋子了，倘若“醉象”这枚棋子能坚持流传到18世纪的话，或许还能乘着这股热潮重新兴起、继续使用。

（1990年12月3日）

# 58.特价促销

“大甩卖”就是廉价销售的意思。现在有很多特价广告牌上用片假名写着“クリスマス·セール”（圣诞特惠）、“グランド·セール”（品牌大促），可以说现在只用汉字写个“歳末大売出”（年终大甩卖）已经过时了。

我曾写过以昭和初期为时代背景的小说，今后可能还会继续创作，创作时令我感到特别困惑的是，昭和时期的语言词汇和现代人们所用的语言词汇一样吗？比如，在举办昭和天皇即位大典的昭和三年，一位极其普通平凡的家庭主妇，在约隔壁邻居上街采购时，会不会说“大甩卖了！走，一起血拼啊”？对此我不禁陷入沉思。“大甩卖”一词，过去在英语中对应的词，翻译过来是“减价商品”，这不是日本新造出来的词汇。

小说的叙述部分不分时代随意用词也就罢了，但是对白部分还是必须要用符合昭和时代的语言。我在昭和十五年的时候已经上初中了，算得上初识社会，对那个年代还有些记忆，可以判断出那一时代的语言。

但如果是昭和早期的语言，我也无能为力了。

附近的商业街经常有年终大促活动，我至今还能想起来当时的情景。以前，临近年末的促销叫“特价促销”，但最近几年已经很少能听到有人这么说了。“特价促销”这一词语原本就是京阪地区特有的，如今在以东京为中心的商业圈中，自然寻觅不到这一词语的踪迹了。可能是“特价促销”给人一种老土的感觉吧！

日语的“特价促销”写作“誓文払い”，《日本语大辞典》上关于这个词的解释是：日本京都的商人和妓女，有每年阴历十月二十前往祇园的冠者殿进行参拜的风俗。目的在于洗清他们欺骗顾客的罪过，并免除神罚。

这一解释并未提到特价销售，但是在《大辞林》中有补充解释：“到了近代，包括当天在内的几天里称为灭罪期，京阪地区的商店都举行的特价销售活动。”

这个词的原意是“为了赎罪进行的参拜活动”，而“促销”只是其延伸意义，也只是一项地方性活动，没有得到大范围普及，加之近年来也不怎么举办此类活动了，所以有很多字典就删除了“促销”这一解释。

商人和妓女对客人的欺骗行为，总让人感觉是不可避免的。哪怕一年只有一次，他们去祈求神灵消罪免罚的这一行为，我觉得还挺可爱的。冠者殿也被写作“官者”，位于四条寺町，是祇园的末社。里面供奉的神仙被人们称为“誓文返神”。在参拜“誓文返神”的这一天，通过大甩卖来趁机赚上一笔，也是水到渠成的事。现在这个活动取消了，对商人们来说也是一种神罚吧。

丝绸之路上的著名商业民族粟特人，是伊朗民族的一支，在唐朝文献《唐会要》中有如下记载：

康国生子必让口食蜜，手中置胶。

这是对粟特人生活风俗的介绍。让子口中含蜜，是希望其子长大成人后，能满口甜言蜜语，在商场上争得分铢之利。“花言巧语”严格来说可能并不是谎言，但以此来迷惑、取悦对方，几乎也算得上是谎言了。父母希望子女成为花言巧语的人，而这样的人往往都是大商人。

7世纪，玄奘途经粟特，毫不留情地评价：

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

玄奘三藏说，在粟特一半是农民一半是商人，农民“力田”，商人“逐利”。

粟特人让刚生下来的孩子手里拿着胶一样的东西，意思是若有东西一旦得手就绝不放手，即到手的利益绝不能放弃，似乎在粟特人看来，这一点要比花言巧语更重要。

天生就是经商之才的粟特人，不知道有没有像日本那样消罪的习俗。三藏法师也没有提及这一点，如果有的话，势必会比日本人更善于利用“消罪”的特价大促来“逐利”吧。

特价促销的主旨应该是赔本售卖。这种促销活动刚开始只在消罪当天，后来发展至前后几天，最后直接延长至一周。如果真是赔本买卖的话，时间肯定不会这么长，想必是薄利多销吧。

现在人们对于“消罪降价”感觉很沉重，这可能也是“特价促销”这四个字在日本渐渐消失的原因之一。

但是打着降价旗号进行促销的活动依然火爆，“特价促销”变为“大甩卖”“节日特惠”，都是换汤不换药罢了。庆祝棒球队大获全胜也要搞个促销，商家对前来购物的客人极尽殷勤，趁势赚他个盆满钵满。

（1990年12月10日）

# 59.灶王爷

远古时代，北京猿人靠钻木取火改变了生存方式，上古人类将火视为圣物。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也被称为“拜火教”。事实上他们认为火、土、水皆是圣物，为避免玷污圣物，他们禁止人死后进行火葬、土葬或水葬，于是就只能“鸟葬”，即人死后抛尸荒野任秃鹰啄食。他们虽然也崇拜土和水，但是依然被称为“拜火教”。显而易见在这些圣物中，火的级别是最高的。

去除污秽的时候，火比水更有效、更彻底。守护佛、法、僧三宝免受玷污的三宝荒神，被简称为“荒神”，当然也是“火神”。家里唯一有火的地方就是厨房灶台，因此荒神也被称为“灶王爷”。

其实灶王爷位高权重，除了掌管人们日常饮食之外，还掌握着人类的命数运势。在中国，灶王爷还被称为“司命神”。

正如字面含义，司命神是掌管人类命运的神仙。这位神仙久据凡人家中，对每家每户大小事宜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每年的腊月二十四都是灶王爷回天界向玉皇大帝禀报家家户户一年来所作所为的日子。灶王爷一年就休息这么一天，在凡人家中默默尽忠职守了一整年，这下可以畅所欲言了。但是老百姓却战战兢兢，因为他们不知道灶王爷会向玉皇大帝禀报些什么，毕竟一年的所作所为都被灶王爷看在眼里，哪怕干一丁点儿坏事都逃不过灶王爷的法眼。

于是人们在灶王爷返回天庭之前，会拼命讨好他，将“南糖”“关东糖”这些甜食或豆草干粮作为供品，恭送灶神。“南糖”是用芝麻做的，“关东糖”是用糯米和砂糖做的，人们希望用这些甜食来拉拢灶王爷，使其向玉皇大帝美言几句。甚至有人觉得光准备些蜜糖还不够，就干脆把整个灶台都用糖抹上一遍。

除此之外，我还听说过更夸张的，据说有些心里极度没底儿的人会用糯米把整个灶台抹个遍，这样灶王爷去回禀玉帝时，因为嘴巴被糯米粘住，所以有话也说不出口，这种极端的做法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那些豆草干粮是给灶王爷的马准备的，灶王爷此行长途跋涉全靠它了，可得把它伺候好。

“送灶”仪式（恭送灶王爷），各地风俗略有不同，一般是从腊月二十三到腊月二十五大办三天；也有地方腊月二十三举办祭典，腊月二十四恭送灶王爷。每逢这时，食品店就开始售卖南糖和关东糖。据《旧都文物略》记载，一过腊月二十五，便无人再来买糖。这和过完圣诞节就没人再买圣诞蛋糕一样。

灶王爷一般在天庭逗留六天左右，将在除夕深夜返回人间。恭送灶王爷上天时，人们会把贴在灶台上的灶君画像揭下来，待到除夕之夜再贴上新的灶君画像，恭请灶王爷回来。

在日本，“荒神”如字面所示，总给人一种威风凛凛的检察官的印象。但是如今人们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荒神灰头土脸地蹲守在灶台里，存在感越来越低，其地位也一落千丈。关于荒神，其画像极其丑陋，且关于他的传说也很不堪。

据柳田国男在宫古岛屿收集的民间故事记载，一名肆意妄为的男子抛弃了妻子，生活越过越落魄，逐渐沦为靠乞讨为生。某天他在一户富人的厨房门口讨要食物，走出来的女主人不是别人，正是他当年抛弃的妻子。他羞愧万分，在灶台旁因过度苦闷而气绝身亡。女主人把他埋在了灶台后，于是他就成了灶神。

如此寒碜的神仙，似乎让人淡忘了火的珍贵。人们在灶台里烧煤，把灶台弄得脏兮兮黑乎乎的，确实很令现代人反感，所以，灶神的地位下降了，但若真是这样，那也不大合情理。

有的地方的火神是保护火种或者吹气旺火的神仙。在日本东北地区，灶神被称为“火男”，后来被制成丑角面具，这让荒神颜面尽失、没了立足之地。丑角面具张着嘴呼气的样子，实际上是吹气旺火的神态。《海南小记》记载，日本有一种民间跳滑稽舞时戴的面具叫“潮吹面具”，而柳田国男推测这一面具的叫法，实际与“吹气旺火”的日本方言的谐音一致。即“潮吹面具”极有可能表现的就是“吹气旺火”的意象。

虽然如此，过去的灶台也已基本从现代家庭中消失。现代人都用煤气和电烤炉来操控火，以往火的形式已经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人们之所以对火的意识越来越淡薄，恐怕与人类不重视大自然脱不了干系。

（1990年12月17日）

# 60.松竹梅

在日本，松、竹、梅被看作吉祥的象征。在中国，哪怕是寒冬腊月，松竹依然青翠，而梅花于凌寒盛开，三者堪称傲骨凛然，因此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

“岁寒”指寒冷季节，从中派生出“晚年”和“逆境”的意思，与正月并无关系。

但是说起“三友”，风雅人士也有可作三友之物——琴、酒、诗。为将松竹梅的“三友”与之区分开来，特冠以“岁寒”二字。另外，据说如果是“岁寒之友”的话，那它就不是指松竹梅，而是水仙的别称。论语中记载着这样一句孔子的名言：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意思是到了严寒时节，才知松柏未曾凋零，翠色依然尚存。这里把岁寒比作“逆境”，将松柏喻为“君子”，人也一样，只有立于困境而不倒，才能意识到君子的真正价值。顺便提一下中日文化理解的偏差：此处说的“柏”不是日本的槲树，而是指其他的常青树。此外，“岁”在日本一般指过年守岁，但这里的“岁寒”并不是指过年，所以中国的松树和过年也并无关系。

新年之际，燃放爆竹，这在6世纪的岁时记中就有记载，但是书中记载的是“庭前爆竹”，释义中也有“以竹著火”，指在家里将竹子投入火中。以前人们利用竹子遇火炸裂的声音，吓唬邪灵恶鬼，使之逃散。唐代以后发明了用火药制成的爆竹。但无论怎样，竹子似乎与过年有着不解之缘。

竹子在火中毕毕剥剥炸裂不止，响声连天，所以人们普遍认为爆竹声能吓退邪祟。“势如破竹”这一成语，其气势与辞旧迎新相得益彰。在日本，人们用“竹子可以一劈到底”来形容心直口快的人。但实际上，竹子本身也有“节”，人们常用“气节”“节操”来强调人活一世的重要品质。可见竹子的各方各面都被人们喜爱推崇。

梅就更不用说了，每一朵梅花都绽放在料峭春风之中。它们不畏严寒，散发出阵阵孤傲芬芳。它没有牡丹与樱花的华贵，却有着神仙也画不出的娇艳之美。

北宋的林逋（967—1028），家住浙江西湖孤山，是一位20年没进过城的奇人异士。他一生未娶，在自家房屋旁造墓、种梅、养鹤。人们都称其为“梅妻鹤子”，即以梅为妻，以鹤为子。

疏影斜横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

他的这首咏梅绝句至今仍被传唱。

中国的梅花胜地不胜枚举，其中以广东罗浮山最为有名，山麓有个梅花村，苏东坡（1036—1101）被贬到此地时曾作诗赞颂梅花盛开的样子：

罗浮山下梅花村，

玉雪为骨冰为魂。

公元6世纪末期，赵师雄到广东赴任，途中在松林间的一个客栈稍作休息，在他饮酒之际，忽而来了一位略施粉黛、身着素服的女子，并与他闲聊了一会儿。当时天色已晚，薄暮降临，残雪映着月色，一时间气氛甚好。他被一股难以言喻的异香包围着，与这名女子推杯换盏、相谈甚欢。这期间有绿衣少年起舞助兴，赵师雄就如同龙宫里的浦太郎一般。再睁开眼时，天已大亮，而他躺在一棵大梅花树下，原来梦中与赵师雄推杯换盏的女子竟是梅花精。

据说罗浮山自古以来都是仙家修行之地，所以常有一股灵气飘浮在山中。

人们描绘松与竹，总是在四季常青的绿意里，星星点点地缀着一两抹鲜亮的红梅，真是一幅动人心弦的风景画。如此说来，赵师雄因想喝酒暖身而于此中途落脚的那家松林深处的客栈，也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存在。

元代的陈樵（14世纪中期）写过这样一句颇具意境的诗句：“竹外青松竹下梅。”红花绿叶交相辉映，曲直枝干交错纵横，花叶香气交织萦绕、沁人心脾，真是快要醉倒在这片松竹梅的美景之中了。

（1991年1月7日）

# 后记

已故藤泽横夫先生自1979年9月直至去世之前，历经十年撰写了题为《人生座谈》的随笔。该随笔在《读卖新闻》大阪总部版的周一晚报上进行了连载。藤泽横夫晚年卧床不起，他就自己口述，由典子夫人记录，坚持创作。藤泽先生的文笔温润、清新，我作为一名读者，被深深地吸引，每次都非常期待周一晚报的连载。

报社让我接替藤泽先生继续撰写他的那个专栏，我恭恭敬敬地接受了这个邀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混迹在世界语倡导者的队伍中，经常出入石滨纯太郎先生的府邸。当时，藤泽横夫先生来到住吉的石滨府邸，在那里与他见了几次面。《人生座谈》中叙述了一些有关当时的回忆，其中也提到了我的名字。因为有这样一段缘分，所以我无论如何也要接过他的接力棒，把这个栏目办好。

《人生座谈》文如其名，就是座谈会一样的文风，不是议论文体。我打算继承他这种文风，写下这世间的林林总总。因为只在关西一带出版，所以东京等其他地区的人应该读不到。虽然在哪里出版、谁能看到我不是特别介意，但潜意识里我可能按照跟家人畅谈的角度准备的。

与时事相关的内容也有，我都标注了日期。此栏目收录了从1989年10月2日到1991年1月7日间创作的六十回。现在依然在连载中，刊载章回已经过百了，虽然一般都是每隔七天刊登一次，但偶尔也会十四天刊登一次。那可不是因为我休息了，而是报社放假了。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八日六十八岁生日作于三灯书斋

陈舜臣